

學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0.1

季刊 总第85期 第22卷 第1期 Sum.85 Vol.22 No.1

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政协、统战新闻用语若干常见错误辨析

张文明

新闻用语的准确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增强受众对新闻的信任和喜爱程度，而且有利于一些政治常识、政策文件、专业和行业知识术语的普及。两会前夕，一些机构往往会发布《两会报道规范用语手册》《两会报道规范用语备忘录》之类的通知、提示或文章，提醒大家如何避免新闻用语错误。这不但有利于两会新闻报道的准确规范，对于日常新闻采编用语的规范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鉴于此，笔者特就几个在各种新闻报道中常见的政协、统战新闻用语错误作一些辨析，与广大读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勉。

一、“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应为“政协党组召开会议”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精神”（2019年9月25日《陕西日报》）；“青海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19年7月10日《青海日报》）；“湖南省政协召开两级党组民主生活会前征求意见座谈会”（2016年12月29日《湘声报》）；“县政协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2019年7月2日甘肃成县政府网站）……上述表述均存在错误。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发挥一个单位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协党组是党在政协设立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说，在政协组织有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由党委任命的党组，一套是由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出来的常务委员会和主席班子。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中有的不是共产党员。“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所以由“政协”来召开党组会议就不对了。而且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政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所以，“政协召开党组会议”的表述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政协党组召开会议”。

二、民主党派没有级别之分

“省级民主党派”“市级民主党派”这样的用语时常见诸报端，这是一个概念错误。正如没有“省级共产党、市级共产党”之说一样，民主党派也不可能有省级、市级之分。中国共产党没有分省级、市级之分，分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民主党派也一样。

然而，这样的用语也曾出现在省级、市级的主流媒体。如“陕西8个省级民主党派对11个深度贫困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2017年11月21日《陕西新闻联播》）。“省级民主党派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2019年3月20日《各界导报》）。“省政协5月8日召开与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第一次沟通协商会”（2018年5月9日《甘肃日报》）。“省级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2015年12月24日湖北省委统战部网站）。“××走访看望省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干部共商民主大计”（2014年2月11日《湖北日报》）。“重庆市召开2017年度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调研协商座谈会”（2018年1月13日《重庆日报》）……

这些“省（市）级民主党派”都应该写作“民主党派省（市）委”或者“民主党派省（市）级组织”。

三、“政协”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不能走动的

政协是一个组织机构，它是不能走动的，但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中看到它走动了，如“辽宁省政协来我省调研考察”（2019年4月26日《新华日报》）。这里“来我省调研考察”的是“辽宁省政协领

（下转封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0 年第 1 期(总第 85 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李 嵘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杨焱平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侯晓芳

钟瑞华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刘林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录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坚持“社院姓社”政治底色 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李承儒, 马 霞 (5)

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发展路径与现实意义 王 艳 (10)

●统战理论与实践

对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包云燕, 杜明彦 (15)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哲学审视 李慧敏 (24)

●非公经济与新的社会阶层

辩证统一是“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 王 喆 (3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张海霞 (37)

●民族工作研究

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红河实践 孙桂琴 (45)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金 晶 (55)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路径探析

——以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为例 乐 燕, 孔 婷, 张文娟 (63)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0-02]

● 宗教工作研究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 杨志银 (69)

乡村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研究

——基于云南一个苗族村的个案分析 韩 芳 (84)

● 文化发展

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史晓宇, 诸 芳 (90)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对外叙事: 翻译的视角 李志凌, 杨 燕 (95)

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现象探析 席婷婷 (104)

● 法治研究

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 田 坤, 廖小明 (111)

政协、统战新闻用语若干常见错误辨析 张文明 (封二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1, 2020

Contents

Performing under YNIS's Work Regulations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Socialism for Institutes of Socialism towards Solidifying Positive Powers
..... Li Chengru, Ma Xia(5)

On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On-line Education in
Socialist Institutes Wang Yan(10)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s on the United Front's Work in Yunnan on the Internet Bao Yunyan, Du Mingyan(15)

Philosophical Review on the United Front's Work with Netizens in the New Era Li Huimin(24)

Non-public Economy and New Social Strata

Dialectical Unity as the Co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Government-Commerce Tie" and the Dually
Sound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Wang Zhe(32)

New Social Member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New Social Political Participants
in Guangzhou Zhang Haixia(37)

On Works Concerning Ethnic Groups

Fully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On Honghe Prefecture's Practice Sun Guiqin(45)

Regenerate Village Development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Yunnan Jin Jing(55)

Developing Tourism as a Means to Alleviate Rural Poverty in Remote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of Kunhan Village of Dadugang Township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 Le Yan, Kong Ting, Zhang Wenjuan(63)

Religious Issues

On the Development Basis of Religious Economics Yang Zhiyin(69)

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Ethnic Minorities'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Vision of Rural Management:
A Case Analysis of a Miao People's Village in Yunnan Han Fang(84)

Cultural Development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National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and Solidifying Cultural Confidence
..... Shi Xiaoyu, Zhu Fang(90)

The Outward Narration of China's Voic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Ecology: A Translating Perspective
..... Li Zhiling, Yang Yan(95)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Youths' Iconic Existence Xi Tingting(104)

Studies on Law

The Triple Contexts of Righteousness in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Lawful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Tian Kun, Liao Xiaoming(111)

Common Mistakes on News Media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PPCC and the United Front
..... Zhang Wenming(Inside Cover)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坚持“社院姓社”政治底色 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李承儒，马 霞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精神对坚持“社院姓社”的政治要求都是一贯的。面对新时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指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根本遵循，坚持“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明确职能、咬定目标、立足实际，才能发挥好社院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作用，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社院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社院姓社；政治底色；凝心聚力；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1-0005-05

2019年6月27日，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发出建院六十周年贺信，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下称《条例》）后，全国社院系统的又一件大事和喜事。足以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充满着对新时代社院发挥职能的期待。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指示，到《条例》对社院职能定位的表述，再到汪洋主席在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上对社院独特政治地位的阐述，坚持“社院姓社”的政治要求是一贯的，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最鲜亮的底色。

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要求赋予社院工作的新使命，坚持“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更加有效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就成了新时代社院工作的根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指日可待，这就需要统一战线发挥更大作用，也需要社院进一步明确职能定位、工作方针、基本任务和培训目标，发挥好“政治学院”“联合党校”“主阵地”的作用，履行好“重要部门”和“重要组成部分”的职能。

基金项目：2019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深度贫困区高价彩礼治理研究”（19YB179）；2019年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西北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ZK20190114）。

作者简介：李承儒，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统战理论等研究；马霞，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和统战理论研究。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新时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立。1956 年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动提出建立政治理论学习学校的要求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学院应运而生，在 60 多年的发展中，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亲密合作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方面代表人士，为促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无论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的奠基者，还是历届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学院的发展都高度重视和关心，从校名、院训的确定、题写，到致贺信、明确性质、提出要求等多层面都对社院的发展举旗定向。

正视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社院的发展，多次为社院的发展指明方向。2016 年 10 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6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致贺信，在充分肯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基础上，要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①。201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印发《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社院的职能定位、任务目标和工作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推进社院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2019 年 6 月 27 日，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汪洋主席强调：“要坚持‘社院姓社’不动摇，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把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② 中共中央如此高度重视社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是与新时代赋予统一战线，赋予社院工作新使命密切相关的。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政治论断，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这就要求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奋力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华章。“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③ 而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④，既承担着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培养锻造筑梦人的职能，也汇集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社会精英和贤达的智能优势，是奔梦路上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① 《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60 周年的贺信》，2016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21390.htm, 2020 年 2 月 8 日。

② 《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2019 年 6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27/c_1124680756.htm, 2020 年 2 月 8 日。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

④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2018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3672.htm, 2020 年 2 月 8 日。

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① 面对数以亿计的统战对象,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社院工作必须固本强基守圆心、开放包容扩半径、勠力共绘同心圆, 这既是新时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 也是推动构建和谐“五大关系”, 争取人心、汇集力量的必然要求。

面向未来, 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兴。《条例》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既要承担教育培训、理论研究、政策宣传的职能, 还应开展决策咨询、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的新任务。面对多达数亿的统战对象, 如何发挥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职能将是今后社院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伟大梦想需要伟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同行同向, 因此, 凝聚政治共识, 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之基, 是我们社会主义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日趋完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对“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的崇尚和追求,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面对个别西方国家吹嘘的中国威胁论和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盛行的局面, 讲清楚中国不称霸不扩张的人文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良好形象, 向世界阐明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社会主义学院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释好中国特色, 展示好中国形象”^③的使命和任务, 更是社院在新时代更好履职尽责的职责所在。

二、明确职能定位, 展现“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六十周年贺信时指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 作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条例》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 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 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 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 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从而彰显了社院政治学院的战略地位, 拓展了社院的政治功能, 强化了新时代社院的责任担当。总书记对社院“坚持‘社院姓社’, 突出政治培训, 强化政治共识”的要求, 凸显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社院姓社”成为新时代社院发挥作用的鲜亮底色。

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立, 因此, 必须突出政治培训的主业。社院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并领导的, 以凝聚政治共识、汇聚发展力量为使命的政治学院, 必须如《条例》所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 第562—563页。

② 《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7年, 第8页。

③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2018年12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3672.htm, 2020年2月8日。

④ 《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 2016年10月14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21390.htm, 2020年2月8日。

⑤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2018年12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3672.htm, 2020年2月8日。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①，亮出底色，突出本色，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作用，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作出贡献。社院以培养培训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统战干部和统战理论人才为主责，在教育教学中就应该以学习、宣传、研究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统战理论为核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深化巩固政治共识。社院作为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应该在强化文化共识、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职能上发挥作用，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走向，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好文化统战的重要职能。社院作为中国共产党联谊交友的窗口，应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增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广交挚友、诤友，为民族复兴的伟业积蓄力量。同时，社院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智慧，展示中国形象的载体，应该担负起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展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弘扬“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合”理念的使命，发挥好国际统战的重要职能。

三、紧盯目标任务，筑牢团结奋进的同心圆

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目标：一是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熟悉统战方针政策且不断增强“五种能力”建设；二是确保各级统战干部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掌握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善于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从两个层面明确了新时代需要一支什么样的统战队伍和培养什么样的统战领域代表人士的重大问题，社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就是要为党和人民培养一支坚强可靠、素质过硬的统一战线人才队伍，就是要为党和人民培养一批热爱祖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懂政策有能力善团结的各领域代表人士，这关系到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落实，关乎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的生死存亡，关系民族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因此，社院应紧盯目标不放松，不断优化教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以政治共识、文化认同、能力提升为着力点，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立足实际情况，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刻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持。”^②作为地方社院，应该深入挖掘、研究、宣传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聚人，突出地方特色，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体系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一发挥着维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中外交流的脐带作用，是中华民族分合兴衰的粘

^①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2018年12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3672.htm，2020年2月8日。

^②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2018年12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5/c_1123903672.htm，2020年2月8日。

合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支点，是新时代文化统战的圆心，也是人心向背的最大公因子。无论是港澳台同胞还是海外侨胞，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五大认同的基础。因此，深入挖掘、宣传、研究各地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统一战线这个同心圆坚守圆心、扩大半径是我们地方社院的职责所在。以甘肃为例，甘肃自古便是多民族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拉卜楞寺等一大批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名胜古迹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表征，也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以天水伏羲庙和泾川王母宫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发祥地，是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脐带；以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和南梁革命旧址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我们牢记革命精神、重温初心使命的精神家园；以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和古浪八步沙林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们传承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量补给站。因此，将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到教育教学中，立足实际，突出特色，是我们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院姓社”的根本属性，汪洋主席强调“又红又专”的办学要求，《条例》明确社院工作的职能定位、工作方针、目标任务都一以贯之地突出了社院作为政治学院的本质属性和办学底色，潘岳书记在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要求，“每一名社院教师都是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线战士，每一个社院课堂都是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社院讲授的每一堂课都是政治课、研究的每一个课题都是政治题”既是对社院教师、社院课堂、社院研究的准确把握，也是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赋予社院新要求的明确回应。因此，我们更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为指导，以《条例》为根本遵循，坚持“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明确职能，咬定目标，立足实际，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社院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 发展路径与现实意义

王 艳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399)

摘 要: 新时代互联网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培训亟待发展完善。社院网络教育具有培训空间延展性和浸润力、教学形式现代化统战性、课程体系规模化规范化、教学管理大数据化自动化等时代特征。为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变化, 社院网络教育要构建线上线下教育模式、网络教育体系、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机制、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引进等发展路径, 从而更加有效地打破网络教育的物理局限性, 提升教学创新性, 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关键词: 社会主义学院; 网络教育; 培训工作; 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1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办好网络教育”^①,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社院)要“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和网络培训”“建立统一战线网络教育培训平台”。^②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领域网络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 社院作为政治院校应紧跟时代步伐, 大力发展具有统战特色的网络教育体系, 形成了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培训新模式, 提升社院培训效果。

一、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的时代特征

与其他类型网络教育不同, 社院网络教育是面向部分社会优秀人士, 提升受教育者政治文化素养的, 外在功利获得性(如获得学历、专业技能等)弱的, 兼容社会、政治、文化多领域的网络化政治教育体系, 政治文化认同的教育目标使社院网络教育更富有独特的时代特征。

(一) 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空间更具延展性和浸润力

社院传统培训工作缺少网络的有效参与, 难以形成覆盖培训对象的网络空间, 开拓网络教育大大拓展社院培训工作的空间, 涵盖网络社会和现实世界两个培训领域, 是提高社院培训工作延展性和浸润力的重要途径。据统计, 截至2019年8月, 我国拥有8.54亿网民^③, 网络也成为人们

作者简介: 王艳,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①《权威发布: 十九大报告全文》, 2017年10月18日, <http://sh.people.com.cn/n2/2018/0313/c134768-31338145.html>, 2019年3月13日。

②《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6日, 第1版。

③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9年8月30日,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2019年9月30日。

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大部分社院培训对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其他领域代表人士、统战干部等^①,都是熟练运用网络工作、通过网络获取知识信息的成熟网民。但是网络虚拟空间具有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意识,社院传统培训工作难以顾及线上线下两个领域,难以在网络领域形成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引导力。社院网络教育是拓展线上培训的有效突破口,借助网络平台,采用多种网络技术手段,借鉴大众传播方式特点,改善优化传统教育风格,促使培训工作延伸到网络空间,积极融入培训对象的网络生活,更具浸润力特征。

(二) 社院网络教育教学形式兼具现代化和统战性

社院网络教育教学利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可以不断突破传统教学形式,激发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路径。利用互联网、融媒体技术、人工智能等形式促进教学形式的现代化。如果说统战性教育培训内容是网络教育的“内在灵魂”,那么新技术手段是网络教育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化抽象为直观、化静态为动态、化繁琐为清晰的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教学讲解、图文呈现等难以短时间内有效化解的教学难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统战理论方针政策等理论的现实基础、理论根基和现实意义能更有效地呈现。新科技支撑下的多种教学手段有利于社院形成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部分社院开发的微视频、网络课堂、远程互动课堂等模式只是社院网络教育的开端,网络教育工作的深入会带来更多的网络教学新形式,从而能大大丰富了社院教学形式。目前网络教育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院网络教育应该进一步创新,把教育培训内容与教育培训对象感兴趣的内容有机融合起来,把教育内容揉入丰富多彩的网络生活中去,达成无意识政治文化认同目标,进一步提高网络教育的效果。

(三) 社院网络教育课程体系更具规模化和规范化

网络平台支撑下的社院课程体系能够涵盖网络课程和传统课程两大门类,大大丰富了社院原有的课程资源。网络课程方面,利用社院力量充实网络课程资源,共享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优质课程;传统课程方面,努力将传统课程网络化,进一步丰富网络教育课程资源。整合两种门类课程资源,可以丰富社院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体系的规模化,尤其是通过录播系统不断更新,增加网络课程资源,既能使最新理论方针政策解读快速呈现在网络教育中,又能克服实时课堂难以长期保存和难以反复利用的弊端,是不断更新丰富课程资源的双赢之路。社院网络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智能分类使教育培训更加规范化,形成更具科学性、体系化的课程资源,更方便教育培训对象和教研人员通过科学分类快速查找,从而有助于他们通过网络学习填补知识空白,丰富备课资源,启发教学思路。

(四) 社院网络教育教学管理走向大数据化和自动化

社院网络教育利用网络管理系统和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帮助社院教育培训工作走向自动化和大数据化。社院网络教育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快速完成对培训信息的查询、分析、归类、匹配、统计等处理,将庞杂的教育培训信息条理化呈现,根据教育培训需求分配对应的教育资源,将部分教学管理实务实现自动化,实现教学评价信息电子存档,这些都是提高社院培训水平的信息化基础。社院网络教育能把管理人员从繁杂的教学事务中脱离出来,利用网络平台完成部分管理工作,大大节省了人力,有助于社院教育培训工作走向自动化。

二、科技发展新趋势下社院网络教育的发展路径

加强社院网络教育建设,要把握网络教育的发展趋势,明确社院网络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教

^①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6日,第1版。

育模式、教育体系、机制体制和丰富完善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一）整合重构线上线下教育模式

网络技术的渗透力从社会交往、消费领域进入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世界被网络重新整合，社院网络教育应该主动整合重构线上线下教育模式。“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教育即线上教育能满足自适应的学习模式，并且通过教育平台实现数据收集和整理，具有不断拓展的巨大容量，具有多种创新可能性；社院传统教育模式（即线下教育）的实时实地教育方式，具有主动性和情感互动性，具有网络教育无法达到的灵活性。“当前线上线下、校园内外的边界日趋模糊，教育逐渐走向开放和重构。”^①社院教育培训工作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好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整合与重构：更新以课程为基础、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严肃庄重的传统教育理念，形成以教育资源为中心，教育培训过程贴近生活、有魅力、生动活泼的教学理念。整合线上线下课程资源，根据教学需要建构融合性的课程资源，促使教学多样化。根据学员所属类别、认知特征和学习习惯，将线下教授式、灌输式、现场式，线上自助式、互动式、远程式整合重构，灵活运用线上为主线线下为辅，线下为主线线上为辅，线上线下并重等教学方式。把线下的教育管理方式与网络化管理技术、人工智能监督手段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管理方式的整合重构。对学习效果的评价采取传统评价和网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线上线下学习教学的双重评价。

（二）建立完善社院网络教育体系

目前社院网络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和成熟，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具有全局性、结构完备、有序运转的网络教育体系。在平台建设方面，在调研实践、多方考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具有统战特色、针对党外人士的教育平台，快速建立学员数据库，加强社院内部间平台共享，加强社院网络平台与微信、微博等公共网络领域的链接，借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成功经验，打造兼具统战性和社会性的网络教育体系。在网络教育力量配备方面，配齐网络教育专业教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鼓励这三类人员加强网络课程开发、网络教育实践理论探讨和技术开发工作。加强教师的技术运用、信息处理、知识教授、价值引领、专业服务、学习监督等线上线下能力的培养，帮助现有师资力量快速成长为网络教育的主要力量；建立网络教育的技术人员队伍，做好网络教育的硬件软件支撑工作，为网络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塑造成熟的网络教育管理队伍，制定网络教育的管理制度，理顺网络教育工作的机制，完善网络教育的评价考核，为网络教育提供保障。在网络教育内容方面，创新网络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打造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的网络资源库，并保持一定的更新度，通过学员的学习反馈不断修改完善网络教育内容；同时利用数据处理能力，分析整理各类学员的学习兴趣点、关注点，指导课程的按需分配，强化受欢迎的网络教育内容。在培训对象方面，社院网络教育能否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培训对象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评判，尤其是抓住教育对象在网络教育中关注和聚焦的议题，以此激活社院网络教育的活力。

（三）创立与完善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机制

社院网络教育缺少教师与学员的实际授课过程，网络平台缺少传统教育的管控力和约束力，教师和学员通过虚拟环境、围绕知识资源建立的人际关系十分单薄，与传统教育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师生关系差距很大，教与学脱离状态下的学习状态处于放任状态，不能确保教学质量。为了确保网络教学中学员自主学习的真实有效性，社院需要借助硬件和软件对教与学进行数据管理，建立网络教育教与学过程的监督机制，创设开放自由有效的教学生态环境。社院培训对象多为代

^① 刘春莹、李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开放教育的未来——第二届北京网络教育年会综述》，《开放学习研究》2019年第1期，第18页。

表性人士和统战干部,层次较高、学习自主性较强,加之社院继续教育属于提升性教育,不同于技术或学历获得教育,社院与学员具有很好的信任基础。这是社院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管机制的构建基础。网络教学前,可与学员签订教学信任约定,明确学习要求、学习目标和学习规范,通过这种“君子协定”的形式督促学员网络教育中的学习效果。网络教学中,通过网络教育平台追踪学习过程中的文本、视频、学习者状态等数据,采集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监督学习过程,保证教学质量。网络教学后,通过问答、测试、感悟提交等测试环节检测学习效果,保证网络教学质量。

(四) 适时引进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深化社院网络教育

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网络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是未来发展趋势。《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①“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虚拟现实、情感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领域的发展,赋予智能教学系统更丰富的内涵。”^②人工智能是网络技术的延伸,社院网络教育适应新技术的变革和发展,适时适时引进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是教改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社院运用人工智能提供基础性理论知识讲解,可以解放部分人力资源。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形成教学情景,与学员形成情感和认知互动,是网络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人工智能解放教师力量,缓解社院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有利于社院教师更多时间精力进行优质课程和教学资源开发,成长为网络教育的主要力量,促进社院培训工作的不断发展。

三、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的现实意义

(一) 数字化教学过程打破学员学习的物理局限性

社院网络教育的数字化教学过程能够打破传统教学固定时空的局限性。传统教学模式要求学员在固定时间地点内进行集中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难以保证教培对象学习工作两不误,工学矛盾难以避免。社院网络教育模式更具时间上的灵活性,学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安排学习时间,甚至可以利用零碎时间进行短时学习,有利于学员统筹安排继续学习教育,助力克服工作与学习之间的矛盾。传统教学模式受限于空间限制,培训人员数量难以最大化,受时间限制,培训容量难以扩大化,培训范围难以短时间内扩大。社院网络教育突破了社院教学容纳量的限制,在技术支撑下可以大范围拓展培训范围,既节省经费支出,也有利于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传统培训模式多以阶段性学习为主,难以形成常态化、长期性的学习模式,但社院网络教育为学员开展长期性的继续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 传统教育内容融入新兴教学手段提升教学创新性

传统教育内容与新兴教学手段相结合可以生成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从而形成网络课堂与传统课堂相结合的社院教学模式。在网络课堂方面,课堂在新技术支持下既可以实现教师参与下的网络问答模式,也可以实现教师缺位下的理论方针政策传授解读,更加快捷有效地完成社院教学内容。在传统课堂方面,社院传统教学课堂更多依赖于社院教师的知识结构、传授技巧和人格魅力,网络教育为社院教师教学创新提供了新媒介、新手段、新方法。社院培训内容多涉及政治学、社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2018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2019 年 10 月 18 日。

^② 刘德建、杜静、姜男、黄荣怀:《人工智能融入学校教育的发展趋势》,《开放教学研究》2018 年第 8 期,第 35 页。

会学、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内容,教师熟练运用多种融媒体技术能帮助课堂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具有逻辑结构的政治学知识脉络,具有数据资料支撑的研究结论,具有影像资料见证的历史事件和具有声音图像视频展现的文化内容,有利于提高社院教学课堂的魅力,能辅助提高教学效率。

(三) 教与学交互式沟通平台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

传统教育模式中师生可以通过实时互动解疑释惑、交流感情,但这种互动多限于“一对一”“一对数人”,互动范围有限,很难做到“一对多”的大范围互动沟通。社院网络教育中“教”的行为与“学”的行为通过网络平台完成,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实现“一对多”的大范围教学互动。这种大范围的交互式沟通有利于党外学员对统战理论、政治体制、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认知、理论建构和情感共鸣,有利于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同时,社院培训对象与教师,培训对象与培训对象之间实现网络教育互动沟通交流,与社院培训工作特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知识水平较高的代表性人士更适合自由、平等、开放的网络教学环境,社院培训内容的开放性和探讨性需要沟通交流作为教学补充,政治文化认同的教育目标需要网络教育交互式沟通平台深化思想、升华认识,建立党外人士政治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

(四) 教育资源的共享性满足各界别学员的个性化需求

社院网络教育能够集聚大量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在传统教育面向全体学员的共性教育的基础上体现了个性化特色。社院网络教育可以集中社院系统、高校系统和科研系统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在平台和网络的支撑下能够被快速获得,这意味着优秀教师和有价值的教学资源可以突破以往传播局限性的壁垒,发挥更有实效性的作用,极大弥补了社院培训力量不足、质量欠佳和课程不完善等问题,尤其是最新统战理论方针政策需要快速准确解读和宣传,资深专家深度和准确解读的教学资源共享有利于社院内部学习,也有利于学员及时获取。同时,社院网络教育的内容、对象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化,更能满足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成长经历、工作岗位的党外人士个性化培训需求,民族宗教界人士更容易获得民族宗教政策方面的知识传授和理论讲解,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更容易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课程。

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和多媒体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社院培训工作需要适应信息快速传播和个体即时获取大量信息的现实要求,社院网络教育势在必行。明确社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探索社院网络教育在网络发展大趋势下的现实路径,有利于为社院网络教育摆脱现实困境,提高网络教育水平,发挥政治共识教育等提供理论参考,助力社院更好地发挥好凝心聚力作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统战理论与实践

对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包云燕, 杜明彦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网络时代, 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网络空间对社会的影响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已成必然。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边境线长, 是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特殊而重要的位置。重视云南网络统战工作,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文章对网络时代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机遇、挑战进行思考, 并就如何开展云南网络统战工作提出具体措施建议。

关键词: 云南省; 网络统战工作; 思考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15-09

网络时代, 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网络空间对社会的影响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①在信息革命深入推进的当下, 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均席卷进信息化浪潮, “互联网+”不再是一种潮流, 而是人们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的组成部分, 将统战工作与互联网相融合, 是统一战线领域不可回避的一个时代课题。“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②已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时代要求。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 在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中处于辐射中心地位,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 省内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度深, 与此同时,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 五大宗教齐全, 八个民主党派全有, 还是五大侨乡之一, 统战工作任务、使命重大。网络统战工作于云南而言, 既是提升工作效能的有效“利器”, 又是容易造成信息外泄、威胁社会安定和谐的“潜在隐患”, 既大有可为, 又责任重大。

一、云南省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战略意义和机遇

何为“网络统战”? 2005年,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宣传调研工作会”首次提出“网络统战”的概念。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著的《统一战线使用工作方法》明确: 是指以网络为载体

作者简介: 包云燕, 云南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 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统战工作; 杜明彦, 曲靖供电局政工师, 研究方向为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 第42页。

②《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 八次提到互联网》, 2017年10月18日,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018/c120837-29594814.html>, 2019年9月21日。

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传统与现代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等特点的统战工作。^①

可以看出,实施“网络统战”,一方面能够发展运用我党在近 100 年的统战工作中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做法,另一方面可以凭借信息革命优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工作覆盖面和更大规模的沟通、联系、协商、团结,画出更大的“同心圆”。

(一) 实施“网络统战”,是云南统战工作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职能要求。云南作为欠发达省份,发展是全省的第一要务,是中心和全局之重。统一战线作为党擘画最大“同心圆”的法宝,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服务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云南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部手机游云南”,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云南分中心、中国林业大数据中心、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等有影响力的“大数据”机构相继建成投运,互联网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关联度和融入度越来越强,市场主体和经济领域的统战对象越来越“互联网化”。

云南地处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干道上,跨境电商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18 年 7 月 24 日,中国(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2019 年 1 月 30 日,省政府发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建成完善的跨境电子商务“两平台、六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线上公共服务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线下产业园区平台,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共享体系、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体系、跨境智能物流体系、跨境电子商务信用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跨境电子商务风险防控体系),全省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0 亿美元以上,年均增长 50% 以上,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居西部前列。^②

在如此的互联网环境中,统战工作要实现其职能目的,不能不对自身进行“互联网化改造”,所以,推行“网络统战”,既应然,也必然。

(二) 实施“网络统战”,是新时代云南统战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现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发展的内在要求,统战工作面广线长,工作对象日趋复杂,工作任务繁重艰巨。要实现统战工作立于时代潮头,真正发挥服务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职能,离不开高效率运转、大范围覆盖、高效能作用的工作机制,而在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要实现如此目的,离开互联网这一主题无从谈起。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特殊的省情和作为统一战线“大户人家”的统战情况(以下简称统战情),决定了统战工作任务较其他省份更为艰巨而繁重,决定了云南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客观必然。所以,云南要实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信息革命的互联网助力,离不开网络统战。

(三) 云南“网络统战”的优势和面临的机遇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云南边境线长,接壤国家多,在对外开放中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期间,提出了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等要求。围绕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云南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①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年,第 60 页。

^②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 月 30 日, http://www.yn.gov.cn/zwgk/zcwj/yzf/201911/t20191101_183954.html, 2019 年 9 月 21 日。

截至2018年6月下旬,云南与南亚东南亚11个国家、33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与7个国家建立了8个多边双边地方合作机制,在经贸合作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个商务代表处,其中东南亚实现了全覆盖。2017年,云南与东盟贸易额884.7亿元,增长13%,占全省外贸额的56%,其中缅甸、越南、老挝是云南与东盟的前三大贸易国。

在深化经济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云南还努力推动和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合作,倡议建立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推动创立中国—南亚东南亚商务论坛,积极推动与越北、老北、缅北、泰北的合作,构建地区合作、政策协商、民心交融的重要平台。^①

对外开放的深度推进,为网络统战工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二是网民数量的剧增为“网络统战”奠定了群众基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9年2月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全年新增手机网民6433万。^②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互联网发展呈迅猛趋势,就网民数量的变化而言,横向比较,云南滞后于内地发达地区,但纵向比较,云南网民数在逐年递增。依据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划定的统战对象范畴,对照全国比例估算,云南统战对象中约有798万为网民。这就客观地为“网络统战”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是云南“大户人家”的统情让网络统战大有可为。2018年,汪洋同志视察云南统战工作时指出,云南五大宗教齐全;全国56个民族,云南有15个独有民族、26个世居民族。同时,云南还是五大侨乡之一;八个民主党派全有,组织结构也很健全,可谓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云南的这种特殊统情决定了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广阔的天地和特殊的优势,必然大有可为。

结合云南省省情和统情,抢抓机遇,利用好“网络统战”这一“利器”,无疑是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适应统战对象变化,提高云南统战工作效能的有效途径。

二、云南省网络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网络统战是互联网与统战工作深度融合的产物,在信息革命的催发下,网络已成为“互联网+”形态中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所以,从本质而言,在“互联网+统战”中,“互联网”发展速度超过“统战”,正常且必然。同时要看到,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做人的工作。所以,互联网快速发展给网络统战带来的问题和困难,需要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于云南这样地处边陲,既欠发达而统战任务又重的省份而言,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一) 信息安全存在隐患,为外部敌对势力和极端势力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入侵提供可乘之机

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安,他们纷纷与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内外勾结,挖空心思阻碍中国崛起,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损害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个现实的典型例证就是,2019年6月以来,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问题,我国香港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游行集会,其间一些激进示威者蓄意挑起、制造暴力事件,严重威胁公众安全,

^① 马苗:《第二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聚焦互联互通一体化合作 云南有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昆明日报》2018年6月19日,第3版。

^②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2月28日, http://www.cac.gov.cn/2019-02/28/c_1124175686.htm,2019年9月23日。

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断就香港局势煽风点火、妄加评论,还安排高级官员会见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为香港激进暴力分子的违法行为撑腰打气,竭力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安全,^①妄想实现其“颜色革命”的野心。

除此之外,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善于借助于信息科技,利用互联网美化包装反动言论,捏造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攻击人民政权,抢夺意识形态阵地,企图西化、分化中国。

与此同时,统战工作面广线长,不少信息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在网络统战过程中,不少信息可能借助于互联网传播、泄密,造成严重后果。以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进行的“云南新媒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获取的数据为证,当下,云南网络统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工作人员网络保密意识不强,有的统战部门的网络信息管控不严,不少数据、信息通过 QQ、微信、邮箱等途径传播,工作电脑未安装安全防护软件系统,一些安装了的安全软件未及时有效升级更新。纸质文件管理、销毁做得不够到位。

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有力量投入资金和资源研发先进的“木马”病毒或其他破坏软件,侵入统战工作网络窃取所需数据、资料。而根据笔者近年来调研情况来看,有的统战部门对此的防范是不够的。

2015 年,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的“云南新媒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课题调研时发现,三个州市党委统战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以上问题。如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从管理方面而言,该市“新媒体企业存在多头兼管,管理不到位的现象”;从人力资源来说,该市“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政务新媒体的部门主要通过安排兼职人员负责新媒体的日常运营和维护。管理人员原本工作量大,更要兼顾微博、微信等维护更新,精力有限。信息发布频率、日常内容更新、舆情的搜集时间上也无法保证”,无法将舆情信息转交给相关部门,目前的政务新媒体更多的只是承担了信息发布功能。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该市对于新媒体领域存在“统战工作未全覆盖,有不少死角和盲区,存在跟不上、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面对新兴媒体,我们的统战工作却不能与时俱进地利用新的手段为统战工作服务”。

(二) 网络空间异常复杂,给网络统战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互联网信息发布具有便捷性、虚拟性、互动性和个体性等特征属性,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多元、多变、复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利用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网络空间的良好生态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在网络犯罪中,“网络水军”较为突出,他们收受“客户”钱财,雇佣熟悉网民心理的“写手”,利用互联网编造、杜撰、传播各种虚假信息,发帖删帖,进行网络炒作,攻击“客户”的竞争对手和敌对目标。此类作案手段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有组织有策划,有明确分工,涉及面广,表面打着“舆论监督”“法制监督”“社会监督”等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诈骗、非法经营、寻衅滋事、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②新华社在起底“网络水军”犯罪活动过程中,通过采访办案民警发现,网络水军只要客户给钱,什么内容都能发。这些内容“带有强烈的‘网络黑社会’性质,容易侵蚀网络正能量、破坏网络正常生态,往往造成

^① 《杨洁篪表示中国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2019 年 8 月 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8/01/c_1124827365.htm, 2019 年 10 月 4 日。

^②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自媒体“网络水军”违法犯罪》,2018 年 12 月 8 日, <http://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c6320656/content.html>,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正义网民不敢发声”。^①

对于这些网络犯罪,我们需要在网络统战过程中提高警惕,防范工作数据、资料在网络传播时被“网络水军”获取,特别是有关宗教、民族、经济等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要强化保密管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网络统战的重点对象之一,该群体包括了大量新媒体企业主、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代表人士和媒体记者。但从公安部门通报的情况来看,犯罪团伙相当部分就是“网络大V”、知名博主、论坛版主、网红等。“‘网络水军’业务的辅助实施者,主要由专业推手、小型非法网站运营者和知名网站‘内鬼’构成。专业推手往往是一些网络‘大V’‘网红’等,借助自身在‘粉丝’中的影响力,为炒作活动站脚助威;小型非法网站运营者、知名网站的‘内鬼’(如编辑、版主)主要是协助‘网络水军’删除、置顶帖文等,从中谋取非法利益。”^②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注重识别和把握。

除了“网络水军”这种有组织、有策划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些个体性、偶然性的网络攻击,亦可造成相当影响。2019年8月2日19点13分,山东省临沂市民用航空管理局官方微博@山东临沂民航即被人盗用,发布关于机场管理人员的负面信息。截至次日19点16分,该微博的阅读量即达75.8万次,讨论83条。^③

虽然官方对于该事件的调查尚未得出结论,但该事件表明,即便是普通个人,亦可通过相应手段,影响到利用互联网开展的工作。同时也折射出,网络统战的信息管控任务艰巨。

2019年8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由北京华夏盛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的中国廉政监察网竟然冒用中央纪委的名义发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案件,并以此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据调查,该公司法定代表魏某某指使公司员工赴各地搜集所谓“新闻线索”,以帮助“申诉”为名向当事人收取“立案费”,在与当事人签订协议后赴事发地进行录像、拍照等所谓“取证”工作,将相关照片和视频及其编造的虚假信息发布在中国廉政监察网等网站上,并向当地党委政府邮寄所谓“督办函”进行敲诈勒索,或向当事人收取“好处费”。此案对统一战线的互联网安全对网络统战工作亦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④

(三)“一带一路”建设和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给网络统战带来严峻挑战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岭同脉、江河同源”,自古以来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早在2000多年前,云南就是中国陆路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门户,是中华民族和印度及东南亚人民友好交往和开展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就有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延伸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对外通道。这条西南通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在增进中外交往、促进中外贸易和抵御外侮中,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云南处于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实施意见》。所谓辐射中心,即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

① 《起底“网络水军”犯罪活动》,2018年2月5日, <http://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50/c6017757/content.html>,2019年10月18日。

②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自媒体“网络水军”违法犯罪》,2018年12月8日, <http://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c6320656/content.html>,2019年10月18日。

③ 《临沂民航局:“与女下属通奸对抗调查”博文系被盗号》,2019年8月3日, <http://news.163.com/19/0803/08/ELL149BG00018AP1.html>,2019年10月18日。

④ 《〈中国廉政监察网〉假冒中央纪委名义被公安机关查处》,2019年8月11日,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1908/t20190811_198665.html,2019年10月18日。

交流中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①

随着辐射中心建设的深入推进,云南对外思想文化和人员经济交流交流势必更加频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亦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云南互联网产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以新媒体发展为例,去年,笔者在进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云南路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媒体企业整体发展不成熟,参加调查的 305 家新媒体企业中,当问及“自身发展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时,115 家回答“竞争对手鱼龙混杂,行业管控不规范”,占受调查企业总数的 37.7%,占比最高;被问及“制约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时,94.44% 的企业家的回答集中在“缺乏骨干人才”“员工未来预期不明确、人心不稳”和“缺少发展资金”三个方面。与此同时,员工群体的学历构成方面,大专及以下的就占了 61.84%,本科占比 35.9%,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只有 2.18%。同时,全省各地州统战部门亦普遍反映新媒体企业尚处起步阶段的事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统计主要依据各地州统战部门的统计数据,能够进入统计范畴的,均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或声望;未进入此次统计范围的,其状况可能不如纳入统计的。

根据公安机关近年来的网络犯罪案件调查情况和互联网情况来看,“‘网络水军’业务的辅助实施者,主要由专业推手、小型非法网站运营者和知名网站‘内鬼’构成”。所以,云南互联网产业的现状,对网络犯罪分子而言仍有不少可乘之机,也给网络统战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四) 云南省网络统战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相对突出

2015 年,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的“云南新媒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课题调研,范围涉及省直部门、16 个地州部门,经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专项汇报材料分析等,发现当前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开展主要存在以下“瓶颈”问题。

1. 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统战工作部门现有人才队伍状况距离信息化时代下网络统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大部分统战工作人员,尤其是年龄偏大的人员囿于传统的方式方法,不乐于亦不愿利用网络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运用互联网开展统战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其思想理念、方式方法等也还有诸多需要改进提升的方面。

2. 工作机制尚待建立健全。大多数地州统战工作部门与工作对象联系机制普遍未建立,各部门工作协同机制建设尚属起步阶段,工作载体尚需搭建,工作资源分配未实现优化。

一是管理机制方面:网络统战的一项重要目标是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其中,就要通过统一战线的优势,促成市场监管主体和互联网行业协力并进,推动互联网发展。然而调研发现,互联网领域主要存在市场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管不当和政策帮扶不到位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就新媒体市场而言,不少参与调研的人反映:“鱼龙混杂,缺乏规范。不少个人或私营新媒体渠道发布信息没有严格制度把关,不实信息、无节操信息、对行业无益的短时效益信息充斥其中。市场运作中存在恶性竞争,给行业带来一定影响”。“竞争激烈,行业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利益驱使供应商传播不良信息”,“不良的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信息内容的抄袭,恶性竞争,资金扶持不够”。“乱而无序”“发展混乱”“网络爆炸式信息传播方式导致信息良莠不齐、信息泛滥”……

就新媒体从业人员素质而言,参与调研的人反映:“人才缺乏”“侵权抄袭现象多”“从业人

^① 《辐射中心:扩容云南“朋友圈”》,《人民日报》2019 年 8 月 1 日,第 13 版。

员素质普遍偏低，各类低俗标题、内容吸引眼球，部分内容存在歪曲事实，甚至造谣”。“技术类人才比较匮乏”“管理观念落后，在管理观念中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利益驱动，一些供应商片面追求眼前利益，无视法规，不顾及社会责任，传播不良信息”。“新媒体企业缺失人才”“门槛变低，一些组织和个人均可成为媒体发布者、内容监管者”，“人才招聘不到，缺乏骨干人才”。

就监管而言，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当。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监管得过严，如一些参与调研的人员反映“政府相关部门监管过于严格，无有效的沟通渠道”，“监管部门太多太乱，各种审核手续繁杂”。另一方面是监管缺位，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参加调研的人员纷纷反映，“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管理条例措施”，“没有政策的指引”，“法律监督滞后，内容良莠不齐，舆论导向欠缺，正能量信息传播过少”……

就政策帮扶而言，参与调研的人员反映，“政府不支持网络平台的建设，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单薄，缺少发展资金”，“相关部门对新媒体行业的宣传权限模糊，使我们不知道哪些可以宣传，哪些不可以；相关部门对电子商务发展无规划，发展不集中，不能整合资源”……

二是工作协同机制方面：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就社会治理而言，涉及到公安、工信等行政部门以及电信、联通等相关企业。要做好新媒体领域的统战工作，需要上述部门和统战、文化、宣传、组织人事等部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但因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联系也未融入“统战”因素。

三是工作载体方面：当前，成立协会等相关组织，举办联谊交友活动等是统战工作比较流行的做法，面对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这项新任务，除了这些常规的做法外，还有必要利用新媒体的技术手段，通过微信群、QQ群、微博等多种方式，通过新旧手段结合，做到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实现交流的即时性、广泛性。

同时，工作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是抓好工作的重要保障，推进新媒体领域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是当下网络统战工作的必循之径。当前，制度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是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客观存在的问题，以至于不少统战部门感到工作无依据、无规划、无方向。

三、实现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宣传，提高思想认识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网络统战工作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现在的时代正在经历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运用日新月异。云南虽处于西南边陲，但被信息化浪潮席卷是必然之势，且这一趋势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广，超乎想象。所以，对于网络统战工作，我们有必要思想先行。

第二，网络统战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是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并非只针对发达地区。所以，做好当前云南网络统战工作，是全省统一战线面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第三，网络空间的对等性，让每个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传播者”，甚至是“制造者”。网民发布信息以及所发布信息的影响力，并不受地域、阶层、时间等限制，只要所传播的信息切合公众心理需求，同样能引发舆情危机。所以，即使是在云南这样的边疆省份，其网民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要提高全省统一战线领域对该项工作的重视,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对该项工作重要性的宣传贯彻,将宣传贯彻纳为全省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件、会议等各种途径和网络、媒体等载体,不断加强对该项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宣传贯彻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一要把握重点。宣传贯彻的目的是要引起各级统战工作人员对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视,所以,要注重宣传中央的精神和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二要着眼长远。网络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面临的一项长期工作任务,特别是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加深,这项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所以,我们在宣传贯彻的过程中,既要立足当前实际,又要着眼长远,用战略性的目光谋划和推进宣传贯彻工作。三要结合实际。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当前,尤其是“互联网+”等浪潮的兴起,媒体、学界等对互联网、新媒体的讨论庞杂,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讨论话题覆盖各行各业,各种理论推陈出新。在宣传贯彻工作中,我们要紧密着眼云南省当前的实际,谋划一些符合实际的举措,确保宣传贯彻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不能仅注重理论,而使理论脱离实际。

(二) 坚持“大联合大团结”,团结巩固好新媒体代表人士阵营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网络空间的“民意主导者”,他们粉丝多、联系广、影响大,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要按照抓重点、抓关键的方法论,坚持线上联系、线下沟通,通过建立协会组织、加强沟通交流、深入联谊交友的方式,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让他们理解国家的政策,从内心拥护党的领导,坚定“四个自信”,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在此过程中,统战工作人员要深入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群体,深度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继而制定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工作举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从公安机关侦办的雇佣“网红”“大V”等实施的网络犯罪中吸取教训,在强化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法治引导上下足功夫,防范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网络犯罪者”。

(三) 坚持多元包容与有效管控相结合,让互联网真正成为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利器”

包容和合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和体现,也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当下,统战工作对象多、范围广,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画出最大的同心圆。统战对象大多是文化层次高、社会联系广、在专业领域有一定造诣的“精英”,他们各自有着独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价值主张,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一现实。与此同时,我们 also 需注意,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有的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国内反动势力争夺的对象。公安机关侦办“网络水军”案件也发现,一些属于统战对象的知名媒体记者,亦被不法分子通过利益诱饵拉入其团体,实施犯罪活动。

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既要放手工作,充分信任,又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开展网络统战过程中也要联合公安、国安等相关部门加强网络管控,对统战对象的不当思想和言论积极引导,确保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营造大团结大联合的生动局面。

(四) 提升统战工作人员的素质技能,建设一支适合网络统战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

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状况直接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囿于历史地缘等因素,云南统战领域人员“互联网能力”不高是当前工作的突出“短板”。对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足工作。

一要树立正确的网络统战“人才观”。网络统战对人才的要求并非仅局限于用互联网统计数据、发送信息，而是需要工作人员具备与时代相适应的互联网思维 and 理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点：一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二要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三要按照互联网的深层规律开展工作。因此，应该依据相关要求，探索建立完备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储备一支精良的统战领域互联网人才队伍。

二要严把网络统战“人才观”。在公务员招录、人才引进方面，统战部门要结合网络统战的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条件，从“源头”上引进一支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人才队伍。

三要强化现有人员培训培养。我们可以通过分类分批强化培训、外送学习、选派到互联网行业挂职锻炼等方式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甚至可以根据实际和工作需要，联合高校、社科机构，设立培训中心等。

（五）建立健全网络统战工作机制

一是通过开发系统，强化技术支撑，建立高效安全的信息传送渠道。利用互联网开展统战工作是网络统战的基本要求和基础，在信息安全外在风险高、威胁大的情况下，有必要投入必需资金，开发便捷高效而又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作为开展网络统战的技术支撑。强化对统战公开网页、客户端的信息传输管控。

二是构建统战部门与公安、国安、工信、市场监管、民族、宗教部门等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规避因网络统战可能造成的网络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统战内容建设，推出系列统战对象喜闻乐见的统战宣传形式，助推党的政策在统战对象中落地见效。

三是构建宽松包容的网络对话体系。动态调整完善网络统战对象名单，坚持线上互动与线下沟通并进。在敏感问题上积极主动发声，一方面包容异质思维和多方观点，另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建设一个网络统战对象乐于接受、愿意参与、共同发力的网络统战新环境。

责任编辑：念兴昌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哲学审视

李慧敏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 基于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明确统一战线在网络安全治理中仍然是一个法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理性分析当前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现状, 承认网络人士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网络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四个维度阐释新时代如何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 明确新时代创新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有利于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新时代; 网络人士; 统战工作; 哲学审视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24-08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就像邓小平所说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 不是可以削弱, 而是应该加强; 不是可以缩小, 而是应该扩大”^①。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质在于一个共同目标的指引, 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积极应对网络安全问题,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切实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 实现网络社会最广泛的团结与民主, 其具体任务就是争取民心, 凝聚虚拟力量转化为现实力量。

一、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是创立统一战线理论的第一人。从《共产党宣言》到《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从《关于波兰的演说》到《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都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 其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源头

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 最早是恩格斯提出的。“虔诚主义终究会感到, 在同宗教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 运用“联合”“联盟”“同盟”等词语来解释统一战线。《共产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所采用的是“联合”, 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 “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所以没

基金项目: 大连市统战部理论研究“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研究”(46)。

作者简介: 李慧敏,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03页。

② 恩格斯:《不来梅通讯》, <http://cpc.people.com.cn/GB/10887483.html>, 2019年11月26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18页。

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①。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工人阶级能够联合起来还在于其基于共同的现实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革命的对象。《关于波兰的演说》中所提到的是“联盟”，“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②。《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采用的是“同盟”，提出建立一个各民族能够实现平等的联邦，“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③，但是“不能因联合而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评态度的权利”^④。这为明确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目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方向性指导。

（二）关于统一战线的内涵

统一战线的内涵就在于建立联盟或自由人联合体，发挥其根本职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大团结、大联合。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新的社会形态，是能够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人人向往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予以科学预判与描述。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等人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从社会发展层次看，自由人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建设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为网络社会的共生性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对明晰当前网络安全问题等具体网络社会问题发挥着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自由人联合体是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启示

习近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者和创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出发，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是否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为网络治理的与时俱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

新时代是否需要统一战线？根据习近平的《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文可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在于其外在的表现，是否好看、是否好听，而是在于统一战线存在的价值，是否有用、有多大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否能够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是否能够形成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联盟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史上第一部党内法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在统一战线的性质中融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团结统一战线成员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思想基础，“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由此，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能够充分认识到肩负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能够做到坚定政治信念，坚持前进方向，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综上，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②。基于以上，在作为统一战线新领域的网络空间，积极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性。

（二）统战工作存在的特殊性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可知，统战工作在于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旗帜，在大团结大联合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体现了统战工作的特殊性。

1.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根据习近平在《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中所指出的，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做人的工作是一项什么工作。第一，从量上来认识和理解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就是凝聚人心，不断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人才集聚、智力密集，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成员来自于各方面，如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地区、海外等，达数亿之多。统战做人的工作就在于交朋友多不多、交朋友的面要广。和党外人士接触、谈心，给予他们的帮助要达到一定的量。第二，从质上认识和理解做人工作。统一战线成员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团结大联合，这就意味着，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资源，同党外人士交朋友，私谊要服从公谊，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统战做人的工作要用交的朋友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来评判，这样才能保证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能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第三，从度的角度把握统战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中交朋友要把握好一个度，做到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出功夫菜。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不以势压人。因此，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治理网络安全问题时能够清楚统战对象具体从事什么内容的工作，从而使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2. 统战工作是艺术性工作

通过习近平多次在统战工作相关会议的讲话可知，统战工作是服务于党的特殊群众的工作，必然采用特殊的工作方式方法，体现出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这一重要特征。统战工作的艺术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掌握好统战工作中的宽与窄、多与少、深与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施大团结大联合这一统一战线的主题的过程中，做到团结联合的面宜宽不宜窄，团结联合的人宜多不宜少，团结联合的程度宜深不宜浅。第二，新形势下统战工作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

^①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2 日，第 2 版。

^②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2015 年 6 月 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07/c_127887693.htm, 2019 年 9 月 9 日。

性关系,掌握统一战线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坚持客观原则、讲究艺术方法,善于联谊交友,不能偏向任何一端。“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①基于此,以适合于网络统战工作的艺术性方式方法,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政治原则下,有效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画好统一战线的同心圆、网上网下同心圆,努力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和发展,是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全新理论。由此,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就要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及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基于底线思维的创新性开放式思维。以适应新时代、网络信息化和统战发展新形式的工作方式方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廉洁自律,开创网络统一战线新模式。

三、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现状分析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与飞跃,实现了对传统统战工作的传承与超越。

(一)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适合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也不例外,要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多样化的途径和方法联合网络人士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和发展网络社会的统一战线。如建立微信统战,并设立各个区域的统一战线公众号形成统战矩阵。还可以建立统一战线客户端,例如,由大连市委统战部开发的“e连心”客户端^②,它是大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统战工作的平台。以团结、引导、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内容,通过搭建教育培训、联谊交友、政治参与、作用发挥、舆论宣传五大工作平台的形式,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沟通。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贯穿于统战工作的始终,从最初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随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为解决,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网络统战工作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创新发展。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要注重事物的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积极利用合适的形式去促进统一战线内容的发展。根据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e连心”客户端设立了即时报、微慕课、e舞台、听你说、有活动、比比看、问我吧、加入我等栏目,在发布统一战线资讯方面注意时效性,为新社会阶层人士“亮身份、树形象、比贡献”搭建网络舞台,开展网上建言献策活动等,在线主动释疑解惑,纠正错误观点,有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性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反映人认识事物的水平与深度。人首先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即现象形成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人通过理性思维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即事物的本质。这就意味着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总是通过现象表现自己的存在。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也必然遵循着这一认识发展规律。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从网络空间启动开始直至现在从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循序渐进地有序进行着。把线下的统战工作以多样化的符号形式及时转移到线上,以便网络人士通过各种线

^① 《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2页。

^② 《大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统战工作平台“e连心”上线》,2017年5月17日, <http://www.zytzb.gov.cn/tzb2010/xinwen/201705/ca0d31602ab0422f95db8b91cdcd9c71.shtml>,2019年9月9日。

上途径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共话统战,进行理论研究、经验交流、思想碰撞、对具体现实问题建言献策并达成线上共识,推动线下转化为实际有效行动。基于线上平台,时时关注与观察,时时监督与督促,记录和分析大量的网络统战工作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准确区分真象和假象,透过现象认识和把握本质,进而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分析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断深化对网络统战工作的理性认知。

(三) 现实与可能的统一性

现实与可能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的一对范畴。“现实”反映事物的现在,是当下相互联系并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综合,标志着事物的当前状况;“可能”是反映事物潜在的趋势,标志着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主客观条件成熟,可能就会转化为现实。发展就是现实与可能相互转化的过程。开放的网络空间为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目前在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统战主体正力求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优势,通过大数据等先进分析手段,寻找一切具有可能性的信息因素和信息中介,基于现实与可能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网络统战工作现实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评价,与此同时对统战工作未来发展趋势开展深入分析。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立足现实,对网络人士中一切存在的可能性作出全面的分析和预判;另一方面着眼长远,防止不良因素产生和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同时善于创造条件,重视和发挥好一切先进性手段和积极因素的作用,促使好的可能获得实现,正确处理网络人士之间、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网络空间内的大联合大团结。

同时应看到,当前在开展具体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时还存在忽略内容、夸大形式的现象,需要透过这种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对网络统战工作新现象进行大量观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总结网络统战工作规律。目前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还缺乏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深入研讨和有的放矢的深入解决,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激发创新,促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四、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与使命

引导网络人士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在新时代、新空间、新问题中,树立并不断加强主体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着力。

(一) 时间维度—新时代—时代特征

新时代是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确认和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时间维度和时间范畴。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深入认识新时代,跟上新时代,切实更新观念,崇尚实干,增强本领,转变作风,是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时代要求。新时代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性需要,还有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在网络空间中,后两种需要更为突出、更为明显。这就意味着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着重满足统战对象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常态化关注和观察网络舆论新现象和网络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充分利用各种网络符号形式引导和搭建网络虚拟主体之间积极健康的新联系,第一时间了解人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新变化、新需要。除此之外,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网络人士毫无例外地肩负着这一伟大使命,在网络空间中,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建立起若干弱联系,并逐步转化为强联系,由此促进资源和社会整合,为网络安全问题、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提供智慧与方案。通过网络空间这一新空间实现新的自由,

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强大起来。

（二）空间维度—网络空间—信息中介

网络空间的产生与存在，是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确认和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空间维度，是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普遍联系的信息中介，同时也为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优势资源。网络空间边界的模糊性以及网络的无限开放性，促进网络社会虚拟关系不断地重组，一方面突出着网络主体个体的个性化和社群化，另一方面又突显着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深度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及各主体间共享关系的存在。这对网络社会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是有利的因素和条件，与此同时又充分证明着其存在的必然性。在这一良性发展的网络空间文化氛围中，网络人士会愈加明确和积极行使其主体的责任与使命。网络空间的持续性存在见证着网络人士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根本转变，由此，网络人士的责任与使命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在网络空间这一共享空间中，充分利用资源共享关系不断开拓和接触新的未知领域，寻找一切可能性，积极促进一切有益的可能性因素转化为现实性因素，在包容与整合差异过程中不断实现超越与完善，逐渐推动网络统战工作迈向新的阶段。

（三）人物维度—网络人士—新型主体

网络人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重要成员，是统一战线中新时代的新型主体，是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明确和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人物维度。各级统战部门由线下工作拓展到线上工作，要经常了解统战工作在网络中落实的情况，做到线下工作和线上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作用，开展广泛而有效的统战工作。充分调动网络意见领袖、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红人等网络人士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里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保证网络安全。因网络人士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必然在其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保证网络统一战线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有效发挥网络人士的正面力量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需要推动具有差异性的人与人之间实现对立统一。网络人士之间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矛盾是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网络统战工作要致力于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形成服务大局的思想和意识，把握住网络社会中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网络社会力量，凝聚其思想，让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在虚拟社会关系中形成合力和凝聚力，实现最大公约数，众志成城。

（四）事件维度—网络安全—特殊客体

新时代针对网络空间的不同情况，如何联合网络人士中一切可以团结的虚拟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考察和见证网络人士行使新时代责任与使命的事件维度和特殊客体。统一战线既是治理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法宝。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安全是整个网络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必须成为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实现全国网络安全“整体一盘棋”。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失信、网络谣言、网络攻击、网络恐怖等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侵犯个人隐私和企业秘密，窃取个人和企业信息，诈骗电子货币等影响网络公共安全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涉及到网络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具有隐蔽性、风险性和传播性。网络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网络人士的切

身利益。只有保护好每一个网络主体的安全,才能构筑起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安全是整个网络社会包括网络人士在内的共同责任,需要广泛动员各方面网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构筑网络安全观,有效防范和抵御网络安全风险,这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不容忽视的责任与使命。

五、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的新作为

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突出特点在于“新”,它是一个新领域、新阵地。这要求统战工作者在网络空间中开创性地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深入思考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实现联合、团结,如何不断研究新情况、采取有效方法,解决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产生的新问题,从而不断推动网络人士自觉提升哲学、信息、道德、法律等多方面网络信息素养,自觉有效抑制各种网络非理性的冲动,自觉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为互联网新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不断增强网络统战工作的实效性,推动网络安全工作有效进行。

(一) 新思想开启网络统战新作为

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思想清晰辨别和客观判断网络统战工作中的主体和客体,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明晰新征程、新思路、新出路和新作为。网络社会主要矛盾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点方向,是网络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根源。网络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统一战线思想也随之深入发展。网络社会内网络人士的进一步联合和团结,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循序渐进地阶段式明晰网络统战工作中存在的主体和客体的本质和特点,深入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关系,逐渐揭示和总结存在于网络社会和统战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才能在网络统战工作中做出新作为、开启新征程,建构新时代网络统一战线新思想。

(二) 共建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

网络空间已成为网络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的新阵地。网络空间舆论导向工作是重中之重。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积极参与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的建设,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统战文化是网络统一战线的灵魂。在调动一切网络积极因素,努力化网络消极因素为网络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网络人士能够发挥潜在的无形的巨大影响力。网络统战文化的构建需要长期投入,网络统战文化是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性实践中积淀而成。网络统战文化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广泛传播,发挥其协调、统筹各种网络虚拟关系和营造网络和谐氛围的功能。要基于网络空间共同利益和目的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加快占领网络舆论宣传新阵地,牢牢守住和建设好网络统战文化主阵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共同构建富有正能量的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在网络统战文化无形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增强网络人士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高网络人士的舆论导向意识和网络安全观,时刻观察与注意网络安全因素的一切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变化的程度,共建网络安全屏障,净化网络风气,弘扬网络社会正能量,共享网络统战文明。

(三) 开展启蒙式网络统战对话

共建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还在于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之间、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常态化的对话与交流,建立互信,实现内心真正认同彼此。启蒙式网络对话,目的在于使网络人士实现在思想意识层面从不成熟不断走向成熟,虚拟实践行为从自发到自觉的有效转变,不断

明确肩负的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中网络人士的资源优势，以更新颖的视角和方式，为新时代的新问题群策群力。基于网络人士善于运用各种网络媒体工具的优势，通过 QQ、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形式建立与其他网络主体的经常性沟通联系渠道，做好顶层设计，每个时期、每个阶段围绕新时代新问题提出网络对话的具体目标。如以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反腐等活动为载体，抓住一切可能性，引导网络人士发表网络民主意见，减少不必要的网络社会内的矛盾，以沉着冷静、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在对话过程中注重发挥情感的作用，做到理与情感相融合，通过情感的作用深化统战对象对网络统战工作的认识。

（四）网络人士自我解放与创新性作为

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的自我解放与创新性作为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所在。而网络人士的自我变革与解放是统战工作实现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网络人士的创新性作为是其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然结果。建立网络统一战线的目标并不只是实现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而是由此推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实现网络人士自我变革和解放的动力。网络空间的无限性激发了网络人士的无限欲望，帮助和引导网络人士通过自我斗争从欲望中克服自身的贪婪与对虚拟现实的迷恋，从而实现自身解放，是在网络空间中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所在。在网络上建立网络治理主体人才数据库，形成系统的智囊团和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要充分认识到现实存在的统一战线“五大关系”转移到网络空间的同时积极构建各主体间的共享关系，接受和肯定差异性的同时包容多样性的发展，形成大联盟或自由人联合体，以创新性合作模式和审美模式，时刻准备为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精准出谋划策，为网络大统战格局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使网络统战工作稳定有序地开展，让网络社会充满活力、健康美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念兴昌

非公经济与新的社会阶层

辩证统一是“新型政商关系” 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王 喆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辩证统一是亲清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关系的核心。处理好“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意义重大。“亲”与“清”是辩证统一关系,“亲”与“清”既有对立因素也互相统一;“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辩证统一关系,有对立因素,更互相统一;“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对立的一面,更是统一关系,其核心是辩证统一。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新型政商关系;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32-05

一段时间,政商关系如何处理,成为困扰着不少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干部的一道难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政商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但是,受体制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能力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商关系仍然有不少问题待解决。我们认为,处理好“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意义重大。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两者之间主要呈现正相关。辩证统一是“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一、“亲”与“清”是辩证统一关系

“亲”“清”现在专指新型政商关系。这个新概念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①

基金项目:2019—2020年度陕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重点课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问题研究”(ZBKT 201910)。

作者简介:王喆,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非公经济政策等。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64页。

（一）“亲”与“清”有对立因素

《辞海》对“对立”给予的释义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趋向。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②

“亲”与“清”的关系有对立关系这一面。“亲”与“清”关系对立方面的表现就是：“亲”与“清”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趋向，如果把握不好“亲”的度，“亲”有可能变成亲热、亲昵甚至不辨是非的官商勾结。当然，如果掌控不好“清”的度，“清”也有可能演变为清淡、清冷甚至爱搭不理的官僚主义，政商关系的“亲”“清”就只剩下“清”而没有“亲”了。现实社会里，悲观主义者往往夸大“亲”与“清”关系的对立程度，常常得出“要么‘亲’，要么‘清’”“二者必居其一”这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武断地认为“亲”与“清”势不两立，“亲”了就“清”不了，“清”了就“亲”不了。

其实，“亲”与“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个客观存在，这一点必须承认，不过不能因此陷入非此即彼的主观主义之“坑”，即夸大“清”与“亲”的对立性，过分强调“亲”“清”之间的对立关系。应该“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③。从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政商关系中“亲”与“清”的对立关系。

（二）“亲”与“清”互相统一

“亲”与“清”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亲”与“清”之间还有互相统一这一面。“政”和“商”是辩证统一关系，“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政商关系能否亲清，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在“政”。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政”（“政”的代表是公职人员）在始终保有“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情况下，是能够做到在“清”的同时还能“亲”的。领导干部的“清”就是他们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打交道时没有贪心私心，没有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当然，要求公职人员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打交道时要守住底线，并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可以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理不睬，可以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正当要求不闻不问。相反，要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权益给予保护，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经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困难与问题时更应该如此。当然，“政”在“亲”的同时也能保持“清”。简言之，从“政”这一方面来说，“亲”“清”是统一的。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起“主导作用”的是“政”，起“重要作用”的是“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或曰民营企业家）。作为先富起来的这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应能够在遵纪守法，在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情况下，做到“清”的同时还能与公职人员保持“亲”的关系。做到这一点其实也不容易，有些民营企业家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能够“遵纪守法”、踏踏实实做事业，很

^①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557页。

^②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

^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第172页。

“清”，但在主动与党和政府沟通交流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其实这也是有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反之，这个群体同样可以做到“亲”的同时，还能与公职人员保持“清”的关系。一句话，从“商”这个角度而言，“亲”“清”也是统一的。

目前，党和国家对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要求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到了“政策体系”这个层面，明确要“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①因此，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过程中，要给予“亲”与“清”辩证统一关系以新的认识，尊重客观规律。既要看到“亲”与“清”互相统一的一面，也不能忽视“亲”与“清”还呈现着对立的另一面，只有如此，才能更快地“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

二、“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辩证统一关系

1996年1月，王兆国同志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概念。2000年12月，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首次被提出。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两个健康”概念由此提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关系问题引人关注。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还要看到事物间的区别，通过事物间的区别与联系的有机统一来实现两者间的和谐发展。

（一）“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同步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同步。这种不同步表现如下：

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整体上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但是，在这一个时期，常常会有一些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等诸项事业发展顺利的同时，民营企业家本人却未能同步。事实上，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时期，反而是一些“好大喜功”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容易迷失自我的时期，此所谓“盈满则亏”，这与中国传统上盛赞“花未全开月半圆”的心态有关，就是要谨防因功业大成而松懈。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一些非公企业反而没能同步健康发展。在“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方面，在“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等方面，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得很好，也因此获得党和国家的各种奖励，得到各种荣誉，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与人民群众的肯定，这些也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标志。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因此痴迷、沉醉于各种荣誉，长此以往就会疏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加上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对提升产品“品质”专注不够，企业很容易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严重的甚至直接步向衰落。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之间存在的矛盾表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总是同步。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也并不必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有时候不同步。为此，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过程中，各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响应“光彩事业”

^①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等“公益”活动，但是要量力而行，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将“获取利益”与“回报社会”结合起来。

（二）“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互相统一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统一关系，其表现有二。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带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意味着非公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所谓“健康发展”，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做好环境保护、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搞好产业规划、保持政商关系“亲”“清”等工作，并保持企业的稳健发展。有健康发展着的企业为依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就能从企业利润里拿出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另外再拿出一部分用于各项“公益事业”。如此一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能够健康成长。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精神层面上的思想、心理能够健康成长，必然对受其主导、影响的物质层面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怎么才算“健康成长”？目前尚没有成熟完善的评价标准体系。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要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即“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②由此，符合“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基本上可视为“健康成长”。

正确认识“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之间的辩证关系，能让我们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过程中，更加全面、发展、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分散、片面地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将“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以及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通盘考虑，一揽子解决。

三、“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是辩证统一

“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是辩证统一。但是，“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统一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就统一方面来说，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必然带来“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新型政商关系意味着公职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分别做到了“亲”“清”，意味着公职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是在依法依规依纪情况下进行的，“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更亲清，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更扎实。反过来，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又加速了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因为，“两个健康”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健康”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是“健康”的，进而也意味着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组成的“商”的成长是“健康”的。加之，“两个健康”能得以“健

^①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第169页。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9月26日，第1版。

康”，其最大推动者是党和政府及其执行者公职人员（“政”）。如此，“政”与“商”必然亲清，亲清与“两个健康”形成良性循环。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既重务实，又善务虚”。因为“务实”与“务虚”“两者可谓并蒂之花、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全部领导活动之中。务实是务虚的出发点和归宿，务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务实；而务虚是务实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做好务虚，务实就如同无头苍蝇，只能盲目瞎转”。^①“新型政商关系”构建、“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一即“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皆属于“务虚”，只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属于“务实”。将“务虚”与“务实”结合起来，也就处理好了“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的统一关系。

总之，正确处理好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与新型政商关系这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目的是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加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需要各级党委重视并切实将党的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将“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工作做细做实。加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最主要的是要遵循习总书记提出的处理政商关系时要保持亲清关系的要求，摒弃非此即彼的主观主义思想，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把握“亲”与“清”的度。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以来，广东、浙江、安徽等十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形成政策体系并开始严格实施。2019 年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从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等。^②所有这些，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9 年，第 269 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张海霞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摘 要: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尺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 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考察广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实际, 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 参与机制、参与动机、参与渠道、参与水平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 要从教育引导、畅通参与渠道、组织起来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有序; 政治参与; 广州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37-08

公民政治参与一直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据统计, 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规模约为 7200 万人, 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 95.5%, 约 6900 万人。^① 全国二分之一左右的技术专利都在他们手中, 他们掌管着国家 10 万亿元左右的资本, 国家税收总额三分之一的功劳归于他们。^②

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济力量的提升, 其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 形成了新的政治参与群体, 不同程度地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影响, 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2015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首次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列为统战工作对象。2017 年 2 月, 历史上第一次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唯一主题的高层次全国性会议在北京召开; 同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2018 - gdsykt - 001)。

作者简介: 张海霞,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传媒政治。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 7200 万人》, 2017 年 1 月 4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04/8113847.shtml>, 2020 年 2 月 5 日。

② 崔保华: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和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重大决策部署为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四川统一战线》2017 年第 4 期, 第 5 页。

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高度重视，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政策支持，如何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为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路径及其现状，更好地提出对策，课题组立足于广州开展广泛调研，了解市、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工作的开展情况，并重点走访天河、花都、白云、海珠等地，调研了羊城 e 家、“自雇自足”实验室、创投小镇、同声共振联盟、同心圆工作室等，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研讨，同时调研了深圳、珠海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圳美年广场文化产业园、珠海乐士文化区等重点创新实践基地，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深度访谈。

一、新的社会阶层相关概念

（一）新的社会阶层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是指我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阶级变化、阶层重组中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具有相当数量的人所组成的一种特殊阶层。^① 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表述，“新的社会阶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阶层的概括和统称，相对于原有的社会阶层而将其称为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提法，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作出的科学论断。^②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③ 这次讲话不仅正式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一词，还指出了该群体的职业范围、出现背景、流动变化特质，并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属性进行了阐述，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上述六类人。

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作为十二类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之一，并对新社会阶层作出了新的权威界定。自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范围发生了新变化，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及新媒体从业人员四大类群体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

纵观 10 年来党和政府界定的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和内涵，其涵盖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由于群体构成、职业特征、作用发挥等方面的差异性，新的社会阶层由六类人变成了四大群体，以知识分子为主，原先所讲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已不再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是纳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范畴。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

① 叶国平：《完善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前沿》2008 年第 8 期，第 71 页。

② 《新的社会阶层提法的由来？》，2014 年 5 月 4 日，<http://tyzx.people.cn/n/2014/0504/c372202-24972652.html>，2020 年 2 月 5 日。

③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6 页。

行方式和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① 政治参与包括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公民团体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② 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是指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通过在现有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提供的政治舞台上发表意见、建议，参加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的政治行为。^③ 也就是说，有序政治参与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参政，属于理性行为。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历程

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于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上，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在我国已有的政治体系中有自己确定的地位和参政渠道。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an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自身发展，呈不断增强的趋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阶段一：政治参与冷漠期

1979年至1988年，可以说是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冷漠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政策的鼓励下，新的社会阶层出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肯定了个体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此时，个体户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主角。时隔六年，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使用了“私营经济”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随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迅速得到发展。相应地，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快速增长，他们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减轻了就业压力，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和便利。此时，他们迫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部分精力集中于经济活动中，整个群体呈现参政意识淡薄的状况，而且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尚未明确，私营企业主又面临“姓资姓社”的困境，他们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自身整体素质不高，地理位置分散，大多数属于养家糊口的状态，一心扑在经营上，基本上没有政治参与意识、能力和条件，更谈不上政治参与的要求。简而言之，这个阶段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总体上表现得相对冷漠。

（二）阶段二：政治参与无序期

1988年至1991年，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无序期。1988年可谓私营经济的黄金之年，这一年，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获得宪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私营企业开始走上合法化、规范化、轨道。工人、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干部、教学科研人员等纷纷下海经商，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扩大，为了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

① 李良栋：《新编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② 张健：《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第117页。

③ 肖太福：《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扩大新社会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7页。

权益,他们开始寻求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但是,这个阶段尚缺乏特定的政治渠道加以容纳和疏导,而且体制机制都相对滞后,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普遍处于无序状态。

(三) 阶段三:政治参与步入正轨期

1991年至2001年,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步入正轨阶段。1991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91]15号文件补充阐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并指明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对策。按照中央15号文件的精神,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及时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并建立了一支代表人士队伍,在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和提升素质的同时对其作出适当的政治安排。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讲话中肯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地位,表明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允许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极大地激发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热情,这一时期,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开始步入正轨期。

(四) 阶段四:政治参与活跃期

2002年至今,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活跃期。党的十六大后,新的社会阶层面临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困境统统破除,确定了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吸收他们参与政治,为其提供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渠道。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扩大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随后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强调,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明确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登上了两会的舞台,标志着整个政治体系确认了新崛起的社会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2002年至今,一系列重要会议报告不仅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肯定,而且对其取得的成绩加以褒奖,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热情日益高涨,呈蓬勃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有两种: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是指在现有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规范运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原则、取向、程序和行为等已经取得政治系统的认可。非制度性参与,是指游离于政治框架之外,通过非正常手段,谋取政治利益。从目前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路径主要通过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五大路径。

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各民主党派。“任何人只要是某一政党的成员,不管其是否参与了影响政府的活动,参加政党这一事实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①目前,参加政党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性组织中加入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建立的党组织。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②另外,也有不少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

^① 李爱华:《现代政治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019年7月8日,<http://www.djyj.cn/n1/2019/0708/c408214-31220982.html>,2020年2月5日。

二是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最主要、最规范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就是通过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实现政治参与，以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和书面意见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当前，党和国家正在不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安排比例，加大在政府参事、特约人员中的安排力度，并且通过制定和完善具体政策畅通体制内外的流动渠道，充分发挥代表人士的正向影响力，以带动一批人，影响一个行业。以广州市为例，截至2018年12月，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426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1名，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7名。天河区重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党员和代表人士的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推选产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多名。

三是通过社会团体实现政治参与。目前，全国各地都有行业协会、商会和其他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如律师可以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计师可以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实现政治参与。随着具有统战性、民间性、专业性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的遍地开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更加活跃。以广州为例，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依托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指导推进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积极搭建“1+4+11+N”的工作架构，2016年9月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以下简称“市新联会”）在全省率先成立，市新联会下设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四个专门委员会。广州全市11个区均成立了新联会，针对不同专业种类人群，成立律师行业分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分会、网络直播行业分会等若干分会。2017年8月，广州市率先实现4类群体和11个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全覆盖，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不仅是联谊和活动的地方，更是代表这一群体发声的地方。这一群体通过社会组织，议政建言，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服务。珠海市大胆创新，为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群，成立了珠海市香洲区新士界社会服务中心，这是广东省首个专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为珠海市香洲区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组织依靠，畅通了其政治参与渠道。

四是通过挂职锻炼实现政治参与。广州市天河区积极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到群团组织挂职锻炼，为他们提供工作历练的平台，增进其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近几年，广州天河区将政治素质好的代表人士安排到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天河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天河分会等统战组织中任职，邀请代表人士列席民主协商会。广州市花都区委统战部通过调研走访的形式，了解政府对挂职人员的需求及岗位的提供情况，精准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到各单位挂职。

五是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政治参与。通过网络新媒体实现政治参与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要的政治参与手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依赖性较强，习惯用网络连接社会。他们喜欢通过网络了解党和政府决策、社会事务，也善于用网络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凝聚网络正能量。如花都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就通过“同声共振联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传媒互动基地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开辟了网上“议政建言厅”，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同声共振联盟”由32家从事网络文化信息服务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组成，在区统战部支持和指导下，组织开展新媒体交流联谊活动，联合开设针对企业、创业、就业的线上课程，推动新媒体人士和企业从“无序生长”到“有序生长”。“同声共振联盟”的龙头企业包括花都早晨文化传媒公司、花都创客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为花都10多家政府部门提供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搭建及运营服务。联盟的企业和新媒体人士针对网络舆情及时发声，纠正网上不实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了维护网络安全的积极正向作用。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总体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呈有序性发展趋势,但在实际的政治参与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自身政治素质的影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政治参与机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机制不完善

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规模扩大的需要,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实施了许多措施,不断完善政治诉求的表达机制。从宏观层面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治参与,如我国已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居民村民)自制度、信访制度等。但是,“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尚未规范化、法治化和制度化,宏观制度发挥功效离不开中观微观制度的细化配套,比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何通过具体机制进入制度渠道进而开展政治参与。

(二) 政治参与动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动机呈现功利性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因,政治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意识萌发及动机形成最原始的动力,当他们从一种社会角色转变为另外一种社会角色时,他们期望快速被社会重新认可。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取政治资源,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保护其经济利益,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展示自身价值,抬高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目前在“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保障权利、维护安全”低层次徘徊,阶层意识较弱,出现了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状况。

(三) 政治参与渠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

自古以来,“精英政治”是中国的传统,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方面,执政党也是实行“精英吸纳”战略,也就是尽可能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精英群体、代表性人士,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安排,吸纳到我国的政治体制内。现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是通过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以及行业协会等途径实现。通过这些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人士基本上是精英人士,属于少数人,而且他们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等的比例也很低,难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有效发声、代言,有些人士即使有参加政协、人大的机会,政治参与也是颇具功利性,大部分是代表个人名望或某个企业和某个行业,处于个性参与层面,能以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的名义参政议政的很少,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则缺少有效途径来反映他们的呼声,政治参与渠道狭窄,政治参与强度不高。

(四) 政治参与水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水平参差不齐

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价值观念、原有职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的政治参与差异较大,参差不齐。中介行业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桥梁,中介组织中的律师群体最为积极,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研究透彻,参政意识高,参政能力强,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如自由职业人员,其中不少人对国家大政方针不关心、不了解,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专业技术或者虽然关注但无法透彻地理解很多政治理念和政策过程,因此即使他们获得了参与座谈会等参政活动的机会,也是难以谈到点子上,更多关注琐碎的细节问题而缺乏整体思路;也有不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尚不稳定,客观上不得不首先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注于本身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政治领域,对政治参与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还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想法颇多,但由于写作技巧欠缺及写作意识不足,很难将想法转换为调研报告或社情民意信息等。由此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状况。以广州市为例,在最能体现各个群体政治参与状况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人民团体成员的任职情况方面,中介行业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律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又高于中介行业其他参政人数,呈现出不均衡状态。

五、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广泛,岗位流动更加频繁,人员构成复杂,缺少相对固定的联系,从他们自身来说,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阶层意识,需要社会各方关注、齐心协力、诸多措施并举,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一) 完善相关制度,畅通参与渠道

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实现政治参与有序化的保证,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应当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的渠道表达出来。

第一,挖掘现有的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制度优势,不断拓宽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参与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主渠道。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要扩大视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专门委员会中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数量和比例要依法按章增加和优化,以议案、提案等方式开展建言献策,最好能在各级政协内专门增设新社会阶层界别并保证一定的人数比例,为其政治参与提供更宽广的渠道和舞台。第二,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人才培养计划范畴,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吸纳,可以考虑通过培养、选拔、推荐的方式,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优秀代表吸纳进去,加大选拔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担任领导干部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力度。第三,尝试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目前,通过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不定期向其征求意见、建议,是普遍做法。但是要使执政党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的交流机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意见征询制度,通过定期组织民主恳谈会、座谈会、咨询会、听证会的方式,让新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代表人士养成提意见习惯,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新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提供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要规范设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工作流程:定时征集、分类交办、限期办理、及时反馈、跟踪督查,完善反馈机制,建立建言献策“封闭式”流程。第四,建立公共治理平台。积极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特约人员、行业监督员,邀请其列席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帮助他们了解最新政策,发挥其自身特长,聘任他们担任政府顾问,还可以安排新社会阶层中的新媒体代表人士列席两会等,推进政务公开,参与社会管理。第五,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建立行业智库,发挥其自身优势,可以尝试集合本行业、本单位的精品成果,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咨询意见与解决方案,实现其政治参与。

(二) 加强教育引导,规范参与行为

阶层意识觉醒和成熟的标志是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

第一,要定期组织学习培训。通过干部培训学校或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形成常态化、稳定化的培训机制。一方面,通过培训让他们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熟悉政治系统认可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及相关程序;通过学习加深他们对国情的理解,引导他们客观冷静地看待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阶层意识。目前各大省市都纷纷实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三年培训计划。第二，要量体裁衣，定做培训方案。新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程度低、自由度大，管理比较松散，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政治意识等方面，四大群体各不相同，而且差异很大，要使培训工作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就应该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训需求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真实情况，量体裁衣，分类施策，在此基础上形成培训方案。第三，要重点培育，树立标杆。目前，从实际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存在情况不明、底数不清、管理不精的状况，应运用现代科技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实行动态管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物色一批高素质、有代表性的人物，建立档案，有意识地培育中坚力量，以骨干型代表人物的示范效应带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第四，要开拓创新，创新培训方式。通过开展学术沙龙、国情调研和参观考察的方式，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举办研讨班、实践班、学习班，创新培训模式，帮助他们不断增强理性参与政治意识、全局意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引导他们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来思考问题，超越个人狭隘利益，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三）细化组织管理，提供组织依靠

第一，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处功能。目前，各大省市纷纷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处，但有相当一部分处室的设立，流于形式，出现了几个处室一套人马的模式。为了完善组织管理，应选好配齐干部队伍，专人负责，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反映意见建议，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第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鉴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职业多样，又属于“体制外”，联系和归宿的部门、组织多头，并且大多与政府部门及其相关单位没有隶属关系的现状，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团体积极参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的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尤为重要。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纷纷建立，但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部门相互协调，积极配合统战部完成的对新社会阶层的调查摸底工作并不理想，新的社会阶层仍处于底数不清的状态，作为人才培养基地、选拔考核平台、参政议政阵地以及群体活动载体的功能的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做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工作，充分发挥其统战功能。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资源丰富的地方，创建集利益表达、资源整合、诉求实现于一身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创建联谊会，一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培养、推选更多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二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四是搭建交流联谊的平台，为会员的事业发展、个人幸福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以尝试构建“叶脉式”工作网络，从“主干”到“末梢”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开展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承担“主干”角色，各大行业分会承担“支脉”角色，“主干”“支脉”齐头并进，最后依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沙龙和新媒体平台打通“末梢”。第四，支持社会化的社团组织发展。目前，我国各类新的社会组织数量和种类快速增长，其具有为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愿诉求、协调相互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参与公共事务、规范各自行为等功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特定的环境下，能够快速形成自足、自恰的组织方式，外在“他组织”的“强力”进入往往效果不佳，所以要帮助这些社团组织快速发展。

责任编辑：念兴昌

民族工作研究

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红河实践

孙桂琴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关乎国家安全与稳定, 关乎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云南考察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 红河州着力打造民族团结示范州,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2019年12月11日,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认为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富有边疆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创建路子, 为云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了贡献,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要求进一步强化示范州的引领带动作用, 不断创新民族团结方式, 放大示范效应, 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 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力争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州; 红河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45-10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历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民族团结进步问题, 始终是促进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石,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社会问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活动, 是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 从党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全局提出和要求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云南的民族工作, 尤其是近年来, 中央领导以及国家民委等有关部委曾多次深入云南民族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工作, 对云南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云南经验”“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的总结和概括。早在2011年5月, 国务院关于积极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①的战略定位。

2011年9月9日, 习近平同志对云南作出了“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不懈奋斗”的重要批示。2015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 再次强调: 民族团结进步“仍然是云南民族工作的总任务”和“在云南, 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红河州的民族工作是云南省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缩

作者简介: 孙桂琴,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教授, 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战线理论等。

^①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2011〕11号), 2011年11月3日。

影，也是全国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缩影。因此，红河州加速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意义重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尤其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有关讲话精神，为红河州做好民族工作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红河州加速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基本立足点。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加速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事关全州的改革发展大局，事关全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事关边疆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福祉。

2012 年以来，红河州委、州政府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牢抓住中央和云南省委的重大发展战略部署，积极探索和努力推进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发展模式，全力开展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创建活动，使全州民族团结和谐进步事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深入人心，474 万人的全州各民族人民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而不断地凝聚起加快推动全州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磅礴力量，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新成就和新篇章。

一、全力推进创建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实践活动

（一）不断完善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指导思想

早在 2012 年 10 月，面对全州经济社会发展贫穷落后的局面和极为严峻的发展形势，州委、州人民政府在 2012 年 11 月 18 日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的意见》，并指出全州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就是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紧紧抓住桥头堡建设的战略机遇，全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州委和州人民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又制定出台了《关于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实施意见》，在此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建工作主题，紧紧抓住新时代的各种发展战略机遇，以共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凝心聚力搞建设，开拓进取促发展促跨越，以边疆发展繁荣促进边疆和谐稳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为边疆繁荣稳定摸索新路、积累经验、做出示范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与此同时，州委州政府紧密结合由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经济社会整体发育滞后，小康实现程度与全国、全省有较大差距；全州地处边疆、属原战区，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发展不平衡、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问题并存以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交织的基本州情特点，确定了全州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创建活动。这是新时代全州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弘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化传承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示范效应，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全州各族人民群众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全州各民族人民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增强各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长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历届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紧密结合全州民族工作实际，努力探索和不断开拓创新民族团结稳定工作的新路，走出了一条独具红河特色和富有创造性的新路子，使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稳定工作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展和推进。

（二）正确确定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发展新目标

红河州是全国唯一以哈尼族彝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又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的民族自治州，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示范性作用。千百年来，红河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相处，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同舟共济，曾创造了许多的“云南第一”^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7年11月，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为主题，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始终将民族工作置于事关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常抓不懈，始终全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州委州政府团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有效途径，把中央和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与本地区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发展力度。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建设“美丽家园”、实施“中国梦·红河路”行动计划，全力“融入滇中、联动南北、开放发展”的发展战略为载体，以整村、整乡、整族、连片大力推进综合扶贫开发为抓手，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进程，使全州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边防巩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局面，全州更具发展活力、更加和谐稳定、更加宜居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目标逐步显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示范州建设主要从10个方面做出了示范，即各级领导示范、单位部门示范、行业系统示范、农村农户示范、学校师生示范、城市社区示范、企业公司示范、部队军营示范、个人群体示范、宗教活动场所示范等；实现了三大跨越，即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社会事业进步实现跨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

（三）砥砺前行和实施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新举措

2013年至2015年，全州开展了示范创建第一轮“十百千万”工程建设，推动了3年行动计划，确立了“4个1”工程（2013—2015）行动计划，即利用3年时间，具体实施了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20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100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分别为3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5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65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1000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户。2016年开始，在第一轮3年行动计划的示范点创建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推进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的创建工作进程。到2018年末，全州的各项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各项工作均朝着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目标之时，把全州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稳定、更具发展活力、更加宜居生活的示范州的发展的新要求奋力前行。州委州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的要求，以抓好2区（回族聚居区、行政接边地区）、3县（元阳、红河、屏边非边境3县）、1境（南部边境一线）、1市（城市民族工作）为重点，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进程。因此，2000年以来，州委州政府多次被国务院和国家民委、省委省政府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全省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比如，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屏边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共同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还有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李彩云同志、弥勒市西三镇蚂蚁村委会的曾虎龙同志、金平县金水河镇普角村委会广西寨村小组的刘富珠同志，共同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① 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等。

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深入开展创建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历届州委州政府始终把抓好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工作，摆在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在全省率先在不接边的非边境 3 个县，即元阳、红河、屏边县，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先行先试工作。比如，早在 1999 年，在蒙自草坝镇的十七村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团结示范村，并得到了国务院、国家民委和省民委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为认真总结和推广红河州的工作经验，2012 年 7 月 12 日—15 日，国家民委组织全国民委系统的主要领导同志，到红河州召开了民族团结示范村现场会，有效探索了新时期红河州民族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同时，在个旧市的和平小学、驻州解放军 77293 部队、个旧市的沙甸电冶厂、建水县的东林寺社区、个旧市的妇幼保健院等 42 个试点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实现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项工作，进农村、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社区、进医院的“6 进”创建活动。到 2018 年，全州已创建民族团结示范行政村 358 个，占全州 1285 个村委会和社区的 27.85%，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团结示范的各项工作。经过多年来的创建活动，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行各业、各个系统的领导同志都能够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稳定进步发展的各项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列为每年对各级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晋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由此，全州基本形成了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顾大局、识大体，人人都讲民族团结进步、和谐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力争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1. 全州经济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经济总量快速提升。2013 年，全州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了 1000 亿元大关。2014 年和 2015 年，全州生产总值分别达到了 1127.07 亿元和 1222.28 亿元，分别增长 10.0% 和 10.2%。到 2018 年，全州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不断加速提升，达到了 1593.77 亿元，比 2015 年的 1222.28 亿元，增加了 371.49 亿元，在全省 16 个州市中的排名从第 4 位上升到第 3 位，在全省 8 个民族自治州中居首位，在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的排名中从第 3 位上升为第 2 位（见表 1）。

表 1 2018 年，全省 16 个州市、全省 8 个民族自治州、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

生产总值排名前 4 位的生产总值的具体排位情况

（单位：亿元）

全省生产总值排名前 4 位的州市及位次	昆明（1 位）	曲靖（2 位）	红河（3 位）	玉溪（4 位）
生产总值	5206.90	2013.36	1593.77	1493.04
全省 8 个民族自治州排名前 4 位的州及位次	红河（1 位）	大理（2 位）	楚雄（3 位）	文山（4 位）
生产总值	1593.77	1122.44	1024.33	859.06
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排名前 4 位的州及位次	伊犁（1 位）	红河（2 位）	凉山（3 位）	昌吉（4 位）
生产总值	1917.22	1593.77	1533.20	1367.30

资料来源：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红河州统计年鉴》《红河州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的相关数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红河州委州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培植，在全面推进自治州区域内铁路、公路骨干交通网络建设的同时，大力实施综合交通 5 年攻坚行动计划，先后投资近 160 亿元用于县乡村公路建设，使全州乡镇公路通畅率达 100%，行政村公路通达率达 100%，90% 以上的自然村基本修通了简易公路。全州 89.3% 的行政村（所在地）开通了客运班车；启动实施了山区水利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中小灌溉防渗漏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和山区“5小”水利工程等建设；集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城网改造工程，基本实现了全州北部地区500千伏、南部地区220千伏标准网架全覆盖；重视加强民族地区产业培植，先后整合资金60多亿元投入南部山区综合开发，着力打造“6个百万亩”优势产业群和“4大特色”产业群，加快推进北部地区百万亩高原特色产业示范建设，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红河南部连片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自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红河南部区域6县的发展问题，加大南部5县连片贫困区域的山区综合开发工作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全力推进南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使南部区域6县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比如，2012年，南部区域6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06.98亿元，每县平均为17.83亿元。2015年，南部区域6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3.33亿元，每县平均为30.50亿元。到2018年区域总投资增加了351余亿元，平均每个县为近58.5亿元，生产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也就加快了各类产业建设的步伐和进一步推动了南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区域各县的年均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见表2）。

表2 2015—2018年，红河南部5县连片贫困区域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县份	2015		2016		2017		2018	
	总值	%	总值	%	总值	%	总值	%
元阳	407252	10.5	449814	10.1	497360	10.2	533641	7.5
绿春	267079	13.5	297980	12.2	335256	11.6	371080	10.7
金平	428511	13.1	474769	12.0	532490	11.5	584446	10.0
屏边	257328	14.1	288639	12.7	323054	11.1	356683	10.2
红河	310510	13.1	353853	12.5	394125	10.2	438987	11.0

资料来源：2015—2019年《红河州统计年鉴》《红河州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相关数据。

3. 全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略进程加快推进。红河州山多坝少、边境线长，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相交、属原战区，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等，特殊的州情十分突出。全州少数民族不仅众多，且分布面广，总体上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到2015年末，全州尚有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589697人，占全州总人口的12.43%，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12.5%，居全省16个州市的第3位，贫困发生率16.0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41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末，全州从7个贫困县下降至5个贫困县，两个县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的目标；全州贫困村从786个村下降至390个贫困村，3年来有396个贫困村实现了脱贫；全州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从58.96余万人下降至26.51万人，3年来脱贫总人数为32.24万人。因此，到2020年末，按照党中央和云南省委的要求全州能够如期实现全部脱贫目标。

（三）着力改善民生，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自2015年以来，红河州通过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和区域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先后投资166.1亿元，用于南部区域的扶贫攻坚发展战略，其中81.4亿元用于边境沿线的金平、绿春、河口3个民族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7个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同时，州委州政府每年安排2100万元资金，重点扶持不接边的各县开展“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先行先试工作。一是大力开展兴边富民示范村的创建工作，到2018年，在全州创建了“兴边富民示范村”183个，占全州1285个村的14.2%；二是大力实施边疆特困民族地区连片综合扶贫开发战略，到2018年，全州整合各类资金达109亿元，先后对金平县的布朗族（莽人）地区、红河县的垭玛三村地区、绿春县的黄连山地区、屏边县的新华乡和和平乡、建

水县的坡头乡、石屏县的大桥乡、金平县的者米拉祜族地区等,实施连片综合扶贫开发工程,使当地 18.4 万人农村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三是深入实施“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整合州县(市)两级各类资金达 350 多亿元,完成做特民居 16.96 万户、做美村庄 275 个、做优集镇 37 个;四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五个示范”“融入滇中、联动南北、开发发展”的战略方针,着力抓好“十百千万”工程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五是集中财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办好 140 余件惠民实事,加大推进定点挂钩扶贫、异地开发扶贫、劳动力素质培训和社会帮扶等综合扶贫力度,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逐步改善和不断提高各民族生活水平,使红河州 2015 年以来的居民人均经济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经济可支配收入,在全省 8 个民族自治州中居于前 3 位的发展水平。(见表 3)

表 3 2015—2018 年,全省及 8 个民族自治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单位:元)

区域 \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全省平均收入	26373	8242	28611	9020	30996	9862	33488	10768
红河	26002	8599	28342	9449	30808	10356	33396	11330
楚雄	26763	8327	29200	9181	31653	10044	34154	10988
大理	27081	8766	29371	9612	31779	10525	34298	11490
文山	23753	7699	25778	8403	27995	9184	30242	10030
德宏	23010	7917	24943	8659	27013	9464	29093	10325
西双版纳	23304	10080	25233	11049	27201	12043	29323	13079
怒江	19010	4791	20721	5299	22648	5871	24558	6449
迪庆	27097	6487	29439	7088	31853	7776	34411	8524
全省 8 个民族自治州平均收入	25752	7388	26179	8529	26318	8345	31184	10276

资料来源:2015—2018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2015—2019 年《云南领导干部手册》、全省各自治州 2015—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

(四) 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1. 深入实施教育事业振兴“金秋计划”。全州在重点抓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两基”成果得到了巩固和提升的同时,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州原有各级各类学校 1810 所的基础上,从 2013 年起到 2020 年,计划用 8 年时间,在全州新建、改扩建 300 余所标准化中小学校,新建 450 所乡村幼儿园。每年投入 3500 万元,全面免除南部 6 县农村户口学生高中学费;坚持每年向内部 6 县招收少数民族高中生 800—1000 人到红河北部各县市的第一中学就读,并给予每个学生每年 2000—3000 元的生活困难补助。同时,积极开展对特困少数民族学生救助活动,对考入二本以上大学的农村少数民族特困学生每人资助 4000 元救助金,使全州 2064 名少数民族特困生圆了大学梦。

2.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自 2000 年以来,全州先后打造了一批艺术精品,如电影《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别姬印象》等。其中,电影《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先后荣获“华表奖”和中宣部授予的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奖,《红河》荣获韩国第三届首尔“忠武路”国际电影最佳影片奖、第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受欢迎女演员奖等奖

项。涌现出电视连续剧《山间铃响马帮来》、电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曲艺《花腰女》等一批文艺精品。投资 200 万元资金,以哈尼梯田为题材打造出一台大型主题民族歌舞《梯田放歌》(现更名为《乐作神韵》),充分展示了哈尼族独具特色的梯田文化,并在 2013 年全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上荣获优秀奖,州民族文化工作团随国家领导人赴俄罗斯访问演出并得到了高度赞誉。全州先后荣获省级以上各类奖项 106 个,特别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省第一个以民族族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①

3. 注重开展边防建设、爱民固边、双拥共建等活动。州委州政府自 2013 年起,每年为边境一线的 3.4 余万户农村居民提供每户 1500 元的生活补助,完成边境一线自然村国旗台建设 352 座;全面实施了城乡低保、城乡医保、社会救助等制度,目前全州城乡居民低保对象达 71.7 万余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15.1%,新农合参合率达 99.85%;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播和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了 99.16% 和 98.81%,到 2020 年可达到 100%。

(五)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更加巩固

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媒体作用,不断深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民族团结评比、各民族互帮互助和举办民族节庆等活动,努力营造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互助和谐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使各种民族领域的矛盾纠纷和隐患及时发现和消除。制定出台了《红河州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军(警)营、进宗教场所等“七进”活动,全州共创建民族团结示范点 202 个,不断筑牢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多年来全州没有发生一起涉及民族关系、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始终保持着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六) 加强队伍建设工作,各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茁壮成长

长期以来,州委州政府始终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提拔任用少数民族人才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来抓。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目标,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在一年一度的全州新公务员招考工作中,坚持每年设置计划数在 25% 以上的公务员职位,定向招录少数民族考生。对干部比例较低的民族,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并注重抓好素质培训,使全州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结构比例得到逐年改善,真正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是民族干部的总量得到逐步提升。到 2018 年,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达到了 39010 人,占全州干部总数的 37.45%;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干部 28664 人,占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72.98%。二是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队伍茁壮成长。2018 年,全州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总数达到了 13065 人,占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33.88%。三是全州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学历层次得到了巨大提高。2018 年,全州少数民族干部中大学以上 20566 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51.61%;大专 15124 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37.25%;中专 4220 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11.13%。四是全州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茁壮成长。2018 年,全州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了 25868 人,占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67.66%,占全州事业干部总数的 49.47%。目前在全州范围内有了一定比例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使全州各少数民族的干部

^① 2013 年 6 月 22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项目成功入选。

队伍建设工作,以数量稳步增加、结构逐步合理、素质逐步提升、能力和水平逐步增强的态势快速健康发展。

三、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长期以来,红河州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工作中,始终以政治战略高度看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创建工作,以创新的思维方式做好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以发展的办法解决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中的问题,既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又紧紧立足红河实际,抓住带有全局性的矛盾和问题,实施宣传教育、矛盾化解、载体建设、机制创新等综合举措,创造了特有的工作模式和成功的基本经验。

(一) 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坚强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

州委州政府始终把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定期分析研究,做到各级党委常议、常管、常抓。一是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作风领导和学风领导;二是州、县市两级成立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了乡镇政法副书记和民族工作专(兼)职助理员;三是注重强化党委领导工作的基层基础,积极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探索推行民警任村官工作,进一步延伸了民族工作触角;四是始终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到民族工作各个领域,正确理解和运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依法治国理念,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长期坚持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将责任细化分解到乡镇和村委会,形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协调主抓、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全州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新格局,保证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的各项创建工作健康稳步地向前推进和发展。

(二) 出实招、筑根基,凸显创建工作主题和探索联创共建新模式

结合全州实际,“坚持一个核心,抓实四大活动,争创五个模范”开展创建工作。即以“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构建和谐关系、建设美好家园、振兴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四大活动为载体,以创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确保生态环境优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五个模范为主线。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了3—5年的行动计划,积极向中央、省委争取对创建活动资金、项目、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创建活动提供经费保障。同时,积极探索联创共建模式。一是党委领导联系宗教人士,畅通倾听民声的绿色通道。全州按工业、农业、商业、街道等重点划分为若干个片区,采取各级领导干部“一对一”包片联系,蹲点联系宗教人士和当地群众。二是村党组织联结宗教场所,构建聚焦民意工作体系。搭建全州各县市、各乡镇的党组织联系宗教活动场所平台,定期到挂钩宗教场所开展“宗教知识进支部,政策法规进寺院”的主题教育活动和党员团员志愿服务活动,构筑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阵地。三是挂钩党员联系信教群众,洞察民意民盼活动,围绕“农户增收行动计划”和非公企业党建目标,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

(三) 坚持教育在前、预防在先,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矛盾化解于基层

深入开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实施依法治州战略和普法宣传纲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维理念不动摇,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道德基础。注重打造宣传教育工作的载体和平台,把每年11月份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利用各种媒介、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各类活动,加强主流思想的传播和宣扬;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规、民族知识列为领导干部培

训内容,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警)营、进宗教场所等“七进”活动。始终坚持各种问题和矛盾要早发现、早解决,力争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中,做到不上交、不推诿、不回避,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了邻里关系和谐、村际关系和谐、社区关系和谐、干群关系和谐、民族关系和谐、宗教关系和谐、军民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良好局面。

(四) 用发展的观点解决问题,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打牢坚实基础

在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州委州政府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立足红河南北两大区域各自优势和特点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大力推进南部地区综合开发、城乡一体化建设、兴边富民和扶贫攻坚工程,不断加快南部地区跨越发展步伐,从而使欠发达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逐步缩小区域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近几年来,州委州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南部边疆地区、特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整合各类资金近120余亿元,采取整族整乡整村推进、集中连片综合开发模式,先后对金平布朗族(莽人)地区、红河县垭玛三村地区、绿春县黄连山地区、金平县拉祜族地区实施综合扶贫工程,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使当地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红河南部的直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 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州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一是严格要求全州广大党员干部,在示范州的创建活动中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群众的主心骨,做团结稳定的中流砥柱;二是严格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走访慰问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做好安抚帮扶工作,积极解决实际困难;三是严格要求全州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团结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同一切危害民族团结进步的不法分子和违法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四是严格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争做执政为民、敢于担当的模范,不断增强和激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形成干群同心同向、上下统一、左右联动的良好氛围和发展态势。

(六) 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建立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运行机制

州委州政府结合全州民族工作的实际状况,实施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民族团结信息预警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行政接边地区联防联调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长效机制。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和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特征、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性,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实施差别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各项工作决策得到各族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加强对重要决策事项可能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因素,分门别类地先期进行分析、研判和化解,及时排查问题隐患,科学防范决策风险,保障了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七) 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努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亮点

自2012年以来,红河州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爱民固边”工程,把民族工作、边境管理和边疆发展有机融合起来,统一部署、同步推进。到2019年6月,通过以点带面发展到了378个示范村;率先推动了民族工作进农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宗教场所、进军营的“七进”活动;率先开展“和谐宗教活动场所”“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工作,促进了宗教场所内部、宗教场所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率先在不接边的边疆三县先行先试“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州级财政参照有关政策予以补助,有效解决政策被边缘化的问题;率先推出了“一书一

网一专报”的维稳工作一体化与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动民族团结维稳工作体制机制全面创新，建立健全“大调解”工作体系，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凝聚了推动红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使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亮点频出，各项工作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八）强组织、抓机遇，从高位协同推动各项创建工作有特色

按照州委创建工作活动的基本方针，各县市及时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长为副组长与各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每年召开 3—5 次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对取得的经验及时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同时对在创建活动中产生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并制定相应对策和措施加以及时解决。把各类创建工作列入全州民族工作的“五年”规划之中，列入涉及各级领导干部和成员单位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以此努力形成州、县市、乡镇、村四级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协作配合的创建工作社会化管理格局。一方面是抓住党中央、国家民委、云南省委对于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高度重视的历史机遇，全力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工作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抓住省委省政府建设旅游大省中新一轮旅游业发展的机遇，结合红河州的发展实际，抓典型、做示范。例如，个旧市沙甸立足区位特殊、经济发展迅速和回族文化底蕴深厚等资源的优势，创建“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名镇”发展战略，在北京召开“沙甸回族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示范名镇学术研讨会”，2015—2018 年就制作宣传栏 1135 块，民族知识挂图 2400 余份，广播电视报道宣传 5000 余次，宗教场所宣传 700 余次，大型宣传横幅 140 余条，积极打造“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名镇”5A 级景区，助推沙甸示范区创建工作。同时，州委州政府长期坚持定期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联谊座谈会，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与各族群众共谋思路，共话发展，从而不断调动和激励创建示范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总之，红河州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大力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实践活动，使各民族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本质；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和谐进步事业，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存之根、发展之基，是全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只有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杨松禄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金 晶

(普洱市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00)

摘 要: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为保护和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55-08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 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高度和谐统一、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的少数民族聚居点。^①云南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资源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 由于地处边疆, 相对封闭的文化地理环境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使得一批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保存至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 “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 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由此可见,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概况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边疆省份, 少数民族人口达到 1565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33.4%。云南有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16 个跨境民族、8 个人口较少民族, 有 8 个自治州、29 个自治县、142 个民族乡。云南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迁徙和互动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以及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形成了丰富多彩又极富特色的民族村寨, 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风格。

(一)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 属亚热带温湿气候, 雨量充沛, 河流众多, 山高谷深。由于云南地理条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校) 科研协作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究”(2018SYXTB01)。

作者简介: 金晶, 普洱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① 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特色研究(一) 村寨与自然生态和谐研究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年, 第 1 页。

件复杂,包含多种地貌类型,因而少数民族村寨也呈现出很强的适应环境的特色。世居云南的少数民族利用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建造村寨,有的把村寨建在坝区,有的把村寨建在半山腰,有的把村寨建在江边峡谷。各民族村寨的民居风格也呈现出与自然环境协调融合的特点。生活在湿热坝区的傣族、德昂族、布朗族、基诺族、壮族等民族村寨中的民居是干栏式建筑;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普米族和纳西族摩梭人,其村寨中的民居是井杆式、木楞房、垛木房;生活在亚热带山区半山区的哈尼族村寨的民居是蘑菇房或土掌房;等等。

(二)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反映了本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少数民族根据自己村寨族群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水平来建造自己的村寨和民居。譬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白族民居经历了茅草房、土掌房和瓦房三个阶段,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白族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分布于红河与澜沧江之间的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村寨则大多建在海拔1000—2500米的亚热带山区和半山区,这样便于下山耕耘和上山狩猎。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建筑“土掌房”承袭了古羌人平顶碉楼的结构与风格^①,在生活上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在生产上便于粮食作物的晾晒和储存。哈尼族村寨的布局及其民居建筑特色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体现了哈尼族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

(三)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了自然环境,民族文化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等都会在当地民族村寨的建设中体现出来,比如寨名、建筑仪式、建筑饰物等往往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族群来源、宗教习俗、世界观和人生观。村寨的布局、建筑的形式及象征意义不仅鲜明地展现了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延续、传承和发展。^②在白族村寨内,凡是需要装饰并表达一定文化意义的地方都可以建照壁。照壁上通常写四个大字,有的颂扬功名,有的祈求幸福,有的驱邪避灾。照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成为白族地区特有的人文景观之一。^③傣族村寨的形成深受土司文化及其所信仰的南传佛教的影响,因此,傣族村寨有缅寺、祭祀塔、水井和竜林等公共神圣空间,这些神圣空间在某些时候也是村寨居民聚集的场所,成为特定的社会空间。傣族村寨中还有一个神圣空间“寨心”,“寨心”是村寨的心脏和灵魂所在,也是傣族群众进行祭祀的重要场所。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及其成效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在不断消失,村落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在迅速消亡。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希望对传统民居进行改造,提升居住环境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任由村民自行改造,传统民居建筑和村寨风貌会以惊人的速度被现代钢筋水泥建筑所取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亟待加强。

(一)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

2009年,国家民委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2009年9月8日,国家民委

① 白玉宝:《依山踞岭如碉似堡——哈尼族土掌房建筑群落》,《今日民族》2002年第7期,第30页。

② 王虹:《民族村寨文化空间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新探》,《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05—109、121页。

③ 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特色研究(四)村寨建筑文化研究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一定的标准在全国选择 370 个少数民族村寨作为“民族特色村寨”进行保护与发展的试点工作。至 2012 年底,中央财政三年时间共投入少数民族发展基金 2.7 亿元人民币,专项用于试点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2012 年 12 月 10 日,国家民委与财政部印发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改造和保护 1000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云南省根据《指导意见》与《规划纲要》,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方案与措施。2009—2016 年,云南省共安排省级财政资金 8.5 亿元,整合部门资金及带动社会投资超过 35 亿元,共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561 个,其中 154 个村寨被国家民委挂牌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6 年 7 月 18 日,由省民族宗教委牵头,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共同编制,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的《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印发实施。^①

普洱市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全市有 26 个民族,14 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61%。普洱市各民族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2009 年以来,普洱市贯彻落实中央和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2014 年,普洱市共有 28 个村落被授予全国美丽乡村称号,37 个村落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根据 2014 年《国家民委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 340 个村寨予以命名挂牌,普洱市有 3 个村寨入围。根据 2017 年《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 717 个村寨获命名挂牌,其中,云南省有 113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获命名挂牌,普洱市有 16 个村寨入围。根据 2019 年《国家民委关于做好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相关工作的通知》,全国有 595 个村寨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中,云南省有 93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获命名挂牌,普洱市有 5 个村寨入围。

(二)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取得的成效

《指导意见》与《规划纲要》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为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每个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总投入不低于 600 万元,每个民族特色集镇建设总投入不低于 2000 万元。每个特色村寨、集镇分别由省民族宗教委补助民族发展资金 100 万元、300 万元,各部门按照项目补助标准加大投入,州市县加大统筹整合力度,并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支持。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各试点特色村寨的道路、通信、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村容村貌发生了质的变化。

2. 保护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承载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空间。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就是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保护民居建筑、民族风俗,等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民居建筑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等都会在当地民族

^①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对云南省第十一届政协五次会议第 294 号提案的答复》,2017 年 6 月 1 日, http://mzzj.yn.gov.cn/zfxxgk/zfxxgkml/jytabl/201706/t20170601_48655.html,2020 年 2 月 7 日。

村寨的民居中体现出来。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保留了传统村落的民族建筑风格,同时也传承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比如江城县整董镇是一个傣族聚居区,有 9 个傣族传统村落,其中有 3 个傣族传统村落(曼贺村、曼乱宰村、曼滩村)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政策以来,村寨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传统的干栏式建筑风格突出,同时当地的傣族群众一直传承和延续着泼水节、新米节、赓塔、祭竜等传统的民族节庆和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文化依然十分鲜活。

3. 培育了村寨特色产业

《规划纲要》将“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主要任务,提出“加快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培育特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云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例如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族村寨大鱼塘村凭借壮观的哈尼梯田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普洱市澜沧县的老达保村、宁洱县那柯里村、景东县青云村等一批民族特色旅游村寨也逐渐形成。

4. 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普洱市积极加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2018 年 12 月 29 日,普洱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过程中,少数民族村寨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是重点之一。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的两个拉祜族寨子蒿枝坝和老缅大寨曾经是脏、乱、差的典型。通过示范创建后,村寨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培育成效明显,村民收入提高,蒿枝坝被评为“澜沧县十佳美丽新农村”,老缅大寨被评为“云南省拉祜族特色村寨”。

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模式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近年来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了以下几种保护和发展模式。

(一) 完整保留传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居体系及文化生态系统模式

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的翁丁佤族村属于完整保留传统民居体系及其文化生态系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翁丁村有着较为完整的传统佤族民居建筑——干栏式茅草竹木房,建筑形式与周围环境非常协调。村寨还保留有寨门、寨桩、牛头桩、祭祀房、木鼓房等文化遗存,居民的生活用具也是竹木器具居多。播种节、新米节、护寨节等佤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也延续下来。^①今天的翁丁村能够完整保留传统风貌,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村民强烈的保护意识和长期有效的保护措施。2005 年,沧源县成立了原生态民族村落保护与开发管理委员会,并于 2006 年完成了旅游总体规划,同时,翁丁村的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06 年,翁丁村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翁丁村的保护模式,保护的难度非常大,当地居民对改善生活居住环境的强烈需求与保护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如果进行旅游开发,村寨原有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游客的需要。为了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沧源县重新选址建设翁丁新村,让核心区的村民搬出原来的村寨,使村寨成为纯粹旅游景区。但是,没有原住民生活的翁丁村是否还是活态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呢?

(二) 依照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体系进行修缮重建模式

在实践中,一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采取了依照传统民居体系和村寨文化生态系统,在不改变村寨布局和民居建筑风格的情况下,对村寨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对

^① 钊思伟:《佤族原生态村落——沧源翁丁》,《今日民族》2012 年第 2 期,第 65—67 页。

民居建筑进行修缮或重建的模式。例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乡芒景村的翁基古寨是一个布朗族聚居的村寨。村寨内建筑风貌总体保存完好，保留了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并保存有传统建筑功能空间。为了提升旅游功能，一部分民居进行了修缮重建。这种保护与发展模式在不改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布局、传统民居体系的情况下，满足了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居住环境的需求。但是，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进行修缮重建的时候，也面临着建筑材料稀缺（比如木材）、传统建筑工艺失传等问题。

（三）重建具有少数民族元素的村寨模式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农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对一部分居住条件较差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少数民族村寨基本上采用了现代建筑材料，房屋构造已经没有传统民居的特点。但是，为了体现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重建后的民居将少数民族元素融入到房屋的外观装饰上，使得整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建筑风貌比较一致。这种模式，从村民居住的角度来看会更加舒适便捷，但是缺少了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从而也丧失了文化保护的意义和进行旅游开发的价值。

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得到了有力保护和发展，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村寨无序建设，缺乏科学规划

近年来，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理念不清晰，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保护和科学规划的意识不强，导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风貌被简单粗暴地改变。村寨呈现出的是缺乏规划、杂乱无章的景象，新建的民居外观造型毫无美感，还被涂上各色颜料。有的村寨即使有规划，但是房屋布局成排成行，简单的整齐划一，整个村庄找不到过去传统特色村寨的古朴、自然、和谐之美。在从传统古村落向现代生活迈进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很多缺陷，难以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村庄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不规范。部分少数民族村寨村民的公共环境意识不强，村庄环境卫生差，村寨人居环境不容乐观。

（二）建设理念不清晰，民族传统文化衰落

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传统村寨民居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村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随意重建和修缮传统民居，许多少数民族特色民居被现代建筑取代。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尤其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变得十分艰难，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缺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的实用价值大大削弱，而美学价值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却越加凸显。但是，少数民族村寨的居民只是一味地追求实用性，而不懂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进而也不知保护。

（三）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村寨景观遭到破坏

少数民族传统村寨的形成是各族群众千百年来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地处山区，生态环境脆弱而又复杂。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脚步的加快，村寨周围大面积毁林开荒，以及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绿水青山变成了光山秃岭，少数民族村寨优美的自然景观也不复存在，甚至有的村寨地质灾害频发，已经不适宜居住。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使得农村土地污染、河流污染、白色垃圾污染等问题比较严重，少数民族村寨的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

（四）缺乏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村寨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如，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族村寨大鱼塘村凭借壮观的哈尼梯田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澜沧县老达保村通过民族文化带动乡村旅游。但是，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却无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有短期的繁荣却无可持续的发展后劲。^①

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振兴路径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代“三农”工作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提出，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明确了思路。2018 年 2 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进一步结合云南实际提出“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②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贫困状况极大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接下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实现乡村振兴。

（一）围绕产业兴旺的要求，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首先是经济的振兴。经济发展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强烈愿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振兴，重点是要有产业的支撑，尤其是要培育特色产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优美的自然环境、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发展乡村旅游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村寨自然、人文景观优势，把乡村振兴与特色民居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比如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的景迈山，不仅拥有千年万亩古茶园，同时还有 10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当地的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世代以种茶为生，茶叶的种植与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发展。今天，景迈山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有茶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撑，还形成了乡村旅游、民族节庆、乡村民宿等新的产业业态，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围绕生态宜居的要求，改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人居环境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各族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就是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田园风光。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普洱市宁洱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委会那柯里村是一个茶马古道上的少数民族村寨。在村寨建设和民居建筑方面，那柯里村按照生态乡村旅游进行定位，从村庄规划入手，房屋建设严格按照“坡屋面、灰色瓦”等民族民居风格进行重建。重建后的那柯里村房屋建筑独具民族特色，村庄布局依山傍水。2009 年 12 月，那柯里村被列为云南省第二批省

^① 李忠斌、郑甘甜：《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与反贫困路径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56 页。

^② 《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云南日报》2019 年 2 月 11 日，第 4 版。

级旅游景区；2012年，那柯里村被评为“云南三十佳最具魅力乡村”；2013年，那柯里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9月，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历史古村）之一；2015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文明村”；2017年成功创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①

（三）围绕乡风文明的要求，繁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因为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充满魅力。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把繁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文化与乡风文明相结合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体现在村庄的布局、风貌、自然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和环境，也体现在文物古迹、传统民居，还体现在民族风俗、语言、服饰等方面。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就是要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资源，并将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融入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去。^② 云南省澜沧县南段村的龙竹棚老寨是一个拉祜族聚居的村寨，也是一个保留了少数民族独特文化传统的村寨。2004年，龙竹棚老寨的茅草房在政府的资助下改建为瓦顶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重建后的龙竹棚老寨并未改变村寨的文化传统。村寨里依然保留着一个重要的祭祀空间——佛房。每年在村寨重要的传统节日，比如洒卡节、火把节、新米节、扩塔等节日期间，龙竹棚老寨的拉祜族群众都有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在龙竹棚老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拉祜族传统的文化风俗礼仪十分丰富，成为拉祜族群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龙竹棚老寨的发展在满足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的活态传承。2019年，龙竹棚老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目前，地方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护老寨历史风貌和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同时，对村寨进行规划和开发乡村旅游。

（四）围绕治理有效的要求，提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水平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主导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两级，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推动者，而乡镇基层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项目的具体执行者。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理念和执行力决定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水平。因此，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治理水平。首先，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学习，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提高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治理水平。要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其次，要发挥地方立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建设中的作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自治州、自治县可以通过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来对本民族地方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进行规范。例如，2015年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大制定通过、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单行条例《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对景迈山保护区的10个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管理进行了规定。《条例》的内容涉及村寨管理、环境治理、资源保护、文化保护等方面，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乡村治理的重要法规依据，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第三，建立和完善村寨建设、保护和发展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中的作用。

① 普洱市旅发委：《普洱市旅发委实施旅游扶贫项目助推那柯里脱贫致富》，2019年2月12日，http://www.pegbw.com/zx_nr.asp?id=15623，2020年2月7日。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第1版。

③ 乔晓光、董永俊：《村寨礼俗之花——云南澜沧县拉祜西村寨剪纸传统个案研究》，《美术研究》2015年第6期，第111—118页。

（五）围绕生活富裕的要求，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人才培养

人才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要将人才的培养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经济发展，与村民增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澜沧县酒井乡老达保村就是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典范。老达保村是一个拉祜族村寨；2013 年，在当地村民李娜保的带领下，老达保村成立了普洱市第一家由农民自发组成的文化演艺公司——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拉祜文化，老达保村走出了一条以拉祜文化为特色，依托少数民族村寨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模式。在老达保村，游客不仅能看到村民表演的《老达保拉祜风情》实景剧，还有特色餐饮、民宿、农活体验、特色旅游商品等旅游活动。目前，老达保村已经成为普洱市重点发展的旅游景区景点，民间艺术团的商演经济效益也逐渐显现。截至 2018 年上半年，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外出商演 160 余场，实现总收入 152 万元。^①老达保村在建设少数民族特色乡村的同时，实现了民族文化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当地群众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收益。老达保村的发展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有民族文化传承人。老达保村的拉祜族群众能歌善舞，其中以李娜保为代表的拉祜族歌手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民族歌曲，打响了“快乐拉祜”的文化品牌。二是有经济发展带头人。李娜保不仅用音乐传承民族文化，同时还成立了文化演艺公司，村民既是演员也是股东，公司的发展与村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三是有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培育合作社或公司等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村集体产业，让村民成为合作社成员或公司股东，使合作社或公司的发展与村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四是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老达保村是普洱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哈列贾（HALE-JA）乡村音乐小镇的核心区，并且有相应的项目和资金扶持。老达保村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结语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国家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来进行保护和促进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澜沧县发展民族文化助推脱贫攻坚》，2019 年 1 月 30 日，http://www.pegbw.com/zx_nr.asp?id=15539，2020 年 2 月 7 日。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路径探析

——以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为例

乐 燕，孔 婷，张文娟

（西双版纳州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景洪 666000）

摘 要：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而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就是为了利用好这些资源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是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以该村为例，探讨其旅游扶贫模式的特点、亮点，可以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提供借鉴。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1-0063-06

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以来，我国精准扶贫方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旅游产业关联带动性很强，是精准扶贫中重要的扶贫模式之一。2016年10月，国家12部委联合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指出“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及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可见，发展旅游业对于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珍贵的文物古迹等，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能满足游客生态观光、休闲娱乐、回归自然等需求，旅游业市场前景广阔。西双版纳州位于祖国西南边疆，世居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12个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瑶族等8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老挝、缅甸接壤，毗邻泰国、越南，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人文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本文以西双版纳州昆罕大寨的旅游扶贫模式为例，以期为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提供借鉴。

一、昆罕大寨旅游扶贫现状及模式

（一）昆罕大寨旅游扶贫现状

昆罕大寨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行政村内，为“直过”布朗族村寨，距乡政

基金项目：2018年度全省社院（校）科研协作课题“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研究”（2019SYXTJ28）。

作者简介：乐燕，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州社会主义学院）法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比较；孔婷，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州社会主义学院）科技文化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与传播；张文娟，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州社会主义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府驻地 26 公里,属于山区,国土面积 0.9 平方公里,耕地 771 亩,其中水田 542 亩,村集体林地 250 亩,种植并已投产茶叶 1167 亩,新种沉香 250 亩,坚果 150 亩。同时,昆罕大寨处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更不乏诸如原始热带雨林这样的高品质资源。目前,茶叶种植和咖啡种植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寨内交通设施较差,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贫富差距较小,社会阶层扁平化。总体生活水平较低,其生活方式主要以农耕和传统文化娱乐为主。目前,昆罕大寨村民小组领导班子在政府及对口帮扶企业中林集团工作人员的有效引导下,提升人居环境工作成效显著,村内的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停车场、公共厕所、标识牌、垃圾处理场、净水处理池、排污系统等,村内有固定投放垃圾处,衣物在固定地点悬挂,生产生活用品摆放整齐,禽畜规范圈养等。通过帮扶改造两户贫困户危旧房屋,每户各有民宿客房五间。自 2017 年 4 月动工以来,雇佣本村劳动力,共支付劳动报酬约 40 万元,人均每月约 2100 元;2017 年 10 月开业的咖啡吧和餐饮,聘用村民 13 人,人均工资收入 2000 元至 4000 元,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截至 2018 年底,昆罕大寨村民小组已脱贫 7 户 33 人,如期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同时,中林集团通过对村民进行专业化的岗前技能培训,使村民掌握了餐饮服务、客房整理、会议筹备及接待等方面的基本技能,适应社会及服务社会的能力明显提升。此外,中林集团引进外籍人才,每周举办两场英语培训班,培养村内学龄儿童的兴趣爱好。^①

(二) 昆罕大寨旅游扶贫模式

在确定扶贫项目前期,中林集团深入村寨调研,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积极听取村民对村寨经济发展的想法及愿望,了解农户和贫困户的真实意愿,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扶贫思路及方案。中林集团的扶贫范围包含整个昆罕大寨(不包含周边农田),面积 131.85 亩。总投资约 2550 万元,围绕森林、村落、田园等资源,打造布朗族乡村生态旅游模式,包括生态旅游基地、农夫集市、民宿客栈、稻田酒店、餐饮及道路等建设项目。依托该项目,实施嵌入式开发、融入式发展、植入式运营“三入式”扶贫开发模式。^②

1. 完善工作机制,优化扶贫组织模式。工作机制的健全,关乎到扶贫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完善的扶贫组织有利于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进。中林集团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职责,落实具体工作。同时,中林集团从扶贫政策与建设管理规范着手,组建了项目管理小组和项目专家组。在项目的立项、论证、申报、审批、执行以及评估等环节中,都把责任落实到人。涉及开发的行为都请专家进行环境评估,严格控制开发力度,避免大规模的地形改造,及时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项目进展情况,使政府部门能够清晰定位项目开展存在的问题,给予中林集团更多的政策扶持。

2.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模式。根据昆罕大寨气候、土壤及生态环境的特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适应的产业模式。(1) 积极探索如何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油菜花、芒果种植,为群众经济增收和脱贫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2) 发展特色第三产业。项目开建以来,村内的工程建设及经营的餐饮、民宿都需要工作人员,中林集团积极引导及培训村内劳动力,参与村寨的工程建设和经营服务管理工作。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服务意识。(3)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融合模式。中林集团以原生态文化保护为前提,保护古村落、民族村寨为

^① 访谈中林集团该项目的负责人收集的材料。

^② 中林西双版纳工程设计部:《中林西双版纳·雅德秘依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16 年 9 月。

项目目标，尊重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为基础，打造具有创新性的村寨旅游生活方式。同时，以村寨为主体，联动农田、茶园、林地等资源，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

3. 大力创新合作模式。昆罕大寨主要采用“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运营模式。政府主导政策，企业整合社会资源，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农户为主要参与者，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例如乡村民宿项目在运营中，中林集团负责引进游客资源，贫困户参与到民宿的管理、服务环节，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薪酬，人均月收入可达2400元左右。

二、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对策研究

（一）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的现实问题

1.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昆罕大寨离景洪城区较远，景洪到关坪是高速公路，但关坪到昆罕大寨的道路为柏油路，较为曲折。由于经常有大货车通过，柏油路面被碾压得凹凸不平。目前项目还未完全开发，周边的配套设施，如游客休息区域、医疗设施、金融服务设施等欠缺。

2. 民族文化特色开发不深入。目前，昆罕大寨已开发旅游产品同质化较为突出，没有充分体现昆罕大寨的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挖掘、旅游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深度不够。当地对外销售的产品以低端土特产为主，手工艺品多为竹编产品和民族服饰纺织产品，但仅为家庭手工作坊，没有形成规模。饮食文化方面，农家乐有2家。传统节日“桑康节”“新米节”等节日文化没有充分和旅游项目结合。游客只是欣赏到布朗族文化，无法深入体验，无法理解旅游产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寓意。

3. 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旅游服务人员平均素质不高与旅游教育支撑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村民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只能参与一些低中层次的管理服务工作。因此，政府和入驻企业对村民进行了1期“如何发展乡村旅游业”和2期“布朗族传统竹编技艺”培训，对走上旅游岗位的村民进行“服务人员”相关培训，村民旅游服务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仅通过几期培训，人员素质还未达到旅游服务的需求。农家餐饮服务人才较少，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民族手工艺制作方面还显薄弱。懂农村、懂农业的管理型人才短缺，善于营销的人才缺乏，抵御各类旅游风险的能力较弱。

4. 宣传力度不足。宣传力度是影响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选择的因素之一。目前，昆罕大寨的宣传模式以新媒体为主，但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宣传平台少。

（二）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的对策研究

1.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旅游扶贫离不开热爱家乡的领头人，基层党组织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骨干力量。昆罕大寨应定期召开旅游扶贫座谈会，由党员带领大家学习交流相关扶贫政策，将旅游扶贫模式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传递给农户，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度，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

2.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及沿线绿化景观、护栏、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的维护与美化工作，完善旅游厕所、停车场、观景台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改善外部交通环境。

3. 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首先，可以深度挖掘布朗民族乐曲、舞蹈，并组建昆罕大寨民族歌舞队，同时聘请专业的音乐指导老师对农户进行歌舞培训。其次，拓宽“农家乐”产业链。“农家乐”不仅是提供餐饮的场所，还应该以农家乐场所为核心延伸开发更多的旅游体验产品。例

如,游客不仅可以在村中农户家居住,还可以学习使用农户家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体验田间劳动、传统工艺品制作、一日三餐烹饪等,切身感受布朗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以体验乡村淳朴生活为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方式。再次,结合传统的布朗族工艺,对布朗族民族工艺产品进一步设计开发,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

4. 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对昆罕大寨的村民进行经营管理及专业技能的能力提升培训,使他们成为新型农民。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投入到旅游产业中。针对不同贫困户所擅长的技能,进行乡村旅游要素分配。如有针对性地分类发展农家乐、手工艺、土特产业、导游、后勤服务等。

5. 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必须要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严守生态红线。应合理利用昆罕大寨的环境资源,结合布朗族生态文化理念,开展绿色农业基地等休闲项目,加强与电商的合作,将纯天然无污染的生态农产品推向市场。

6. 多角度进行宣传。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如图文、音乐、小视频等。利用节庆文化进行宣传,开展各类文娱活动吸引游客,推出旅游精品线路。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出“订单旅游”模式。^①游客把特色饮食需求、游玩需求等关键词发到特定的平台上,通过关键词,找到合适的农户;同时,农户可以在平台上与游客进行沟通,再把实际的图片以及价格等发给游客,双方确定之后,完成交易。另外,农户将“游玩套餐”发到网上,游客进行选择并下订单。用订单的形式来提高效益,主动贴合游客需求,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三、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启示及建议

(一) 发挥政府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政府要紧紧围绕扶贫攻坚这条主线,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第二,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总体规划,下本钱请知名的专业机构,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引导性、可操作性。^②注意将乡村旅游规划与相关规划相衔接,避免企业在开发过程中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积极完成统计、信息报送、统筹协调等旅游扶贫工作职能。强化对旅游扶贫工作管理服务职能,安排专职人员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第四,围绕旅游扶贫工程目标任务,统一规划、分类建设、合力投入、整体推进。在有关乡村旅游政策配套、旅游投资信贷和旅游项目审批等方面还需要给予更便捷的通道。

(二) 突出农户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价值取向就是主体开展活动的意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取向。它强调人民在扶贫工作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中心地位,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以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为核心。^③乡村旅游扶贫,其解决途径就是让贫困户及村民融入到乡村旅游产业中,以旅游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贫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贫困户及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链中,才

^① 孙华平、徐央:《基于“家庭农场”的乡村订单旅游发展模式研究》,《理论探讨》2013年第6期,第104—107页。

^② 彭清华:《抓住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新机遇 推动旅游强区建设跃上新台阶》,《广西日报》2013年7月5日,第1版。

^③ 李传兵:《精准扶贫生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第2版。

能保证其充分融入乡村旅游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参与率越高,价值分配越高。^①一方面,政府及基层党组织应鼓励和引导一批有能力的农户利用技术、闲置房屋、资金、土地等,通过就业、旅游餐饮与客栈经营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另一方面,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贫困户,政府及基层组织要制定出适合其参与旅游经营的小项目,针对一些资金缺乏的农户应充分用好旅游扶贫专项资金,帮助其开展旅游经营。目前,我国实施的扶贫模式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同时,还可以试着探索“景区+农户”“协会+农户”等模式,让农户获取劳务、租金等多种收入方式。此外,可以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教育,组织贫困农户参加导游、住宿、餐饮、营销、传统技艺等各类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融入行业的积极性与职业技能。

(三) 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精准打造特色项目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依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既增强了文化自信,又能使其变成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深入调研,对适合发展旅游业的村寨进行重点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突出“一村一品”(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既要留得住游客,又要吸引“回头客”。逐步开发集自然风光、休闲娱乐、健康养生、民俗体验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充分挖掘民族语言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手工艺文化等,推进保护传承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人文旅游资源。注重文化体验,开发与游客互动性强的文化体验活动。

精准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特色项目,推进“旅游+”模式,^②开发乡村体验游、乡村科普游、乡村生态农场、原生态农家乐等具有休闲娱乐、田园体验、农品采摘、文化体验等功能的旅游村。大力开发一批发展田园风光型、景区辐射型、古镇村落型、传统民俗型、自然生态型、森林探险型、养生度假型、庄园经济型等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有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项目。完善乡村旅游要素,多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游客体验感,提高旅游消费力。

(四) 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村民文化素养

首先,不断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乡村旅游业奠定基础。在本地高校或职业培训学校,开设乡村旅游课程,培养了解本土风土人情,具备乡村旅游知识的专业人才。其次,提升农户的旅游文化素养。通过请专家入村培训、到职业学校培训、到其他企业交流实习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增强手工艺制作技能。最后,让农户到相关企业实习,学习企业在旅游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充分提升乡村旅游经营户、带头人、文化传承人、旅游商品研发人员、管理者、服务者的综合素质。

(五)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体验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是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应从国家政策扶持及当地政府层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资金投入、银行贷款、减免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多管齐下改变边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被动局面。其次,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住宿设施。优质的乡村住宿设施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收入增长,吸引游客前往观光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住宿设施,如森林木屋,充分利用低碳节能技术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建筑风格与村寨人文风格相一致。或打造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宿,

^① 邓小海、曾亮、肖洪磊:《我国扶贫旅游产业链优化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7—175页。

^② “旅游+”战略由北京伯联顾问于2015年5月首次提出,并应用于“文山州旅游业发展战略规划”。

提高游客对民族文化的感知。再者，开发优质区位优势住宿营地，满足游客亲近自然生态环境的需求。

（六）坚持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注重环境保护

边疆民族地区大多位于山区、高原、牧区和森林地区，一直以来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脆弱。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不触及生态红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以保护为前提，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旅游项目开发，还是营销宣传工作，都要以保护边疆民族地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为前提，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严守生态红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生态旅游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在开发时，要注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避免生态资源无序开发利用。在开展一些旅游活动时，如进村住宿、进山徒步、实地采摘果蔬山货等，要处理好环境保护问题。

（七）加大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宣传力度，打造知名旅游品牌

首先，启动智慧旅游，加强游客服务站建设，推出多种智能化综合旅游服务平台，为游客量身定制旅游产品，让游客能够切身体验到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及特色民俗。同时，搭建本地旅游在线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路线规划及订单交易服务。其次，实施边疆民族地区旅游品牌战略，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商标和知识产权保护。最后，强化精品意识，引进一批有想法、有实力的专业化旅游企业或者龙头企业投资，安置一批贫困户劳力就业，带动一批贫困户发展旅游。^①可考虑成立旅游扶贫股份公司，扶贫部门利用扶贫资金、物资为股金，引导贫困户以资金、劳力、土地等入股，让贫困户得到红利。形成品牌效应，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线下通过边疆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及民族文化的展示，以及多种社交媒介进行宣传报道，精准营销，进行边疆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推广。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吴忠军：《论旅游扶贫》，《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第 20 页。

宗教工作研究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

杨志银

(云南财经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宗教经济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政策基础“三大基础”从时间起点、思想起点、学术起点“三个起点”上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含的发展规律, 是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中, 有两大基础至关重要: 一是理论基础中的宗教典籍、教规教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二是实践基础中作为传承主体发展载体的信教人数的发展分布情况。

关键词: 宗教经济学; 发展基础; 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69-15

宗教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宗教经济实践进程、宗教经济政策制度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所依赖的三大基础。这三大基础构成一个稳定性极强的铁三角, 成为支撑宗教经济学创建发展的客观基础。这三大基础具有三个起点: 时间起点、思想起点、学术起点。宗教经济学研究的时间起点, 是宗教产生和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点。各门宗教、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和条件不同,^①最早产生的原始宗教和原始宗教经济思想应该作为研究历史的时间起点。^②宗教经济学的思想起点, 是各宗教典籍里的经济思想、经济原则。宗教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是神学者、经济学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宗教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 以及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国家的政党政府的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三大基础”从这“三个起点”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含的发展规律, 就是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宗教政策法规体系是宗教工作和宗教管理的依据, 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基础。由于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在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国家之间, 在政教合一的不同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 是值得另行专题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故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因为笔者对中国宗教经济管理依据的思想理论、国际背景、制度保障、政策法规、对策措施等问题在《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③和《宗教经济理

基金项目: 200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宗教经济关系——宗教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05XJL005)。

作者简介: 杨志银, 云南财经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和宗教经济学。

①杨志银:《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年, 第 12—34 页。

②杨志银:《原始宗教典籍暨信徒行为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第 63—73 页。

③杨志银:《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 第 268—296 页。

论与党的宗教经济观和宗教经济政策的发展进程研究》等论文^①中作了专门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宗教理论是给信教群众树立宗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宗教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理论基础。宗教经济理论主要由宗教的典籍、教义教规和神像构成。宗教界人士的传教活动、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实践的主体和宗教传承的载体,以渗透着宗教文化、贯穿宗教信仰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宗教活动为内容的宗教经济,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实践基础。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宗教组织机构的运转、宗教经济实体的自养经营等等,都是宗教经济的构成要素,成为信仰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下面重点研究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宗教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宗教典籍的形成和构成

以宗教的教义教规为核心、典籍为主要内容、与时俱进的宗教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的宗教理论体系,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笔者对世界三大宗教、道教、原始宗教等宗教典籍中的经济学体系内容、学术研究成果综述已在《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及《对佛教典籍暨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圣经〉暨教义教规和信徒行为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道德经〉暨道教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古兰经〉和穆斯林行为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原始宗教典籍暨信徒行为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等文章中论述。^②下面重点说明其理论基础中的典籍情况。

(一) 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佛教典籍及其构成

佛法、佛典、佛像构成佛教学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佛陀所创建的和和其他佛传承发展的这一系列剖析说明和指点引导佛教徒的理论内容、方法途径、法则体系、经验秘诀等构成佛教典籍的内容。

佛法是佛教学说的理论精髓。佛法,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佛所探索到的人生、世道、宇宙的真实本面,并使众生明白由他诠释、指导解脱人间生死轮回痛苦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道理、道路,以及佛教徒依据这一真实本面而获得永恒幸福、绝对自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佛法分为“入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入世间法,就是有智慧的世间人能通晓的道理和实现佛教目的的路径。出世间法,就是解脱“三界六道”中生死轮回的道理和路径。佛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剖析人生苦难,揭示宇宙奥秘,实现解脱生死轮回的人生目的应该遵循的法则、方法和途径。概括起来说,佛法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佛典是佛教及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阶段编纂的佛教典籍对教义教规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世界佛教共同重视的典籍,就印度佛教而言,最为重要的典籍有《经集》《法句经》《阿含经》《清净道论》等声闻乘经论,《华严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胜鬘经》等大乘经,以及印度大乘佛学概论《大智度论》和《瑜伽师地论》等。佛教从古印度传入其他国家后,与所到国家及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融合发展,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国家属性、民族特色的教派及其佛教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神鬼体系和文化体系,编纂出不同语系和不同重点的佛教典籍。传入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在中国称为汉传佛教。汉传佛教的经典以汉语语系为主,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佛教学者的汉文

^① 杨志银:《宗教经济理论与党的宗教经济观和宗教经济政策的发展进程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14—127页。

^② 分别刊登在《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2017年第4期、第3期、第2期、第1期。

佛典撰述达 582 部, 4172 卷, 约有 4.5 亿字。^① 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 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经典以巴利语为主, 巴利文的主要经典有《南传大藏经》《阿含经》《相应部经》《小部经》《本生经》《波罗夷品》《波逸提品》《法集论》《界论》《佛音》《法护》《弥兰陀问经》等, 修习目的是得证“阿罗汉”果。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两条路线传入中国西藏和内蒙古地区, 以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 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经典主要有《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般若经》《俱舍论》《量释论》《戒律本论》《菩提道灯论》《怖畏九道金刚经》《无上供养经》《妙吉祥名号经》《经藏十地》, 以及藏传佛教概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②。就中国佛教而言, 共同重视的典籍有《肇论》《三论玄义》《摩诃止观》《华严金狮子章》《坛经》《禅源诸论集都序》《宗镜录》等。^③

佛教经典的总集为《大藏经》^④, 简称为藏经, 又称为一切经。大藏经的编纂, 始于释迦牟尼圆寂后的 400 年间, 先后有 4 次集众编纂, 弟子们为了保存释迦牟尼的说教, 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 通过会议方式结集, 形成一致公认的内容。现存的《大藏经》, 按版本的不同, 分为乾隆藏、嘉兴藏等多个版本; 在中国, 按文字的不同分为汉文、藏文、巴利文等三大体系。大藏经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大藏经》按内容, 分为经藏、律藏、论藏, 称为“三藏”, 其中的经藏, 就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 律藏, 就是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 论藏, 就是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其后, 又增加了有关对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 称为“杂藏”, 与“三藏”合称为“四藏”(在一些《佛学大词典》中, 有的把“四藏”分为经藏、律藏、对法或论藏、明咒藏), 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此外, 在这“四藏”基础上, 加上“咒禁藏”, 形成“五藏”之说。《大正藏》,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汉文大藏经, 今天所说的《大藏经》一般通指《大正藏》。《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 是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 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 1934 年印行。此外, 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 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大了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 如《永乐北藏》共收录佛教经籍 1662 部, 6930 卷, 分为 693 函, 当代重刊该书, 全书为 200 册, 每套重 750 公斤, 定价 8.8 万元。^⑤《中华大藏经》自 1982 年开始, 历时 15 年出齐“正编”106 册, 纂修有 200 余册 2.6 亿字的《续编》。2003 年, 河北佛协成功地重印乾隆版《大藏经》后, 政府、佛协和佛教居士齐心合力, 于 2005 年印行百卷《大正藏》700 部, 开启了大陆佛教典籍出版的新篇章。^⑥

(二) 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基督教典籍及其形成进程

《圣经》是规定基督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最重要的典籍, 是基督教信徒经济社

① 方广錡:《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世界宗教文化》2001 年第 2 期, 第 9—10 页。

② 刘朝霞、王永会:《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 年第 7 期, 第 149—152 页。

③ 刘朝霞、王永会:《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 第 150—151 页。

④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 年, 第 7 页。

⑤ 《佛教文化》2001 年 2—3 合刊, 第 85 页。

⑥ 参见 2009 年 9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年, 第 132—133 页。

会活动和生活行为的准则。《圣经》由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写成的《旧约全书》（简称《旧约》，犹太人不称“旧约”）和《新约全书》（简称《新约》）两大部分构成。新约和旧约全书的写作时间历时1500多年。其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狭义上其典籍是指《旧约》的前五卷，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由于最初用不同语种写成和不同派系印制的《圣经》文集，在编译内容的选取和书目的顺序上都有所不同，在公元380年前后，早期大公教会通过严格查证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对此，现代最流行的国际通用英文版《圣经》在前言中有所说明。因此，在不同阶段编印的不同版本的《圣经》包括的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内容上也存在一个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进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圣经》是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目前，中文版《圣经》为1919年面世的“和合本”，分为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本。前两种使用文言文，官话本用当时的白话文。联合圣经公会在1983年决定修订官话和合本，2006年完成了新约部分的修订，即《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在中文版《圣经》中，用来表达耶和華意愿意志强力程度的文字，主要有晓谕、吩咐、立约、条例、命令、律例、法度等形式，用以规定教徒不同的职责和责任，不同的表达方式强调不同效力和效果。例如，民数记第3章里针对利未人、哥辖子孙、革顺子孙、米拉利子孙的职责就作有不同规定。民数记第5章里对“疑妻不贞的试验条例”（民数记5：11—29）的有关试验的目的、程序、方法、用品、结果等也有详细规定。^①

（三）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伊斯兰教典籍及其形成

在《古兰经》以前的经典有《讨拉特》或“摩西法律”、《引支勒》或“福音书”、《宰遁尔》或“大卫诗篇”，被认为是安拉的启示。^②《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生前未汇集成册，是在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才汇集成册，公元651年校订的“定本”（奥斯曼本）成为之后流传版本的依据，由30卷，114章，6200余节经文构成。《古兰经》包含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体系、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礼仪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艺术制度、饮食禁忌制度，伊斯兰教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为了指导世界穆斯林的生产和生活，编辑出版了多种语言的《古兰经》版本。全世界每年到底印刷发行了多少《古兰经》和其它经书，未查找到统计数据。仅在沙特，2004年国王法赫德指示为朝觐客人赠送120万本新印的《古兰经》，并附有16种不同外文的译文，供接受者选择。美国“9·11事件”吸引了众多西方人关注伊斯兰教。在美国书店里所有的伊斯兰教书籍在“9·11事件”后两周内全部售光；在德国，穆罕默德·豪夫曼协助翻译的德文《古兰经》在“9·11事件”这年销售量上升了四千倍。一时间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书籍供不应求。^③中国国内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有10种汉语全译的《古兰经》版本：汉族学者铁铮参照英译本从日文翻译的《可兰经》（1927年在北平出版）；姬觉弥等人从日文和英文本翻译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在上海出版）；王静斋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古兰经译解》（1932年北平出版文言文甲种本，1942年宁夏出版经堂语乙种本，1946年上海出版白话文丙种本）；刘锦标翻译的《可兰经汉译附件》（1943年在北平出版）；杨敬修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在北平出版）；时子周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古兰经国语翻译》（1958年在台北出版，1978年香港重印）；马坚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古兰经》（1981年在北京出版，1986年被沙特法赫德国王印刷厂选为权威汉译本重印）；林松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

① 杨志银：《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18—20页。

②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③ 阿立·蒋敬编译：《环球穆斯林散记2004》，第13、18页。

的《古兰经韵译》(1988 年在北京出版);全道章翻译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1989 年在南京出版);周仲曦翻译的《古兰经》(1990 年在伦敦和新加坡出版)。这些版本中影响较大的是马坚、林松的两种译本。1987 年云南省影印发行木刻版《古兰经》后,先后三次影印了 3500 部。之后第 4、5 次影印了 2000 部,1988 年第 6 次又影印了 2000 部,行销国内外,并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珍贵礼品。^①我国已翻译出版发行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版的《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编辑发行《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系列等读物和杂志,总量达 176 万余册。^②

“圣训”不是穆罕默德本人撰写的,而是他生前传教期间的言行记录,他对《古兰经》准则的所有解释或比喻性阐述,以及他在场而默认的圣门弟子的言论和言行部分的称谓;行为部分称为“圣行”,一般将言论和行为两者合称为“圣训”。《圣训》因整理者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版本。根据圣门弟子的不同记录整理出 10 部圣训集。《古兰经》奥斯曼定本出现后,推动了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从 8 世纪开始对圣训的考证、辨伪、编辑等研究工作,至 9 世纪后半叶,先后编辑了“六大圣训集”^③。但是,伊斯兰各个教派推崇的圣训集有所不同:逊尼派穆斯林推崇的 6 部是:《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穆宛脱圣训实录》《穆斯纳德圣训集》《达吾德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什叶派穆斯林推崇的 4 部是:库莱尼汇编的《宗教学大全》、巴布外希·库米汇编的《教法学家不必光顾的人》、西图汇编的《圣训辨异》和《教法修正》,什叶派神学家汇编而成的这 4 部圣训集,又称为《四大圣训集》或《四圣书》。在 10 部圣训集中,由圣门弟子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贾吉记述整理出来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全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共同遵循的两部圣训集。^④

(四) 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道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道教初创时,除《道德经》和《老子想尔注》为主要经典外,新经书有《太平经》^⑤和张道陵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新造经渐多。道教的诸多经文,无论在道教产生前或后的经籍文献,都不是专门为道教而创设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德高道士有感而发的经典被教派列为经文。道教的经典被称为道藏,包括道教的经戒、科仪、符图、炼养等几类经书,以及诸子百家书籍。^⑥至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编纂的《道藏辑要》收入道书 200 余种,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二十八集,共 200 余册。全国现有道情名目 115 种。^⑦其中,《道德经》被道教奉为最著名的典籍。

《道德经》又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人老子所著的哲学著作。它包括《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道经》主要讲宇宙起源、万物运作规律等天道,《德经》主要讲人德,是人们顺应天道为人处世的人道和世道。后来,《道德经》被东汉时期成书的《老子想尔注》基于宗教立场进行诠释,系统地改造利用,

① 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68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2018 年 04 月 04 日,第 9 版。

③ 周立人著:《思想纬度的重构——以跨文化的势域解读伊斯兰文化》,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年,序。

④ 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7—13 页。

⑤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据史书记载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就有三种,其共同之处是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重构早期道教“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提出了神仙不死的长生观念;主张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和老子学说为治国方针,提出治国方略、修养方术和善恶报应观念。

⑥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第 1035 页。

⑦ 武艺民著:《中国道情艺术概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64 页。

把道家的“道论”和“德论”与长生成仙说、民间道术融为一体,实现了从道家哲学向宗教神学理论的转换,为道教的最终形成和传播做了理论准备^①。该书最早提出“道教”之名^②,老子及其《道德经》因此而被道教奉为教祖和最著名的道教典籍。先秦道教思想和道家文化也经历稷下道家、黄老思想的传承发展,与方仙道合流成为早期的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201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熊铁基教授带领十几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大型古籍文献工程《老子集成》,汇集从战国至1949年历代重要的《老子》传本、注疏本计265种,共15卷1100万字。《道德经》对《黄帝内经》《太平经》《庄子·逍遥游》《抱朴子内篇》等后世著作都产生过较大影响。《道德经》和道教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家,而且影响到魁奈、斯密等西方的经济学家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可以称得上是历变不衰经济学思想的奠基之作。^③《道德经》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非常广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被译成外国文字在西方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④

(五) 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原始宗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原始宗教最初没有经文,后来逐渐将神话、史诗等移植到宗教仪式中产生了一系列仪式经籍,经籍大多保存在巫师和祭司的记忆里,世代口耳传承,绝大多数都没有文字典籍。文字经籍出现后,才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向理性化和理论化方向迈进。这标志着原始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原始宗教阶段。在我国有文字的经典主要有:彝族的毕摩经、纳西族的东巴经、摩梭人的达巴经、藏族早期的苯教经典和水族的经典等。

彝文毕摩经典。据四川凉山州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调查,仅该县毕摩收藏和使用的经书就有115千卷。当地毕摩把经书分为尼素、斯吉和枯色三大部类,形成独特的仪式经书体系。^⑤

东巴经典。《东巴经》是负责主持东巴教的东巴经师用原始象形文字^⑥写成的专用经典,内容涉及战争、宗教、民族、文化、哲学、历史、舞蹈、伦理道德及医药等诸多方面。1999~200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全部《东巴经》译稿,共计16开本100卷,收录经书译本1000册,全称《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林向萧总结介绍了国内外东巴经典的研究情况。^⑦宋光淑从2002年底在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物上发表的论著中,以精选的2114条论文和480多条专著和外文论著为依据,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⑧木仕华述评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关于纳

① 梁宗华:《道宗哲学向宗教神学理论的切换——〈老子想尔注〉“道”论剖析》,《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卿希泰:《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034页。

③ 胡培兆:《〈道德经〉的经济学解读——读〈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经大发现〉》,《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7期,第159—160页。

④ 钱钟书先生1935—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期间,在皮埃尔·马蒂诺(Pierre Martino)的《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等著作的启发下,完成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个时期英国的“中国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杨志银:《〈道德经〉暨道教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⑤ 巴莫阿依:《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第100—104页。

⑥ 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文字,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单字总数约1600个。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被誉为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参见范常喜:《从汉字看东巴文中的超前发展现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⑦ 林向萧:《东巴文化走向世界之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4—51页。

⑧ 宋光淑:《纳西东巴文献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4—19页。

西文化的研究。^① 东巴文化已经成为丽江,甚至云南旅游业中的文化产业和特色经济。

达巴经典。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摩梭人没有文字。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从目前所看到的达巴经书来看,摩梭人已有文字,起初可能是刻画符号,后来以绘画的形式,绘神像、写经书。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象形文字书写体,其文字比东巴象形文字还要原始。相传达巴经有 160 部,我国研究摩梭文化的学者杨学政搜集整理了 90 多部。在宁蒗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下,1999 年出版了属于摩梭人自己的第一本书《摩梭达巴文化》,它生动地记叙了摩梭人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始祖创世,先民采集、渔猎、部族争战、游牧迁徙等,还记叙了有关天文、历法、医药、美术、舞蹈、民间故事等,同时还有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颂歌,对祖先的赞颂,对疾病、灾害恶神的诅咒,以及祈祷部族繁荣昌盛、健康长寿的祝词等等。

(六) 神像是宗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1. 神像谱系在宗教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每种宗教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像谱系。各大宗教的神像谱系是其教义教规、宗教内容的具体化体现和形象化表达。各大宗教神像的雕塑、雕刻、画像,在宗教和宗教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殊的价值和特别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② 所以,我们研究教义教规,研究宗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研究它的神像谱系。

属于一神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对于神像的摆放场地、崇拜条件、应用范围都有严格规定和条件限制。笔者去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奥地利、捷克等世界多地学习考察时,亲眼目睹到基督教大教堂里的神像谱系,其内容非常丰富,神的塑像、雕像、画像非常之多,设计之巧妙、建筑之宏伟、技艺之高超、文化之丰富、艺术之美妙,汇集和积聚了西方世界各个时代的最高智慧、最强能力和最好宝藏,这些构成基督教经济学的无价之宝。

多神论的神像谱系多样多变,非常复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神像谱系的构成和内容有所不同。下面重点分析佛教、道教的神像谱系情况。

2. 佛像谱系与寺庙

佛教的神像谱系是佛教学说和佛教经济学的最重要内容。佛像在佛教神像谱系中的地位最高。佛像造像比佛教学说形成的时间要晚一些。据日本人羽溪谛研究,佛像造像始于公元后一、二世纪。^③ 佛像的造像方式主要有雕塑、雕刻、画像等多种方式,安放的场所有室内、石窟、露天等多种场地。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室内佛像谱系往往与寺庙融合为一个整体。从产生时间看,寺院建造早于佛像造像。

释迦牟尼及其随从弟子最初过着游化生活,随着僧人增多和集会需要有场所,每年“雨安居”^④ 时更需要有专门住处,加上有信徒要求供僧,于是产生了“伽蓝”。伽蓝是佛教寺院的雏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僧院,是僧众居住、办道的宅舍。除大伽蓝外,尚有小型的小屋,称为

① 木仕华:《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西方关于纳西文化研究的述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第 88—9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55 页。

③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 页。

④ 印度每年 5—8 月是雨季时节,游化生活与树下住都不便,且路上虫蚁较多,此时出游难免践踏生草伤害虫命,所以佛陀将每年雨季定为“安居期”。

“兰若”。据说第一位供养房舍给僧众的居士，是频婆娑罗王。^①他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造了“竹林精舍”。佛陀为此专门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完备的伽蓝门前有“门前水阁”，是一个以泥壶藏水的地方，供信众入寺前净面洗手足用。此特点传入中国后，演变为寺院前的蓄水池、蓄水缸等。佛灭后，佛弟子为纪念佛陀，开始建塔，促使塔与石窟的兴起。石窟，始于阿育王时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基本类型。禅窟为僧众禅修和居住之地。印度早期礼拜窟里没有佛或菩萨的像，晚期石窟除塔之外，佛像随处可见。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产生了敦煌、云冈等石窟艺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早有建筑艺术，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中国僧人从一开始就住寺院，无住石窟的传统。中国石窟一般很小，无讲经堂，都是雕像画佛，作为观像之用，在洞窟前或旁另建寺院，作为僧众居住和集会的地方。

建造寺院、塔及佛像的目的是供人瞻礼，为众人提供聚集礼拜的场所。从释迦牟尼佛初创的伽蓝基本法则，到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建造的佛教寺院，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发展。佛教传到中国后，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 68 年）的第一座伽蓝是白马寺，号称“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②中国佛寺建筑自有特色，呈院落式格局。院落式格局的结构有两大特点：早期以塔为主体，塔建立在寺院中心，院庭有廊围绕，正中院庭的前面有殿堂，房院为僧房。后期以佛殿为主体，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之风盛行，这些寺院因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佛像代替佛塔。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汉式佛寺布局已基本定型，采用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常有数十院之多，层层深入，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丽。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则，在南北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东西两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北宋以后，因僧众与信众增多，所有寺院都建立了佛殿。后期以佛殿为主体。

东晋慧远大师居庐山东林寺，开启山林佛教及其丛林生活。之后，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寺的僧居，称为“丛林”，主张不立佛殿，故深山的一些寺院，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并不设佛殿，与佛世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丛林寺院的規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供祖师的祖师殿；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佛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方丈接待室）、客堂、僧寮、客寮、延寿堂（养老之处）；容四海云游僧的云会堂；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另设转轮藏殿或藏经楼，便于僧众习读之用。

从截至现在建造的佛像来看，主要包括佛、菩萨、罗汉、天神四大基本类别，佛教庞大的神鬼体系也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其中，佛是佛教的最高尊神，大乘佛教宣传三世十方，处处有佛无数，在佛典和寺庙里最常见的佛有现世教主释迦牟尼佛，还有过去世的燃灯佛、未来世的弥勒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③次于佛的果位是菩萨，菩萨修到功德圆满也是佛；次于菩萨的果位是罗汉。菩萨是能悟佛道、发愿普渡众生的“候补佛”。常见的菩萨有释迦牟尼佛像旁的文殊和普贤，阿弥陀佛像旁的观世音和大势至。在中国，观音、文殊、

①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 119 页。

② 余桂元：《中国著名的寺庙宫观与教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7 页。

③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 200 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4—5 页。

普贤、地藏合称四大菩萨^①。观音菩萨又有白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水月观音、四臂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等。罗汉是灭除烦恼、超越生死而进入涅槃果味的解脱者，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之说。天神是佛的护卫神，如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鬼有多种多样，以饿鬼最多。^②

3. 道教的神灵谱系是道教学说和道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道教的神灵谱系主要有尊神、俗神、神仙三大类。^③尊神是道教信仰的主要神灵，其中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天尊等“三清天尊”是最高的尊神。起初，玉皇大帝只是三清天尊中元始天尊下属之神。经过唐宋两朝，玉皇大帝的地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唐代皇室尊奉同姓的老子为宗祖，宋王朝把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入国家祭天大典，并为玉皇加上多重尊号，提高玉皇大帝在教内诸多神灵之中的地位，开始构筑以玉皇大帝为首的昊天三界之尊、“四御”“六御”“七御”等神仙谱系。^④

二、宗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信教群众的发展分布情况

（一）世界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佛教理论自创建以来就一直为佛教群众提供了解决人生苦难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路径。因此，中外数以亿计的佛教信众和佛教国家践行佛教理论，为宗教经济学的产生、传承、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下面从古今中外佛教信众的发展和分布情况，来看宗教经济学发展的信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据《国际宣教研究公报》公布，全世界佛教信教人数1900年为1.27亿人、1970年为2.33亿人、2007年为3.86亿人，^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12月18日发布了《2010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该报告称，2010年，全球约有4.88亿佛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7%。亚洲佛教徒约占比世界佛教徒总数的99%，占亚洲总人口的12%，北美和欧洲佛教徒超过100万人。

从佛教信徒占全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分布情况看，1990年代，斯里兰卡占70%，缅甸占80%，泰国占95%。^⑥以下是笔者从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杨增文主编的《当代佛教》一书中整理出20世纪末期佛教信徒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分布发展情况：韩国1977年1300万，人口占比35%（P.289）；英国1980年12万人（P.326）；印度1981年471万人（P.57）；日本1987年9294万人，人口占比43.5%（P.231）；法国1989年50万人（P.334）；美国1990年40万人（P.341）。

① 佛教里的菩萨传入中国后被汉化，早期在信徒中名气最大的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三位，随后又加入地藏菩萨，构成“四大菩萨”。文殊菩萨的来历众说纷纭，文殊的全称是文殊师利，是外来语，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妙德”“妙吉祥”。在一般寺庙里，文殊菩萨通常作为佛主的左胁侍，专管智慧，被佛教盛赞为“大智”，其塑像大多非男非女。在唐代以前唇上常画有蝌蚪形的小胡子，颇似美丈夫；宋代以后，小胡子没有了，面容更加秀丽，腰肢窈窕，趋于中国美妇女模样。她的坐骑是一头青狮，表示智慧威猛；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其说法道场在山西五台山，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始于唐代，五台山在唐代最兴盛时有佛寺360多座，僧尼逾万人。密宗的文殊菩萨，其造型是顶结五髻，表示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之五智；其雕像中还有千手千臂或千手千钵的造型。

②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200神》，第4—5页。

③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200神》，序第5页。

④ 王玲：《玉皇信仰的文化解读》，《中国宗教》2013年第4期，第54—55页。

⑤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⑥ 龚学增主编：《宗教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113、144、216页。

1990 年代,尼泊尔 86.7 万人、人口占比 6.1% (P. 44); 斯里兰卡 200 万人、人口占比 69.3% (P. 91); 印度尼西亚 500—1000 万人 (P. 206); 缅甸僧尼 10 多万人,信徒人口占比 80%,佛寺 2 万座,历史上佛寺最多时有 4446773 座。《2010 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显示,佛教人口最多的 10 个国家在亚太地区,而这些国家佛教徒的人数占世界佛教徒总数的 95%。世界 50% 的佛教徒生活在中国。佛教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占世界佛教徒的 13%,其余国家占比佛教徒情况是日本 9%,缅甸 8%,斯里兰卡 3%,越南 3%、柬埔寨 3%、韩国 2%、印度 2%、马来西亚 1%。^①

历史地看,这 100 多年来,佛教信教人数的增速远远快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佛教信众在全球各大洲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亚洲的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二) 中国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中国佛教信教人数的历史发展情况。据资料记载,汉魏时期的职业僧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外来和尚,从《高僧传》所记载的汉魏时期的 17 位僧侣来看,几乎全为外国人,他们是摄摩腾、竺法兰、安清、支楼迦讖、竺佛朔、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祥、昙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帛延、康僧会、支谦、维祇难。从所见到资料中有关的僧尼、寺庙、人口和僧尼占人口比例等数据归纳整理在表 1,大体可以看出全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

表 1 265—2018 年中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表

单位:人,座(处)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西晋(265—317)		两京僧尼数为 3700	180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东晋(317—420)		24000	1767		
南北朝	宋	36000	1913		④,⑤,⑥
	齐	32500	2015		
	梁	82700	2846		
	陈	32600	1232		
	北魏	2000000	30000 ^②	32000000	
	北齐	3000000 ^③	40000	20000000	
	北周	2000000		9000000	
隋	文帝	230000	50000		
	炀帝	16200			
	末期	500000	4000		

①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 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西部佛学网,2013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china2551.org/Article/fjdt/k/201301/13628.html>,2019 年 10 月 15 日。

② 国家大寺 47 所、王宫贵室五等诸侯寺院 839 所、百姓造寺 30000 余所。为此寺僧也就有了官僧、私僧和民僧之分。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4—15 页。

③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④ 根据《辩证录》和《是氏通鉴》记载;引自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79 页。

⑤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第 13 页。

⑥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第 40 页。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唐	唐		4600		②
	624			0.35%	
	8世纪			0.58%	
	9世纪	260500	44600 ^①	1%	
元	1291	213148			宣政院统计 ^③
明	1586—1587	500000			估计数 ^④
清	1644	118907	79622		清初礼部统计 ^⑤
新中国	1949		50000		
	1997	200000	16000余座		⑥, ⑦
	2018	222000	33500		⑧

(三) 基督教信徒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基督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传播最广、信教人数最多。基督教传遍全球，分布于160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全球基督教信徒达到21.96亿人，^⑨占世界人口的1/3。

基督教传教士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首次进入中国西安开始传教，当时称为“景教”。之后，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唐武宗诏令禁佛，景教也遭波及而在各地绝迹。元朝时，基督教再次传入，元灭后又消亡。明朝万历十年（1582），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在中国传播开来。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基督教徒有70多万人。2003年教徒达到1600万人。^⑩2014年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2.9%。^⑪2018年基督教共有教徒4400多万人，教职人员6.5万人，其中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天主教教职人员0.8万人。^⑫教徒结构变化呈现出五大特点：女性多于男性、年轻化、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教会资产稳定增加、信徒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加大。^⑬

① 全国有寺官赐匾额4600余所、招提（私造者）、兰若（最小的寺院）4万余所。张晓华主持：《唐代宗教政策及其对当代社会稳定的警示性研究》（项目编号：2001142），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2年6月。

② 中国在624年共有占人口总数0.35%的佛教出家人，八世纪初叶为0.58%，九世纪中叶占1%多。[法]谢和耐著：《寺院经济》，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③ 罗莉著：《寺庙经济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④ 全国有度僧50余万，“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尚不在内，《清经世文编》卷七，载倪岳《青谿漫稿》（一）。专家估计明末僧尼不会低于50万人。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64页。

⑤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一）》，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

⑥ 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

⑦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⑧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2018年04月04日。

⑨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27页。

⑩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34页。

⑪ 姜泓冰：《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人民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1版。

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2018年4月4日，第9版。

⑬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18—22，164页。

(四) 穆斯林的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目前,穆斯林分布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世界穆斯林人数及其增长情况:1900 年 2 亿人,1970 年 5.48 亿人,2007 年 13.59 亿人,年均增长率 1900—1970 年为 1.45%,1970—2007 年为 2.49%。^② 目前全球的穆斯林达到 15.7 亿人。^③ 据预测到 2025 年将达到 18.11 亿人。^④ 1980 年代末期,穆斯林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见表 2^⑤。

表 2 1980 年代末期世界穆斯林的分布情况表

单位:万人,%,座。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西 亚	沙特阿拉伯	1443	1370.8	95	
	科威特	205	177.7	93	1000
	巴林	49	47	96	
	卡塔尔	42	42	100	
	阿联酋	176	161.9	92	
	阿曼	165	165	100	
	伊朗	5500	5390	98	
	阿富汗	1581	1565.1	99	15000
	土耳其	5674	1617.3	99	
	伊拉克	1725	1638.8	95	16000
	叙利亚	1171.9	1019.6	87	
	约旦	301	279.9	93	
	黎巴嫩	271.3	146.5	54	
	巴基斯坦	506	455.4	90	
	也门	1200	1188	99	
	以色列	453.7	59	13	
北 非 地 区	塞浦路斯	69	13.1	19	
	埃及	5400	4968	92	180000
	利比亚	430	421.4	98	
	苏丹	2380	1737.4	73	
	突尼斯	789	781.1	99	650
	阿尔及利亚	2370	2346.3	99	3200
	摩洛哥	2400	2280	95	
	毛里塔尼亚	200	200	100	
	西撒哈拉	16	16	100	

①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27页。

③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第1页。

④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27页。

⑤ 表2中人口数据源于《世界知识年鉴》1990/1991;穆斯林人数、比例等除根据上述材料外,还根据科威特《阿拉伯人》所载1987年1月第五次伊斯兰会议发布的相关数字。主要数据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2—88页。部分数据源于或有新数据可参见阿立·蒋敬编译:《环球穆斯林散记2004》,表中备注书名《环球穆斯林散记》及页码。部分数据从《世界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等其它资料查找获得。《古兰经》和《圣训》成为沙特阿拉伯等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依据,由相关国家的司法部、教育部、宗教基金部等部门负责执行,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34页。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南亚	印度	81600	12000	12	
	巴基斯坦	10700	10379	97	
	孟加拉	11900	10115	85	
	不丹	131	3.93	3	
	马尔代夫	19.8	19.8	100	
	尼泊尔	1799	35.99	2	
	斯里兰卡	1659	112.81	6.8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	17400	15660	90	369760
	菲律宾	6010	480.8	8	
	马来西亚	1737.3	833.9	48	2000
	柬埔寨	740	21.46	2.9	320
	老挝	382.8	4.21	1.1	
	缅甸	3935	157.4	4	2266
	泰国	5610	224.4	4	1435
	文莱	24.14	14	60	
	新加坡	265	44.78	16.9	
	越南	6440	644	10	
中亚 外高 加索	乌兹别克	2032	1767.84	87	
	哈萨克	1669	700.96	42	
	吉尔吉斯	437.2	284.18	65	
	塔吉克	551.2	474.03	86	300
	土库曼	362.1	300.54	83	
	阿塞拜疆	714.56	585.94	82	
	乌克兰	5200	200	3.8	
撒哈拉 以南 非洲	索马里	580	574.2	99	
	马里	762	518.16	68	
	塞内加尔	635	546.1	86	
	尼日尔	724.9	616.17	85	
	尼日利亚	11225	8980	80	
	乌干达	1640	492	30	
	几内亚	650	520	80	
	乍得	550	93.5	17	
	布基纳法索	850	212.5	25	
	喀麦隆	1070	160.5	15	
	冈比亚	81.7	70.26	86	
	吉布提	46	43.7	95	
	几内亚	90	31.5	35	
	科摩罗	44.1	43.66	99	
	加蓬	130	3.9	3	
	塞拉利昂	382.2	267.54	70	
	贝宁	445	66.75	15	
	埃塞俄比亚	4788	1675.8	35	
	坦桑尼亚	2300	736	32	
	科特迪瓦	1100	363	33	
	加纳	1390	264.1	19	
	莫桑比克	1493	209	14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撒哈拉以南非洲	肯尼亚	2300	167.9	7.3	
	马拉维	800	88	11	
	扎伊尔	3352.6	50.3	1.5	
	南非	3375	50.6	1.5	
	多哥	340	40.8	12	
	利比里亚	251	37.7	15	
	卢旺达	675	33.8	5	500
	毛里求斯	107.5	17.7	16.5	
	中非共和国	285	17.1	6	
	马达加斯加	1063.5	10.6	1	
	布隆迪	506	10.1	2	
	留尼汪岛	56.9	1.3	2.3	
	博茨瓦纳	121	2.4	2	
	莱索托	168	1.7	1	
东欧和南欧	阿尔巴尼亚	318.24	190.9	60	
	保加利亚	898.5	80.9	9	
	波兰	3790	0.3	低于 1	
	前捷克斯洛伐克	1565	2	低于 1	
	罗马尼亚	2315.16	10	低于 1	
	希腊	1001	15.01	1.5	
	前南斯拉夫	2355.9	318	13.5	
西欧和北欧	爱尔兰	354		低于 1	
	瑞士	662	0.75	低于 1	
	奥地利	755.53	8.69	1.15	
	比利时	987.6	24.69	2.5	300
	冰岛	25.17		低于 1	
	丹麦	512.98	3	低于 1	
	挪威	422.8	1.2	低于 1	
	瑞典	852.6	4.5	低于 1	
	德国	7776.86	213.86	2.75	613
	法国	5630	253.35	4.5	1000
	芬兰	495.44	0.15	低于 1	
	荷兰	1480.52	31.09	2.1	1000
	葡萄牙	1041	0.2	低于 1	
	西班牙	3899.62	5	低于 1	300
	英国	5706.5	81.60	1.43	1000
	意大利	5744.05	12.5	低于 1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北美	美国	25018	160—900	0.6—3.6	600
	加拿大	2530.9	9.8—15	低于1	
其它地区	澳大利亚	1800	15	低于1	
	斐济	57	5	8.7	200
	日本	12224	6	低于1	
	韩国	4162	3	低于1	
	巴西	14176	20—120	低于1	
	阿根廷	3260	30	低于1	
	苏里南	43	10	23	

目前我国10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为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现有2100万人口。^①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余人。^②这两千多万穆斯林生产消费的清真食品和伊斯兰教的国际交流，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这也是伊斯兰教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经济思想来源之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组织穆斯林赴沙特参加朝觐活动，从2007年起，每年人数均在1万人以上。

此外，中国共有道教宫观9000多处，道士约4.8万人，道教院校5所。2007年中国道教学院的首届研究生班学生毕业，成为道教史上第一批由道教界自己培养的高学历人才。道教学校的学历招生不面向社会，只招道士。^③学员经过学习，各门功课考试合格，由学校发给教内承认的毕业证书。原始宗教或民族民间宗教的信徒非常分散，很难用一个统计口径进行全国和全球统计。这些也是宗教经济学传承发展的主体和载体。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王作安：《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2018年4月4日，第9版。

③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8页。

乡村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研究

——基于云南一个苗族村的个案分析

韩 芳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 北京 102206)

摘 要: 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 核心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根基, 当前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存在着信徒迅速增加、传播性较强, 家族信教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 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弱,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目前农村宗教形势整体稳定,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 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力度, 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乡村治理; 云南少数民族村;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D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84-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和引导宗教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云南是边疆多民族省份, 历史原因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信仰基督教的群众较多。基督教既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向功能,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 要理性看待宗教信仰问题, 对其加以正确引导, 处理好农村宗教信仰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课题组选择了云南省 F 县 S 村, 对该村的五个村民小组, 重点是基督教信徒较多的苗族为主的 J 村民小组开展驻村调研, 抽样调查问卷 92 份, 走访基层干部、教职人员、信教群众、不信教群众和各类农户共 80 余人, 现场观察礼拜活动, 查阅相关资料, 并在省、县、乡、村召开座谈会, 通过多种形式对调研地区农村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情况做了深入了解。总体来看, 调研地区民族分布广、信教人数多, 情况复杂, 但宗教事务管理整体规范有序, 形势较为稳定。宗教在农村一些地区,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当地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民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影响较大,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 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增加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 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基金项目: 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北京市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项目号: 201945)。

作者简介: 韩芳,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会工作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理论命题,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学者通过对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和相互关联进行研究,认为作为农民群众的信仰和农村文化组成成分,宗教部门加强管理,宗教能够在少数民族信教较多的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何明,钟立跃,2007)^①。有学者对河南省豫西地区X村进行的宗教信仰状况调查,认为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只有和新农村建设相互融合才能为农民服务,才能建设好农村(王冬,2011)^②。有的认真总结农村基督教的社会功能,认为基督教具有有利于社会的功能(杨宏山,1994)^③,能够发挥心理疏导,社会控制、人际交往与认同等积极功能,但是容易产生宿命论,形成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等消极功能(顾亚林,侯星芳,2004)^④。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如有的学者通过对华北村落的研究,认为基督教对重构家庭关系和简化邻里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刘海涛,2006)^⑤。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从农村社区人际关系、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生活和政治生活四个方面来看基督教信教人群的增长对基层治理的多元影响(胡叠泉,2009)^⑥。有学者在深入研究江苏省基督教的基础上提出,基层教会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和威信甚至超过当地基层组织,这会对当地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形成一定的竞争和威胁,这一问题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⑦。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较欠缺地区的宗教问题要格外地给予关注,尤其是对地方基层政权的影响问题,基层地方政府要妥善处理好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宗教组织团体与基层政权的关系^⑧。

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关注农村基督教问题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从乡村治理层面开展宗教研究的相对较少。云南省F县S村基督教起源早,信众多。课题组选取F县S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开展蹲点研究,力争在研究过程中与村民深度接触,了解真实情况。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50份,有效问卷122份,占比81%,访谈省农业厅、昆明市民政局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县相关部门及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0人。希望通过对云南省F县S村的个案分析,对了解云南农村基督教发展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进而对基层党委、政府做好农村宗教工作,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云南省F县S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 基督教发展现状

S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北郊,海拔2300米。全村有农户150户共450人,有4户汉族,是

① 何明、钟立跃:《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学术探索》2007年第10期,第107页。

② 王冬:《不断发展中的融合:新农村建设中基督教的功能分析》,《理论前沿》2011年第9期,第316页。

③ 杨宏山:《皖东农村“基督教热”调查与思考》,《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第35页。

④ 顾亚林、侯星芳:《逐渐走进更多农民心中的上帝——对农村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分析》,《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59页。

⑤ 刘海涛:《透视中国乡村基督教》,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

⑥ 胡叠泉:《基督教信教人群的增长对农村社区公共生活的影响——以湖南h镇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2009年。

⑦ 张全录:《江苏基督教现状及发展趋势》,《唯实》2010年第3期,第83页。

⑧ 段琦:《对中国基督教发展原因分析的检验——以广东汕头和河南南阳调研为例》,《汕头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页。

昆明市较大的苗族村寨。村里80%的人信仰基督教。调研发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宗教与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相融合,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主要从问卷情况来看S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

本次调查中有效收集的男女性比例分别为36.9%(45人)与54.1%(66人),未填写样本11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22份。从年龄层次来看,36—59岁的中年人群占了将近半数,共有57人(46.7%),其余19—35岁与60周岁以上人群占比相同,分别有27人。低学历者(低于高中)占大多数,共占比92.6%,其中小学学历55人,初中学历28人,无学历17人,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只有8人,有效占比1.9%。已婚者所占比例最高(93.1%),共有94人,而未婚和丧偶分别有4人和3人,不存在离异的情况。在调查被访者家庭人数时,家中共有4人的占比最高,有32户,其次下来是6人以上,3人,2人,5人和1人。问到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时,大多数被访者选择了不填写,而在填写的比例中2人比例最高,达到了34.6%,其次是1人。

(二) 基督教发展的特点

1. 农村宗教发展历史渊源深厚。信教群众和宗教场所数量较多,F县苗族村庄的基督教教徒比例远高于汉族村庄,汉族村庄多数仅有2—3户信基督教,30%的村民初一十五到佛教寺庙烧香。固定来S村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378名信徒中,苗族340人,汉族38人,主要集中在S村。1937年,S村教会成立,1958年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聚会。1982年,教堂建成,1998年重建。教会现已发展为一堂五点,信徒378人。每周星期天有两堂礼拜。S唱诗班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2005年受邀到澳门交流,首次坐上飞机。2012年,参加中国首届苗族农民合唱艺术大赛,获金奖。2018年应邀到美国、英国演出,在国际上获奖。唱诗班已成为F县乃至云南省的一张名片,并由唱诗班发展为“苗族农民合唱团”。

2. 信教群众特征分布明显。从调研所在地看,农村宗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女性和中老年人群,文化层次普遍较低。F县S村教堂378名信徒中,苗族占总信徒人数的89.9%,女性人数占比为6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66.1%。

3. 农村宗教传播性较强。在访谈中发现,基督教在宣传孝敬父母、与人向善等道德的同时,往往掺杂一些“一切都是主的恩赐、信主能治病、能带来好运”等思想,不少教徒对此深信不疑。农村基督教徒因为父母、亲属、朋友信教而受到影响的情况非常普遍,S村教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4.6%的信徒是因为亲属信教而信教。村里一位10岁男童患白血病,跑遍云南医院宣布无法治疗,最后由上海来的牧师介绍到上海医治,情况好转,加深了村民认为信教可以治病的想法。

4. 基督教信徒呈现家族信教现象。S村有教会唱诗班发展起来的苗族合唱团,其影响力、发放误工补偿和国内外演出机会吸引了年轻人加入。合唱团虽然是独立法人的社会团体,但是由于与教会的历史渊源,成员主要是信教群众,近几年吸纳的新成员也主要是基督教信徒,曾经发生过退出基督教的团员被清理出合唱团的事件,因此,信教成为默认的合唱团准入的门槛,这个原因导致S村信教的年轻人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5. 农村宗教形势整体稳定。一是强化组织领导。F县成立了县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会议。还制定了《F县领导干部联系(走访)宗教团体、活动场所以及宗教人士制度》,33名县级领导挂钩联系三个宗教团体班子成员和主要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二是依法管理宗教。F县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创新管理体制、开展创建活动等方式,依法加强对当地宗教的管理,通过推进宗教工作“一网两单”,与各镇(街道)签订了《民族宗教工作重点任务交办单》《民族宗教目标管理责任书》,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了宗教工作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三是加强教育引导。F县每年都举办宗教代表人士培训班,支持县基督教三

自爱国会、伊斯兰教协会开展培训，选送年轻教职人员参加上级统战、民宗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

三、F 县 S 村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核心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根基。从云南省 F 县 S 村调研情况看，面对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的新形势，农民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变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农村宗教工作有待加强。从思想认识上来看，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停留在“不出事”阶段，工作重点停留在规范宗教活动阶段，在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方面思想没跟上。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各部门之间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有的部门认为宗教工作是宗教部门的事情，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普遍不熟悉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

（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在 F 县 S 村驻村调研中感受到，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总体较强，但也存在组织和工作不到位问题。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群众遇到问题一般会寻求多种渠道帮助，其中找党支部或者村委会的占比 88.9%，找乡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占比 15.7%，找宗教组织帮助的占比 8.3%，找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占比 3.7%。访谈中发现，村民反映遇到生产、生活困难时，村委会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教会却能够主动提供捐款及精神上的慰藉，甚至少数村民对村干部做事不公平反映强烈。

表 1 群众信仰基督教的原因

信仰原因	频率	百分比
承袭家庭传统	47	38.5
生活困难	40	32.8
生活压力	38	31.2
治疗疾病	33	27.1
学到知识	11	9.0
融入信教群体	6	4.9
打发时间	2	1.6
求永生	1	0.8
爱国	1	0.8

表 2 基督教信众遇到问题时的求助对象

遇到困难和纠纷求助组织或个人	人数	百分比
找乡政府或者有关部门	17	15.70%
找党支部或者村委会	96	88.90%
找宗教组织	9	8.30%
找其它组织或者个人	4	3.70%

（三）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弱。在 F 县 S 村驻村调研中了解到，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发展村级公益事业主要靠上级财政支持，在帮助解决农民生活、疾病等问题上难有作为，而

教会组织往往能够从多个方面获得收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F 县 S 村 2018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到 1 万元,而 S 村教会每年有来自于上级教会的拨款,村民每人每年约 500 元的捐款,外部企业或者基金的捐款,以及合唱团国内外演出的部分收入约 40—50 万元,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

(四)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农村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农村老人往往因为伤残病痛或者家庭矛盾难以调解,通过信教寻求安慰和寄托。调研数据显示,122 名信众的信教原因中,承袭家庭传统的占 38.52%,生活困难的占 32.79%,生活压力的占 31.15%,治病的占 27.05%,打发时间的占 1.64%。

通过调研分析,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基层公共服务不足以为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信仰基督教具有很强的世俗化特征,信教群体不激进,不干预政治。但是,基督教信众连年增长的趋势也反映了基层公共服务不足,使得群众寻求宗教慰藉。例如,S 村村民反映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和卫生问题,村里面的饮水工程年久失修,村里卫生环境较差,人畜混住。村民小组广场紧邻教堂,除了教会组织的活动,村民没有更多的娱乐项目,由于苗族村民教育程度低,农家书屋处于闲置状态。被问到喜欢哪些休闲方式时,村民提到希望多举办一些苗族特色的娱乐活动,如花山节、歌舞节等,需要建养老院和文化活动中心。信教群众以妇女、老人居多,主要是通过宗教寻求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

(二) 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够紧密。以群众寻求帮助来判断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来看,总体良好,但存在部分群众遇到问题依然首先寻求宗教组织帮助的情况。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党建工作推进不平衡,存在软弱涣散和不作为现象。例如 S 村老百姓认为村委会七八年不能推进停滞的开发项目,危房不能改建,“天亮喝到天黑,做不成事,组织力弱,威信不够”,造成基层组织在体现职能方面出现折扣。访谈中发现,村民反映遇到生产、生活困难时,村委会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教会却能够主动提供捐款及精神上的支持。

(三) 信教人数众多影响基层治理单元的公信力。通过对 F 县 S 村的蹲点调研发现,信众人数在村的规模越大,对治理单元的公信力挑战越大。S 村的调研发现一个问题,该村教会信徒占比约 80%,村小组长选举中教会成员获得高票,乡镇政府考虑到教会成员任村小组组长不合适,因此否决了结果,并由非信教人士担任了村小组组长,之后教会和村小组组长关系疏远,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再加上征地项目建设烂尾,集体征地资金部分账目不够透明,村内部矛盾表现较为突出。中屏村和 S 村比较,信众规模小,选举中非信众投票权更大,村小组和教会关系融洽,并且能够引领教会开展村庄建设工作。

(四)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足以引领教会信众。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对群众生产生活的支持和帮助不足,这也是难以在基层引领教会信众的重要原因。S 教会资金来自于上级教会的拨款,村民每人每年约 500 元的捐款,外部企业或者基金的捐款以及以教会成员组成的合唱团国内外开展的各类演出的部分收入。从调研来看,约 90% 的信众因为家庭和其它世俗化特征而信仰基督教。然而村庄集体经济薄弱,也无其它资金来源,难以在经济实力上与教会抗衡,并且在生活、疾病等问题上难有作为,缺乏引领村庄教会信众的资金来源。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没有资金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导致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

(五) 宗教管理工作不到位,存在对教会管理工作方法和方向的盲点。需要全面认识到乡村教会信众信教目的,并以此为据把握好政策分寸。总体而言,调研的情况反映了教会成员封闭性较强的问题,因承袭家庭传统信教的占到 38.52%,因此相当一部分成员既是教友、又是亲属。相关

部门及工作人员宗教工作的意识不强、本领不足。教会与村干部（党支部及村委会）之间关系未理顺，缺少管理上的顶层设计。

四、对策建议

加强农村宗教事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放在“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去实施，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宗教管理，进一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加强宗教工作的形势分析判断、研究部署和监督考核，宗教重点地区的乡镇设立专门的统战委员。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加强基层宗教管理依法办事，完善教会规章制度，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工作上要慎重稳进，宗教问题的形成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时间过程，解决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弯子不能转得太急，否则宗教敏感性会让信教群众心理承受不了而引发事端。要有依法管理、有章必循、违法必纠，思想问题不解决，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却会积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督促各地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特别是要把“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作为一条严肃的政治纪律。加快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农民能力。

（三）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搭建村民代表、教职人员、信教群众、非信教群众等多方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推进农村基层依法治理，继续深化农村扫黑除恶工作，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推进“网格化”等管理服务模式，强化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的精准化管理。要把绝大多数信教群众的纯宗教诉求、宗教崇拜与极少数人打着宗教幌子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政治追随严格区分开来。什么问题都要认真分析，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

（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建设，持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弘扬文明乡风，传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丰富农村群众特别是农村妇女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中小学生教育引导，教育学生爱国守法、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五）善于引导教职人员。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提高教职人员中华文化素养、拓展知识面、提高宗教造诣。使信众充分地了解和掌握相关政策和法律，提高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的自觉性。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制定有针对性、对接需求的培训，培养一支爱国爱教的高素质教职人员。

责任编辑：杨松禄

文化发展

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史晓宇¹, 诸 芳²

(1.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云南 昆明 650092; 2.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西南联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把教育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 必须弘扬和传承这一重要精神财富,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 西南联合大学; 爱国主义精神;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90-05

1937年11月1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到长沙, 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后又于1938年4月西迁到昆明, 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 1946年5月, 三所大学北归平津, 各自办学。西南联大, 这座在抗日烽火中联合组建的高等学府, 在短短8年时间里,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筚路蓝缕, 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更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2017年1月, 李克强总理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后指出: “西南联大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 大师辈出, 赓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 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 传承了民族精神。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万物得其本者生, 百事得其道者成。一直以来, 众多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孜孜不倦地探寻西南联大取得伟大成功的奥秘。有学者认为是“教授治校”的原则和独具一格的委员会治理模式;^①有学者认为是“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刚毅坚卓”的校训; 有学者认为云南人民对联大师生的敬重仰慕、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②等等不一。这都为西南联大的巨大成功做了很好的注解。然而, 我认为, 最不容忽视的是西南联大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2020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 期间考察调研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 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 并作出重要指示。习总书记指出: “国难危机的时候, 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 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 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 又把种子播撒出去, 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

基金项目: 2017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及其当代启示”(AC17004)。

作者简介: 史晓宇,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 诸芳,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处副处长, 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和统战理论。

① 史晓宇: 《西南联合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委员会治理模式”》, 《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第81—89页。

② 云南省档案馆编: 《档案中的西南联大》,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6年, 第2页。

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深刻揭示了西南联大取得巨大成功的至简大道。回顾联大的办学历史,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理念和实践行动始终贯穿其中,在中华民族多难的岁月中熠熠闪光。

一、爱国宣言:担当使命,文化救国,必胜信念

1938年,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进逼,为了保存国家文脉,三校由长沙继续西迁入滇。伴随联大始终,西南联大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理解一直充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清华)梅贻琦常委坚定地认为,联大的责任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跟打仗一样艰巨和重要。(北大)蒋梦麟常委的文化坚定在笔端流露,“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回,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却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①。(南开)张伯苓常委的激昂陈词,“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②何以在自身性命难保的时候还要进行万里长征,保存文脉?就是坚信我中华五千年文化是民族壮大的力量和源泉,只要保护好文脉,中华民族就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机;就是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总有胜利的一天,要为胜利到来的时候提供大量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

在当时的战争态势下,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悬殊,持投降主义态度的政客和学者不乏其人,持悲观论调和对未来迷茫不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一历史选择的岔路口,西南联大毅然决定分三条路线迁滇,是师生们对办学救国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曲校歌《满江红》,展现出西南联大师生壮怀激烈的殷殷爱国情、拳拳报国心。“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③。在被日军摧毁的断壁残垣中,西南联大师生的爱国精神始终屹立不倒。他们用西迁的行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是铮铮的爱国宣言,既稳定了当时的民心,又向大家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明天和希望。

二、救国之道:严谨治学,团结协作,为国储才

在迁滇的三条路线中,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贵州到达昆明,是最艰巨的一条路线。师生们风餐露宿、翻山越岭,体力和意志均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但是,他们却把艰苦的长征走成了“文化苦旅”,一路上采集标本、考察地质、收集民歌民谣、创作美术作品等,积极进行社会实践。中文系学生刘兆吉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闻一多先生沿途创作了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过去三所学校从未收藏过的动植物标本;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所经矿区的矿工进行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向学生现场讲授所经地区的地质地貌,就像带领大家进行地质野外考察一样。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200多首民歌民谣。

“刚毅坚卓”的校训,完整诠释出西南联大爱国的浩然之气与磅礴力量,这是西南联大师生们

^①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② 张伯苓:《南开大学被炸毁各方深表痛恨》,《申报》1937年7月31日,第4版。

^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39页。

在面对强敌入侵之时,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之情所焕发出来的气节担当、意志品质和价值准则:通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士不可不弘毅的任重道远,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而达至人格卓越、学识超卓。尽管当时云南给予了西南联大极大的支持和倾心呵护,但西南联大物质上的艰难困苦依然巨大:漏雨漏风的教室和宿舍、简陋的教学设备、生活异常艰辛,然而师生们置艰难困苦于不顾,埋头教与学,专心研究学问。林语堂先生曾发出“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得了不得”的惊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载,“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飧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惯,不稍怠懈。”^① 1940年10月,日军占领越南河内,为破坏“滇缅公路”这一战略物资运输唯一的国际大通道,加大了对昆明的空袭力度,跑警报成为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但他们在日机频繁轰炸下仍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学校决定:“如遇有空袭警报时,应一律停课疏散,于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内,仍照常上课。”^② 正如郑天挺先生在《滇行记》中所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③。钱穆先生曾说,“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④ 可见,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凭借以身殉学的决心,维持文化的责任感,于战火中继续传道授业,已经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学校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文化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是以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在频繁的空袭之下,维持着教育秩序依然运转,弦诵依然不绝。据统计,西南联大为躲避空袭,先后6次修改上课时间,9次调整常委会开会时间。空袭之下,并没有失败主义的萌发,也没有一蹶不振的气氛,反倒是学术之光不灭,弦诵之声不绝。在习以为常的跑警报恶劣环境中,即便是在躲避空袭的间隙,没有桌椅和灯光,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部名著的《西潮》。数学领域的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领域的周培源、吴大猷,化学领域的黄子卿、张青莲等著名科学家,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大量发表于《自然》、《科学》杂志。人文社科领域,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唐诗杂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新诗杂谈》,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经典著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⑤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尽管在办学理念和领导风格上不尽相同,教授们的个性也非常突出,局部利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最终却能求同存异,团结协作,把家国情怀和人生价值熔铸于一炉,与抗战相始终,最终胜利北返,实现报效国家和民族的理想,“爱国”是三校师生的最大公约数。陈岱孙先生撰文认为,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和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⑥ 师生团结协作,严谨治学,既是爱国主义精神使然,又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友爱和团结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据统计,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学生8000余人,毕业3882人。期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党和国家领导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第9页。

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第83页。

④ 唐端正:《中华民族不亡、先生精神不死——敬悼钱师宾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编:《诚明古道照颜色——新亚书院55周年纪念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⑤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第83页。

⑥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人, 173 位两院院士, 100 多位名师巨匠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 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报国之义：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不畏牺牲

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西南联大一些学生毅然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共有过三次学子参军潮。有记载的从军或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就有 1100 多人，抗日从军学生 834 人，占学生总数的近 1/7。他们以知识和技术服务抗战，在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中美空军中担任翻译等专业工作，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盟军协同对日作战的重要组成力量。梅贻琦校长的独子梅祖彦和女儿梅祖彤也应征入伍。14 位西南联大的学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献出宝贵生命。1941—1945 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 4000 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约 400 人，占 10%。1945 年 7 月 6 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总统杜鲁门下令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授以铜质自由勋章。52 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等 12 名西南联大学生，这说明了西南联大的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效国之地：扎根云南，情系三迤，学术兴邦

西南联大师生们为改变云南落后的面貌，加强云南的地方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对后世的发展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们参与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抗疟工作、煤化工和酒精等抗战能源生产，参与云南滇池开发规划、农业科技研究及开展云南植物调查、民族调查、人口调查、农业普查、考古研究、师资培训等。1938 年，为了开发云南省水力资源，西南联合大学先后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及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组织“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由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负责指导。数年内共勘测云南省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盘江及伊洛瓦底江的 26 条支流的水力资源。仅 1940 年 7 月至 1942 年 3 月之间，施嘉炀就先后四次赴腾冲，近 200 天的时间参加水电站的建设。1938 年冬，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农研所的姚荷生随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边疆实业考察组到西双版纳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峇三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经济调查，以便为开放边疆提供参考。姚荷生在任务结束后，独自留下继续做当地傣族的民族社会调查，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的《水摆夷风土记》，具有民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多重价值。

而在春城昆明，一时大师云集，群贤毕至，读书人成群，他们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带来了崭新而崇高的思想境界，极大地陶铸了云南的文化风气，启迪了民智。彼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宜良岩泉寺撰写后来蜚声中外的史学名著《国史大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昆明写就闻名遐迩的社会学重要著作《禄田农庄》、《内地农村》，参与开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中光辉灿烂的“魁阁时代”……为补教室和图书馆的不足，西南联大学子常常在联大附近的许多大小茶馆里，点一壶茶，一待就是一整天，看书、写作、讨论、玩桥牌、朋友小聚。在北返之际，为报答云南父老乡亲对联大的养育之恩，西南联大把师范学院留于昆明，1984 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对云南的基础教育水平提升功不可没。

西南联大扎根云南，研究云南，服务云南，真正把学术和研究写在云南的大地上。据统计，1941—1945 年教育部连续举办五届学术研究评奖，西南联大共获奖 33 项，其中扎根于云南本土有关的研究项目获奖 7 项，约占获奖总数的 21%。分别有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总之，西南联大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全面促进了云南社会发展的进程。

抗战胜利，三校北返之际，勒石立碑，以志纪念。冯友兰先生所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深沉而厚重的爱国精神掷地有声：“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

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① 碑文充满了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壮志豪情和坚定信心。

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以贯之，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这场斗争中，在昆明爆发了被誉为新的“一·二九”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暗杀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亦被特务暗杀。他们舍生取义的爱国气概，唤醒了更多的人积极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伟大斗争，为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和社会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科学家们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宝贵的学术资源、宽广的科学视角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新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他们有的放弃优裕的生活，扎根大漠，研制大国重器，奠定了新中国坚实的国家安全力量；有的为缩小祖国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增进科技文化交流殚精竭虑。在各条战线上，西南联大的师生都以精湛的学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强国之柱：爱国为民，赓续文脉，文化自信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悲歌向前、读书救国的历史让我们铭记，爱国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80多年过去了，西南联大已经走进了历史中。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因此，历史应该被后人铭记。西南联大不但谱写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精神的丰碑。它不仅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它在艰难困苦中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担当将永远存留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融会交辉，共同丰富中国民族精神，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③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它来自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更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接力赛，必须要在西南联大等历史文化宝库中，不断汲取爱国主义的营养，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既要立足民族，又要面向世界，在吸收外来文化、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不断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

③ 2015年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15年12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117631083.htm，2020年3月9日。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 对外叙事：翻译的视角

李志凌，杨 燕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思想。伴随着话语形式的演变，中国的政治话语走过了一个历时发展的历程。在叙事内容、讲述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国际话语生态中表现出很多独立性的特征。将“中国的声音”对外传播，翻译是重要的发声方式，其实质是用译释手段对政治话语内涵作出二度叙事，实现新一轮的话语建构和价值诠释。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形成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达到主动宣示自我的特征，从而在国际政治话语生态中保持自我价值并获他者认可，使来自中国的声音不仅被“听到”，还要能被“听取”。

关键词：政治话语；话语生态；中国声音；对外叙事；翻译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0) 01-0095-09

一、新时代下的中国声音

当一个国家具有足够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而且理当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地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发出特有的声音。21世纪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快速影响着世界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世界舞台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更不能忽视中国成就，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意见、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随着中国融入国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加，一些根据中国立场和愿景提出来的新观点、新理念不断向世界输出，成为令世界耳目一新的术语或概念，如“新常态”“和谐世界”“不忘初心”“一带一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由于这些新提法颇具中国特色，往往前所未有，或者是对旧有相似概念的发展、改造，以至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表达形式。此外，这些新概念多以汉语为原始语境，有鲜明的汉语构词特征，如爱用典故俗语、多隐喻、善用四字格、讲究格律对称、常用数字缩写等。这些形式新颖、意蕴丰富、具有中国特

基金项目：2019年度云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建设“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目(2019125)。

作者简介：李志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英汉语言对比；杨燕，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

色的时代新词在鸣响了中国声音的同时，也构成了外宣的难题。

现实情况是，在正式场合下，我们对外的政治话语传播很少直接以外语作为叙事工具语，而是基于汉语的叙述文本进行的外译活动。汉语虽是联合国认定的 6 种官方语言之一，但尚未成为除英语外的第二种全球性通用语。负载于汉语里的中国声音不能完全以原有的语言符号、原汁原味地向世界传递，获得直接的国际认知，因此只能借助国际性话语程度更高的语言文字（如英语）加以转化、翻译与阐述，这便构成了原始意义的二次、甚至多次叙事。根据传播流理论（communication flow），信息在大众中的传播过程是复杂的，信息经过传播介质的处理后会发生总量的增减与变异。在信息流、影响流和噪音流的作用下，传播信息及其意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当我们用其他语言符号去诠释原产自汉语的中国声音时，难免在对外讲述、传播与宣示中产生概念的偏移，导致意义丢失或效果偏差。外宣翻译似乎是其中的主要媒介渠道和责任承担者，但这背后却不是简单的语际符号转换关系，本质上是特定语言文化生态下叙事思想与表现手法的外向疏通与接轨的问题，也就是对话与沟通。

本文所论及的中国声音，正是一种在国际性语言文化生态中，由中国官方发出、代表着国家意志和精神的政治性话语符号，重点关注其在对外传播中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及其外译时须做的必要思考。

二、中国政治话语生态的基本性质与时代特征

严格意义上，政治话语生态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系统，是明显带有认知特征，人为界定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是，它的确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中的一种意识流动系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一）中国政治话语的性质与意义

话语生态与生态语言学的概念有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后者关注特定语言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它同语言族群、社会、文化、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关联特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被置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语言的存在和作用过程就像一个生命体的发展过程。前者也用类似于生态系统的概念来看待事物，但它的研究对象更呈现为一种系统性和多元性，关注的是同类或异类语言因子建构起来的互动体系，考察在话语编织的文化网络中，特定的话语类型在结构形式、交流方式和语言功能上所产生的社会性意义。话语类型是语言社团中约定俗成的一种社会活动（马丁，1984；斯韦尔斯，1990；巴沃什，2003）^①，是集形式、语义、语用于一身的范畴化用语类型。根据这个认识，中国官方使用的时事热词，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政治意义，是一种针对广泛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认识，旨在形成统一主张、引导思想认同，有其典型的语用场域，符合政治话语的类型特征。中国的政治话语首先反映的是中国的问题，传播的是中国的立场，在其根本利益上也是要服务于本国发展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政治话语首先就有一个意义“原色”，不仅仅是表达出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还常常具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的人文背景，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烙着深刻的文化符号。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国别性话语

^① Martin, J. R. Language, Register and Genre. F. Christie, Children Writing: Reader, Geelong. Vic: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7-66.

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23.

Bawarshi, A. S. Genr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Writer,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13.

特征过于鲜明，给它的转译和对外传播造成了一些困难。

比如，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自信”的政治要求：“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样的思想如何向外界传达？“道路自信”不是对行走的路途的信心，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理论自信”不是对一般理论的信心，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的自信；“制度自信”不是针对泛指意义下的任何制度，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自信；“文化自信”不是对任何文化的肯定，而是对中国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若将其简单翻译为“confidence in ways, theories, systems and cultures”显然不准确，应该解释为：“confidence in the path which assures a promising future of Chinese socialism; confidence i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socialism;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that manifests an abiding faith in the strengths and advanced nature of Chinese socialism as a political system; confidence in China’s culture that demonstrates a full confirmation of the nation’s own cultural values and a deep trust in their vitality.”概括起来就是“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path, guiding theories, political system, and China’s culture”，简化下来的专有名词“四个自信”便是“Four Matters of Confidence”。可见，在对外诠释这些关键概念的时候，必须充分解释其背后丰富、确切的文化意义，而非仅作字面的逐字对译。

（二）中国政治外宣话语的阶段性特征

回顾多年来中国政治话语的发展历程，在步入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中规中矩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治话语外宣形式中的国别化特征不明显，创新活力不足，语言符号上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还有迎合国际话语特征的趋势。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早期“两手抓”中主张的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外宣翻译中曾引起过讨论，学界认为material civilization和spiritual civilization不符合英语的词义特点和文化内涵。英语里civilization应作“人类文明形态”理解，spiritual则偏向于宗教含义，因此，在一些正式文献和官方说法中曾一度翻译作：material culture和ethical culture。但随着人们对中国特色语义内涵理解的深入，加大了对复现汉语本意的重视，开始反思这种“符合”国际惯例、遵循外语语言文化内涵的说法是否真正做到了贴切，并逐渐开始认同最初的英语用法^①。就此例而言，加深这种反思性认识的，也许是中国政治话语里对“文明”一语的社会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这样一来，culture的语义内涵便显得局限了，在搭配上也与ecology（生态）格格不入。如此看来，当年迎合英语语言文化所采用的表达（如Sol Adler和Frank Coe所提议的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反而显得局促了，内涵高度不够，适应不了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原有话语范畴。“为了体现概念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达到应有的政治高度，以党刊《求是》杂志为代表，官方的外宣媒体开始“采用过去几年一直不敢用的搭配ecological civilization”。^②

① 过家鼎：《关于“纸老虎”和“精神文明”的译法》，《上海翻译》2005年第1期，第55页。

② 贾毓玲：《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求是〉英译体会》，《中国翻译》2015年第5期，第93—95页。

(2) 自我话语意识发力阶段——21世纪前十年(约自2000年至2010年)。这个阶段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起点,但此间有几样标志性的话语事件。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的英文翻译“The Three Represents”最初令国外媒体颇感陌生,甚至质疑其表述的文法合理性。但国内官方坚持该表达的权威性,并对Represents的三重含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最终将其固定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英文说法。这个案例似乎是新时代开启中国特色外宣话语的一个成功发端。此后,中国官方每年发布的两会热词更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国特色的外文时事用语不断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2008年中共中央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时成为全国上下的热词,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的焦点。这时,很多外宣文献和场合里所用的相关概念及提法凸显了中国的话语特色。

(3) 发出中国强音的阶段——2011年后至今。2011年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首个部委微博——外交部的“外交小灵通”开通,其轻松的语言受到追捧。11月,北京市政府推出“北京微博发布厅”,成为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12月,《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发布。这一年,随着网络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深入,年度热词的网上发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成为一种传播度很高的话语现象。“限×令”“穿越”“围观门”“‘××体’网络文本”“公民环保”等成为大众话语度很高的流行语,同时也与政治话语相互交织,外宣用语中的中国化味道愈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日益成为国家语言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各种中国特色的政治主张、生活理念大量涌现,“创新型政府”(pro-innovation government)、“工匠精神”(craftsmanship spirit)、“二孩经济”(second-child economy)、“获得感”(sense of benefit)等新术语带上了更多的中国成色。

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政治话语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话语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呈现出一种生态特性。从其内部来讲,中国的政治话语孕育于特有的文化土壤,经历过初生与发展,社会生活关联面逐渐拓展,不仅仅作为一种单一的政治话语,而且涉及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以及各方面的思想建设;中国的政治话语有着高度的社会化作用和思想引领性,语义内涵超越政治学意义本身,对社会制度与全面建设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它同社会生活的现实融合不断增强,愈加生动化、深刻化,语义聚合变体也更加丰富多样(如“供给侧改革”<supply-side reform>衍生出了“需求侧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从外部来讲,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对外宣传、与国际话语交流的过程中,经历了早期的效仿、迎合,中期的比较与内省,以及成熟期的自我意识强化,自信发声、发自我声音的一个过程。而就国际社会的话语反应而言,对中国话语的陌生感也开始逐渐消退,一些核心概念逐渐被认同和接受。可见,国际话语生态也在对其主动适应并不断消化。譬如,“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理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对“大国”理念(用major country替换power)的新阐释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接纳。这些都体现出中国的政治话语同外部环境不断相适应,在实现自我进化式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外部因素做出适应性调整,生态化的存在意义与作用明显。

三、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学特征

就普遍特征而言,政治话语同普通话语的基本特征一样,不只是指称和描述事物,还能展开

丰富的意义维度。

（一）政治话语的一般叙事特征

政治话语具备一般话语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表征：多义性、不精确性和动态性。在叙事特征上，它同样具有话语使用的一般规律，即话语类型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语义单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语用单位，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它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完成不同的功能（李美霞，庞建荣，2006）。^① 这些基本表征让我们看到了政治话语的语言属性，但尚不足以反映出它们的叙事性特征。

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视域下，政治话语不只是一个文本的符号，仅仅研究语言本身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语篇意义、语境意义，涉及与之关联的一切文化范畴，以及从中施展的权利形态，需要挖掘“隐藏于人们意识中的深层逻辑，它在黑暗中控制语言表达、思维以及所有不同群体的行为标准”^②，“理解那种创造出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的各种机制”^③。“什么故事”（叙事文本）、“谁在讲”（叙事者）、“怎么讲”（叙事方式）、“为何要讲”（叙事目的和缘由）、“讲给谁听”（叙事接受者）是叙事学逻辑框架中的五个中心环节，也正是政治话语叙事中的五大要素；它们既是一度叙事中话语形成的根本，也是对外进行二度叙事的必要考虑因素。

（二）政治话语对外叙事的基本特征

从对外叙事话语的生态意义出发，就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而言，有三个因素是相对固定的：一是叙事者。主要由精通国际交流话语，深谙中国社会与文化，熟悉中国国情、政情的决策人（群体）、传媒人士（机构）和译者构成。二是叙事目的和缘由者。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的基本目的是宣示主张、沟通海内外，主体作用是准确而明晰地表达中方意图，理想目标是传播中国的声音。可以说，不论话语内容是什么，由谁来讲，怎么讲，这个基本目标和动机不变。三是接受者。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一般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以及一切国际事务团体、组织作为对外政治话语的对象。这种时候，政治话语往往有某种针对性，为国家意志、政治主张服务。因此，外宣中政治话语的立场是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的，务必维护本国利益，强调话语的本我特性，尽量保留汉语原有的构词理据；话语针对的受众是国际社会，因而必须兼顾国际话语的语法规则——这是基本要求，体现在使用外语进行转译时，尽量贴近外译文法规则下的语义关系、搭配语式、隐喻习惯等，以便缩短外语受众对传播概念的理解反射弧，及时跟进、消化话语意图，形成有效沟通。

除了以上三个常规要素，叙事文本（话语内容）和叙事方式（话语表达）是最为关键的两个变量因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宣叙事的成效。

虽然对于作为二度叙事者的话语传播者而言，译介宣传的文本内容大致是预先设定的，讲什么故事、再现什么主题等基本已在源语文本中有了答案，但是，选择在多大范围上诠释原有意义，再现哪些必需概念，或为回避误解如何做话语内容筛选等，则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从这一点来看，对外叙事中话语意义的传达在完整性上可能与原有内涵略有出入，大致成约等关系，这是二度叙事中信息在目标语境下经历再加工导致的必然结果。外宣叙事中信息的绝对等值并不一定能取得

① 李美霞、庞建荣：《话语类型概念探疑》，《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第1—5页。

② Shapiro, M, Language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ill, 1984, p. 206.

③ [美] 艾莉森·利·布朗：《福柯》，聂保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2页。

理想的传播效果。2013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一处标题“新形势、新挑战、新使命”翻译为“New Situation, New Challenges and New Missions”，给读者强烈的“新”的阅读印象，这同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壮大的担忧，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背景形成一定程度的映射关系。其实，中文叙事只是遵照了一般的标题叙事结构——词组化、排比化、重复用字，并无对“新”的实质性强调，也就是说，政治话语原本的叙事内容并不强调中方政治战略的“新”转变，而只是叙事话语惯式上的一种常规表述而已。所以，有学者建议应该“抹除一些过度表述的字眼”，因为“所表达的内容也并没有过多需要强调的内容”，可以精简内容将其译为“Emerging Situation”^①。可见，对叙事信息量做合理削减，并控制意义可能被诠释的幅度，正是符合传播利益的必要做法。所以，话语的再度生产过程伴随着内容的选择（option）、控制（control）和引导式阐发（oriented interpretation），这是叙事操作的结果。

（三）中国政治话语对外叙事的两种基本方式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的声音？确保对外宣传的叙事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跨语境的信息交流是这类叙事活动的本质。在跨语境和对外宣传的性质前提下，叙事方式上有两个主要取向：一是采用“纯叙事”的方式，二是用“完美模仿”的方式（笔者按：这是柏拉图所区分的两种叙事类型）。前者是叙述者直接面对读者，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呈现出“讲述”的叙事风格，叙述者的评论意见可见；后者的叙事尽量采用他者视角，叙述形式尽量隐身，意见不介入或很少体现于文本之中，属于“展示”性的叙事风格。两种叙事方式就是两种叙事策略，形成表达方式的不同、意见的存隐性以及审美效果的不同。二者都能适应外宣叙事的不同需求。

前一种以“讲述”的方式容易带出叙述者的立场，表达对事物的观感和导向性意见，但它并不妨碍交际效果，反而会在情感上接近受众，更易于实现感染型表达（expressiveness）和呼唤式的（vocative function）交流效果。如在政治话语中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我们”（We），“叙述动机是切身的”^②，折射出现实经验和情感需要。在政治性话语的外宣中，采用这种话语方式将明确表明中方立场，以情感贴近的方式进入受众的视野及主观世界。同时，“讲述”型叙事方式艺术表现力强，隐喻运用频繁，意义含蕴也更加丰富。相比之下，“展示”型的第二种叙事方式虽然隐藏了叙事立场和意见，生动性不强，却更容易客观地陈述事实，将信息严密化，可信度提高；语言风格庄重严肃，降低感情色彩；不留以太大的引申、譬喻的空间。

从话语生态的意义出发，两种叙事方式都是能同话语生态（包括基于语篇特点的言内语境和基于外部交流空间的言外语境）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根据政治话语对外宣传的不同、内涵和交际目的，外译政治话语无论是采用文学性更强、更具表达性文本特征的叙事方式，还是采用信息突出的叙事方式，都各有千秋，可以满足不同的交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下中国的政治话语既有一贯的严肃风格，也开始带上越来越多的亲民色彩。“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打楔子”“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等等，大量引用典故、俗语、成语、诗句、人名名言的形式，在政治话语中增添了雅俗共赏、意蕴丰富的文学化元素。这种话语符号形成了大众化的叙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政治话语情感化、隐喻式的叙事表现，这一点需要对外传播者注意，应在二度叙事中尽量保留或再现这种特色。

① 王—多：《叙事学视角下的国防白皮书英译研究》，《外语研究》2019年第2期，第77—81，95页。

② 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170页。

四、翻译的传声方式

按照生态翻译学观念，政治话语翻译就是译者能动地适应并整合文本内部语境与外部生态环境，从语言域、文化域与交际域等维度上做出优化选择^①，以适应话语生态网络中诸如语言、文化、社会、交际、读者等因子的语言活动。中国政治话语外译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话语源本、译者、传播受众三者之间信息流动的一个连续体，因此，必须考虑各个环节上认知结构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外宣翻译的政治属性，政治话语外译必须遵循基本的原则，并以恰当的翻译策略为指导。

（一）政治话语外译的三个原则

在翻译中传播中国的声音，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以我为主的政治优先原则。政治话语外译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活动，应以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利益为根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任何可能导致破坏、妨碍中方利益的不当转译都应该首先杜绝。邓小平多年前主张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被别有用心的美国媒体翻译为 hide the capability and bide the time（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表达向世界传递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它是国际话语么？是，但我们不能照搬借用。这损害了政治话语对外宣传的根本利益。

（2）以我为准的内涵释义原则。用外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实质是以二度叙事的方式对已有故事文本（汉语话语文本）进行复述（retelling），或是在源语意义的基调上做出重新表述（paraphrasing）和阐发（explication）。这是一个话语文本被重新赋义的过程。话语意义的核心是中文语境下原始的话语概念和政治动机。当外译话语存在不确定性或多义性，概念边界模糊时，必须以中方的阐释为准。如“钓鱼岛”就应该用中国官方的说法 the Diaoyu Islands，而不是日本采用的 the Senkaku Islands 或 the Pinnacle Islands（尖阁列岛）的说法。同理，“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也不应用其他名称，而当用 the South China Sea（issue）和 the East China Sea（issue）。

（3）融入国际话语的目的语适应原则。翻译中国的政治话语不能死板追求中国特色的原样再现，强用外语文字符号包裹汉语的表达惯式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输出的语言毕竟是外语，政治话语外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使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则，融入国际通行话语体系，应作为对外传译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次务须具备相当程度的读者关怀，重视国外受众的理解效果和接受程度。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外宣翻译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失误，一种称之为“甲状腺病毒”，指译文中出现词法不当、文法不通的情况；第二种称为“乙状病毒”，指的是译文无明显语言失误，但译文生硬，或同国外人士的认知习惯不协调，文本的诗学风格与目的语不一致，令受众感到诧异、晦涩、质疑等。^②与“甲状腺病毒”相比，“乙状病毒”在数量上虽不多，但影响则往往更坏^③，“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话语走向世界”^④。消除无谓的话语病毒，融入对象话语体系，事关政治外宣的

①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上海翻译》2009年第2期，第3—8页。

② 段连城：《呼吁译界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5—214页。

③ 林茂荪：《改进中译外工作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在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中国翻译》1991年第1期，第4—7页。

④ 李伯利：《生态适应观照下的中国政治话语翻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15—120页。

利弊效果及最终成败。

由于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重大意义,政治性影响和政治化内涵的特殊要求,以上三个原则是外译工作的底线准则,也是政治话语外宣策略与方法的根本依据。

(二) 政治话语外译的主要方式

1. 以异化翻译为主,保持政治话语生态平衡

国际话语生态中,由于偏见的制约、国力的贫弱,以及中外话语系统的差异,中国的声音长期受到压抑,无法充分彰显中方诉求与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异化翻译正是强化中国声音的必要做法。异化翻译较少采用意译的方式去处理原有的政治话语形式,通常采用完全音译、音译加解释、完全按照汉语形式直译,以及直译加解释等方法^①。“异化策略可确保一种文本本身具有的异质性,这样读者就可以确信他们面对的文本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② 异化翻译的传播方式并非完全以中方利益为出发点,对于国外受众来说,异化译法同样是必要的。一些西方记者翻译中国特色的词汇时也惯用音译加注、直译注释的方法,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认为英语中原有词汇不能准确传达中国原有词汇,异化翻译的方法更加准确;二是使用中国专有的词语在西文中能显示第一手信息来源,而从增加报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三是可以提升译介文本的专业性和学术性。^③

异化翻译处理的政治话语是本色叙事的结果,它保留了汉语原有叙事文本中的基本结构和叙事特色,将语汇、修辞、诗学、思维、艺术手法等予以很大程度的保留,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国别特征的话语风格,是对国际话语生态体系的充实;因为它保留了更多的原声效果,能够矫正甚或对抗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噪音”,从而实现话语势差的平衡。并且,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制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④,这也是符合政治话语生态平衡运作的客观要求的。目的语形式的异化外事用语能够体现汉语原有思维及文化的内生态及音、形、义合成的外生态要素特征及关系,可以“提升源语文化的地位,拓宽源语文化的影响范围,即扩展了源语的文化生态圈,从而也就扩展了源语的生存空间。”^⑤

2. 充分地解疑释惑,消除政治话语盲误两区

政治话语外译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出错,而是讲不到位和没讲清楚。外宣翻译的使命就是要把意思讲真、讲对、讲全,消除一切可能的误解和疑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指出,应“尽力把对外翻译变成解疑释惑的过程”^⑥。译者需要在对外翻译中特别注意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缺失的背景可以适当增加,可能引起的误会要尽量删除。前者解决的是信息盲区,后者处理的是信息误区。这两个问题都是对外传播中至为重要和极难处理的问题。相比之下,信息盲区仅仅是信息量差所导致的结果,一般通过提供补充背景解释,适当增译处理就能填补;

① 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第1期,第33—35页。

② [英] 苏珊·巴斯内特:《把消息带回家:同化策略和异化策略》,辜正坤、史忠义主编:《国外翻译学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③ 黄海军、马可云:《也谈美国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特色词汇采取的翻译策略》,《上海翻译》2007年第3期,第52—56页。

④ 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49—52页。

⑤ 李丽生、刘旭阳:《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异化翻译的必要性》,《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97—101页。

⑥ 黄友义:《中国站到了国际舞台中央,我们如何翻译》,《中国翻译》2015年第5期,第5—7页。

而信息误区却是危害更大的传播结果^①。因为受众对翻译产品的误解可能滋生不满，误导决策，形成歪曲的印象，而印象一旦在受众中形成，便很难化解，会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而后期的补救、解释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公关资源耗费，导致信用成本受损。因此，在译释政治话语时，必须常做概念预判（conceptual evaluation），对译文的理解效果深度评判，以选择适当增减诠释性信息，甄用妥帖话语，避免误会。

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鲍运川提出，政治话语翻译既要注重原文的政治准确性，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又要照顾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当语言的地道性与政治的忠实性相冲突时，表达以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为主。^②这也符合“外宣三贴近”^③的主张，即要求政治话语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一切形式的外事翻译应坚持以目的语为外宣话语的叙事形式取向，以汉语的政治内涵为叙事意义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文定稿人王明杰指出，译文既要忠实原作，译出原文风格，也要语言通顺流畅、明白易懂且具可读性。^④

五、结语

“中国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⑤。政治话语是有力量的，可谓之“话语力”^⑥，它能传播感召力、公信力和渗透力。做好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外而作的政治话语宣传，实质就是同国际话语体系的接触、碰撞、融合、较量，这个过程必须借助叙事话语方式的有效变通，一方面要守住底色，发出原声；另一方面又要主动靠近国际话语体系的规则，利用好翻译这个传播轨道，保证传播话语与我们的根本政治利益相一致，话语内容的丰富性与层次性相统一。在以我为主，以我为准，与国际话语通畅兼容的前提下，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罗雷

① 林茂荪：《改进中译外工作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在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第4—7页。

② 杨平：《从“中国关键词”看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专访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鲍川运教授》，《对外传播》2017年第4期，第1，2—25页。

③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第27—28页。

④ 邱大平：《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05—212页。

⑤ 张维为：《中国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走访百国后对中国的思考》，《文汇报》2014年8月19日，第10版。

⑥ 江时学：《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26—29页。

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现象探析

席婷婷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人创造了图像,图像也改变着人,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变革和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的当下社会,图像生产、制作低门槛化、低成本化,图像传播更加快捷,图像铺天盖地而来,塑造了当代人图像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新奇有趣的图像对青年的影响更加深刻,青年社交表达的图像化倾向、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乃至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十分明显,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一方面,受技术摆布、资本操控、青年亚文化影响,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青年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部分青年沉溺于图像所营造的“半真实世界”,陷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认同危机”。因而,需以青年为切入点,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关注青年内在需要,铸牢青年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在图像化生存中树立图像意识、彰显主体意识、强化使命意识。

关键词:青年;生存状态;图像化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1-0104-07

一、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及其三大表征

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当代青年出生成长于中国互联网技术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兴盛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网络原住民”。在表情包、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红品牌、网上微店宣传等大量图像符号包围下的当代青年,其社交表达的图像化倾向、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乃至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十分明显。

(一)当代青年社交表达的图像化倾向

早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切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人的现实本质表明人是社会性动物,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实践中、在人与物或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交往是社会关系形成、建立、稳固的前提,是人的本质彰显的基础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一定离不开交往双方借助某种形式的“话语”所展开的“对话”,人对世界的感知、认识,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话语符号得以表达、记录与传承。正如卡西尔所言,“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②

作者简介:席婷婷,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②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借助于互联网科技的进步,当代青年的生活中涌现了大量的社交媒体,极大改变了交往双方的“对话”,大量图像符号进入交往双方,特别是青年交往者的“对话”之中,青年的社会交往出现了新表征。在青年网络社群中,以表情包为载体的刷图、斗图是常态,运用图像表达自我和进行群体间沟通是青年人所喜闻乐见的对话方式。一方面,以微信、QQ、微博为代表的核心社交媒体深受青年人喜爱,在这些核心社交媒体场域,青年人乐于上传生活照片,记录个体体验,图像占据微信朋友圈、QQ动态和微博内容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以知乎、豆瓣、抖音为代表的衍生社交媒体中集聚了兴趣爱好、关注话题不同的青年网络社群,“分众化地将有共同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的人连接在一起,建构更丰富、更加个性化的社交关系”。^①图像在这些衍生社交媒体中的地位非凡,知乎、豆瓣是图文参半的呈现形式,抖音则几乎是图像的天下。图像表达简单直观,形象生动,在社交媒体场域,从静态图像到动态图像,从单纯图像呈现到图文互构,青年在对原有图像的加工处理和新图像的生产传播中创造了一个风格鲜明、意蕴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当代青年借助图像表达个体生活状态,记录个体体验心得,进行群体交流沟通,其社交表达表现出明显图像化倾向。

(二) 当代青年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

消费、审美都离不开人,消费、审美是源于人对更高层次生活需要,以满足人更好生存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考察人的生存状态离不开对其消费、审美活动的考察。在生产力较低、物质资源匮乏的社会,人的消费主要是基于物品的交换价值,以获取物品使用价值为核心,而艺术活动往往在某种特定的高雅场所展开,审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少数“有闲”群体的特权。伴随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近代以来大量商品涌入消费市场,社会生活中消费越来越频繁,物质丰裕时代消费异化现象随之出现,并在图像时代出现了从“物的消费”向“符号消费”的转变。同时,图像不再是局限于视觉的艺术,而是全体感官的盛宴。一种新图像环境的产生,必然会引起审美方式的变革。^②审美活动逐渐超出纯艺术的范围,渗透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诗歌、绘画、话剧等经典艺术与流行歌曲、摄影、广告、影视剧等大众艺术并存,“美学的当代意义越来越强调其感性的、外观的和愉悦的特征”^③。

消费方面,首先,借助各网络平台的网购、代购成为当代青年消费活动的主要方式。网购软件和代购平台都是先将商品与模特结合,通过商品摆拍和图片编辑排版,将商品以精美的组图展示出来。其次,在网络平台以图像方式分享消费经验也是当代青年消费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国内知名APP“小红书”就以“两亿多年轻人都在用的时尚社区”为口号,集聚了大量以青年为主体的软件用户。APP用户主要通过组图、小视频等图像方式分享购物心得,并推荐部分商品给其他用户,随着许多网红和明星入住“小红书”,名人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小红书”用户,加入图像化的消费活动。审美方面,审美日常化下,街拍、网剧、表情包、创意小视频等图像为载体的审美活动深受当代青年喜爱。比如,近两年来随着各种各样“街头秀”在网络走红,以街拍美女帅哥、街拍表演为代表的“街拍”活动成为国内年轻人崇尚的街头文化活动。当下,青年人热衷于图像浏览观看,以“街拍”为代表的图像化已成为影响当代青年审美的重要模式。

① 马薇薇:《网络直播中社交关系的重建》,《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96—102页。

② 闫瑾:《当代数字媒介下图像表现形式的创新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7年,第35—36页。

③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三）当代青年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

以文字为核心的话语符号下，主体通过“思考”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把握，更多展现了一种时间思维模式。与此不同，以图像为核心的话语符号下，主体通过“观看”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把握，更多是一种空间思维模式。“图像已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文本、认知的工具、社会记录的地图，成为一种艺术样式、一种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空间。”^①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不仅表现在其社交、消费、审美等行为方面，更深层地表现在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变化上。人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条件等现实环境，生活在被图像包围的环境，当代青年作为图像时代的“参与者”与“观看者”，其思维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图像化转向。

一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视觉化转向。图像化的信息方式不拘一格、各具特色，符合青年人求新求异、追求个性的口味，当代青年在自主参与表情包、小视频等具体图像制作中实现了休闲娱乐、彰显自我的心理需求，看图、读图、赏图是其生活乐趣和志趣，“我从来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②，以“观看”代替“沉思”，眼睛是他们考量世界的首要方式，视觉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二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感性化转向。图像叙事直面感性的客观存在，采用夸张、吹嘘、嘲讽、制造反差等艺术化方法，以形象生动的图像模拟重现现实人物事件，具有极强的情感渲染力，当代青年生活在形象化的图像叙事环境中，其认知思维的感性化转向初现。三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碎片化转向。图像是具体直观的，与文字相比，图像之间关联性不强，逻辑性不强。当代青年在图像化的信息获取、接受、交流中，其所习得知识都以分散的、碎片化的图像为载体，思维方式的碎片化转向明显。

二、多重逻辑中青年图像化生存的问题审视

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是图像符号在承载信息、表达信息和传播信息方面更加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优势彰显结果，同时也是当代青年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乐于并善于以形形色色的图像符号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结果。但是，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技术、资本和亚文化作用下，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形成发展期的青年人，其思想行为很容易滑向流于表面、理性缺失、娱乐至上、虚无一切等错误面。

（一）技术逻辑摆布中沉溺“半真实世界”

图像掺杂着真实生活场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必然离不开个体选择和加工，图像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图像化再现，与现实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图像处理技术借助计算机技术日益精进的当下，图像识别、图像编码、图像分割、图像描述等图像处理技术都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日益精进，经过各类图像处理技术编辑的图像，反映和记录客观现实的可信度降低。同时，互联网技术通过对用户浏览记录的算法分析，准确地把握用户的喜好，及时向用户供给特定内容图像，形成信息茧房，人受长期接受相似类型和固定内容信息所限，容易出现自我封闭，形成认知定势，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存在偏差。总之，图像是对现实人物或事件的虚拟刻画，而在技术逻辑摆布中，图像对具体人或事件的记录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甚至完全歪曲的，图像不能表达完全真实，不能呈现全部真相。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图像世界是图像所营造的一个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相对差距的“半真实世界”。

受自身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影响，青年人很容易陷入图像化的“半真实世界”之中，对自身

^① 范文需：《图像传播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 页。

^② [斯洛文]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 页。

所处的真实状态判断失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认知存在偏差,从而与现实世界相剥离。一是图像很容易受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以经过特别处理的图像迷惑他人,造成对客观现实的蓄意歪曲。青年人相对阅历尚浅,辨别力不高,本着“有图有真相”原则,往往把图像作为实在的本质,盲目迷信图像呈现的部分内容,忽略对人或事的全面本质的考量。二是青年人富于想象,渴望他人的肯定,在图像世界通过刷图、斗图与他人进行互动,为了获得关注点赞、实现在图像世界的被认可,有时不惜违背道德、法律,做出刻意讨好观看者的越轨行为。三是青年人心理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期,自律意识不强,自控力有待提升,图像对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片段再现,极大程度满足了当代年轻人对他人生活的窥视欲和好奇心。青年容易沉溺于形象生动的虚拟图像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实践历练,“在别人的生活里认真地喜怒哀乐”就是当代许多沉溺于网络直播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二) 在资本逻辑操控中陷入“非理性狂欢”

对于大众而言,图像是一种话语方式,对于企业而言,图像却是新的商机。青年人爱好丰富,兴趣广泛,对轻松休闲的娱乐活动更是青睐有加,在其图像化生存中具有较高的视觉愉悦需求。资本具有天然的市场利益嗅觉,对准青年追求视觉愉悦的需求,各大资本纷纷进军以街拍、表情包、短视频、网络直播为代表的图像生产和传播领域,以生产和传播好玩有趣、特色新奇的图像为卖点,博得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注意和投入。视觉性是人的自然生理机制,图像是本身带有娱乐底色的形象化、生动有趣的话语方式。在资本的操控中,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声音、图画、影像之间无缝配合、彼此支撑,视觉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彰显,图像的娱乐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

娱乐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日常休闲生活的需要,然而资本介入下,资本与图像生产和传播平台结合,以迎合市场和追求利润为目的,形成了一个以图像为基本单元的感性狂欢场域,图像以搞笑戏谑、暴力互怼、夸张性感等形式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感性狂欢的同时,图像所承载内容的空洞化、庸俗化、低劣化问题开始显现。资本在逐利本性驱使下,在无原则、无底线的娱乐化图像生产和传播逻辑操控中制造喧嚣浮华的泛娱乐化环境,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面临陷入“非理性狂欢”的问题。这种“非理性狂欢”在消费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首先,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图像容易引起青年的好感,让青年形成“拥有这件物品,生活就能和图像所呈现的一样快乐美好”的感性认知,视觉的色彩和画面对青年形成直观心理刺激。“购物不只是购买商品。同时也是对商品的包装、商场内部环境的视觉快感的消费。”^①其次,在资本推手下,图像往往与某种品牌挂钩,品牌又与特定的身份、意义对接,青年的消费对象既是图像所展示的物品本身,更是消费图像背后的隐喻:某种特定的身份、圈子和意义。看得见的图像背后,无形的资本推手以图像及图像隐喻不断刺激青年的消费动机,越来越多的青年因为图像而购买商品或直接为图像付费,青年群体中超负荷消费、炫耀性消费、偶像崇拜消费等非理性消费随之而来,近年来青年人中因贷款消费而引发的“裸贷”“套路贷”“校园贷”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三) 青年亚文化逻辑中呈现“认同危机”

图像形象总是传达着信息内容,表达着某种情感、意义和价值观念,具有文化表征功能。以2018年火爆一时的“小猪佩奇”形象为例,在短视频平台的带动下,“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口号越喊越响,“小猪佩奇”这一图像符号成了“社会人”的表征。基于图像的文化表征功能,越来越多的青年亚文化借助特色鲜明、富有吸引力的图像形象传播,在青年群体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以佛系文化、丧文化、漫威文化、锦鲤文化等为代表的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影响

^①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7页。

深远的青年亚文化,都与特定的图像符号密切相关。如青年佛系文化最初起源于“葛优瘫”系列表情包;青年丧文化在美国动漫《马男波杰克》里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示;漫威文化是在以青年为主要受众的漫威电影基础上,通过电影特定形象展现英雄、正义等文化内涵形成的;锦鲤文化则是以支付宝抽奖活动的中奖者“信小呆”形象,新生偶像“杨超越”形象为代表等。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不同的青年亚文化借助不同的图像符号,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青年群体在理想与现实、责任与享乐、积极进取与消极迷茫中冲突纠结的内心世界。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亚文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青春期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为了解决认同危机,青年往往追寻偶像,醉心时尚,标榜自我,或融入同辈群体,加入某些青年组织以建立身份认同。

一是青年期是自我认同建立的关键期,青年亚文化视角下,图像是青年表达自我,融入群体,形成自我认同的载体。青年不断以特色鲜明的图像符号博人眼球,以风格各异的图像标榜自我和融入群体,以此作为“圈内人”与“圈外人”的标志。青年人通过图像化表达实现自我诠释和价值表达的同时,借助特定的图像进入不同的亚文化圈子,在特定的亚文化群体中完成身份指认,形成自我认同。然而,青年人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图像世界中的理想自我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自我存在差距,容易使青年出现自我认知紊乱。在各种美颜、滤镜、特效叠加图像编辑之下,图像世界中拥有较高颜值、充满自信、个性张扬的理想自我与现实世界中自己真实的外貌、个性对比之下,青年人容易出现气馁消极的心理,出现自我认知紊乱。

二是青年期是认同危机的高发期,图像是青年缓解认同感缺乏所引发的焦虑、恐惧等情绪的一种情感宣泄手段。各种亚文化群体中的青年,不仅是各类图像的视觉观看者和意义解读,更直接参与到各类图像生产、加工、传播等环节,乐此不疲地参与以表情包制作、短视频录制和网络直播为代表的图像的自主建构之中。“解构或重构充满了破坏的快感,虽然其过程不可避免地指向空洞和无意义,但依旧凸显文化心理的意义向度,那就是释放激情,缓解焦虑与宣泄不满。”^①在此过程中,多次出现青年在对图像的随意涂鸦、变形的图像恶搞事件,如电影《我的唐朝兄弟》、“杜甫很忙”系列表情包等对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的形象颠覆;把记录中国内地 22 位慰安妇幸存者的严肃纪录片《二十二》的部分人物截图,制作成表情包在 QQ 空间传播;在烈士陵园、国家纪念馆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严肃场合,拍搞笑视频和图片并上传网络等。这些图像恶搞活动中,青年对国家历史、历史名人及爱国英雄缺乏敬畏之心,虚无传统和权威,侧面反映出了青年亚文化逻辑主宰中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所呈现的“认同危机”。

三、引导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讲话中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青年工作者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和青年群众的引路人”。^②帮助青年读清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图像,引导青年的图像化生存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必然选择。

(一) 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引导青年树立图像意识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一共经历了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当代青年成长于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集合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信息传播变革的第五次信息革命时代,信息发布、传播更加

^① 马中红、杨长征:《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中国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

^② 《做好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4 日,第 001 版。

便捷,信息呈现爆炸增长,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量前所未有地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信息素养就会自动提升,懂得如何获取信息、如何理解和评价所获信息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所获信息是需要后天学习的过程。图像既是越来越受人们喜爱的信息载体,也是一种人们越来越频繁使用的传播媒介,在青年信息素养的培育中,着力加强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图像意识,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交往方式从语言向图像转向之时,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固守文本或语言说服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疏离甚至对抗便会随之而来”。^① 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帮助青年应对图像时代对其读图、识图、用图能力考验,树立图像意识,是引导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第一,要引导青年善于读图,提高自身图像解码能力。正常情况下,人天生就具备“观看”的能力。但是“能看”不等于“会看”,更不意味着“看得懂”。当代青年要善于透过图像表面形象获取其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充分解读图像的“能指”和“所指”,提高自身的图像理解力。第二,要引导青年学会识图,辨明图像背后的意图。青年人要明白“图像”不等于“真相”,图像是现实世界“拟真”的产物,图像的生产、传播都受到信息技术、资本推手的影响,呈现在其面前的图像是经过“制图者”“传图者”图像筛选、编辑的结果,是“制图者”“传图者”的意义表达媒介。第三,要引导青年牢守用图边界,合法、理性、文明地用图表达。青年人需要明白,图像的生产、传播都要合乎法律、合乎道德,不随意传播恶意中伤他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和民族英雄的图像,不随意传播迎合部分人低俗趣味的图像,不随意传播网络上所谓“有图有真相”的谣言。

(二) 关注青年内在需要,引导青年彰显主体意识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个人阅历增长,个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处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充分发展、人格转化关键期的青年,自我发展的矛盾性和憧憬未来的能动性共存,其在理想与现实、责任与享乐、积极进取与消极迷茫中冲突纠结的内心世界需要情感宣泄和心理慰藉。然而,“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的文化传播环境里,人们越来越习惯和迷醉于碎片化的信息浏览和震惊式的视觉感官体验”,图像世界快餐化、娱乐化的体验并不能关照青年的内在需要。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从哔哩哔哩网站的影视弹幕吐槽,到微信朋友圈图文并茂的体会,虽然青年诉诸图像的情感表达途径不少,但其帮助青年情感宣泄和心理慰藉的作用并不理想。以“佛系青年”为例,表面看,青年借助“葛优瘫”“小肥柴”“蘑菇头”“熊本熊”等系列表情包表达“万事随缘、一切随缘”的佛系态度,其背后隐藏着当代青年深深的焦虑,正是无法直面内心焦虑,青年们借助各种表情包标榜自身“都行、可以、没关系”的佛系形象,以自嘲、娱乐的图像化方式缓解内心的焦虑。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活动,人应该回到真实的社会实践中来,人是图像的主人,不能被图像所控制。青年的主体意识就是青年的自我意识,即青年对自身才能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是青年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客观正确看待自我与他人他物、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发挥创造力的前提保障。青年期是个人自我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并确立的时期,是一个人“自我同一性”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期,“青年人追求风格,实际上是更深地对意义和生活模式的认同与追求的一部分,是青年人成熟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阶段,一种对认同的追求”。^② 引导青年彰显主体意识,帮助青年形成自我认同,是青年工作的应有之义。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青年更需要彰显主体意识,不能被图像裹挟而

① 周琪:《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图像化构建》,《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10期,第11—14页。

② 马中红:《青年亚文化:文化关系网中的一条鱼》,《青年探索》2016年第1期,第74—83页。

随波逐流、盲目行动。首先要避免青年被图像呈现的感性画面所控制,盲目追求时尚,冲动消费,陷入“图像拜物教”;其次要避免青年被图像承载的碎片信息所控制,浅尝辄止,停留在对客观事物浅层次的一知半解;最后要避免青年被图像营造的拟真环境所控制,忽略对现实真实世界的认识和体验,沉溺于图像世界,出现沉迷于网络游戏等虚拟图像拟真环境等异化现象。

(三) 铸牢青年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强化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当代中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精神上的价值追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①在互联网技术变革和新媒体平台涌现的当下,图像铺天盖地而来,图像构成了当代青年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青年人积极参与图像的生产、制作、传播的同时,受技术、资本、亚文化影响,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系列不符合主流意识的问题,亟需加强青年认同教育,铸牢青年理想信念。处于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等发展关键期的青年人,需要在理想信念支持中确定其自身行动的目的性、方向性,需要在伟大使命的引导下建立认同。

人进青年期,生活之路刚刚开始,一系列人生课题的进行都需要一个总原则、总目标的指导,即人的理想信念的指导,青年期是确立理想信念最集中和突出的时期。^②为了体现认同并防御认同感的缺失,青年热烈地寻求可信仰的人或观念。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之所以出现沉溺“半真实世界”、陷入“非理性狂欢”,依赖图像宣泄认同感缺失引发的不良情绪,借助图像标榜自我和融入群体,建立“自我认同”,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一系列图像恶搞事件,归根到底是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指导。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指导下,青年人才能直面矛盾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将内心的矛盾诉诸图像化的情感宣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因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③首先,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的“认同危机”表明,青年缺乏动力,缺乏自我管理的同时,颠覆传统、解构权威的图像恶搞事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青年缺乏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为此需要强化青年的使命意识。其次,伟大使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在使命担当激励下的青年,将以更加昂扬、更加向上的姿态直面和解决问题。最后,一个人作为个体本质的存在,与他作为社会的本质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根据社会学理论,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动态评估和判定,“民族国家能够很好地提供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也能够提供保护自我认同的追求个人卓越感”^④。当代青年要在图像化生存中不断强化使命意识,以伟大使命引领自己、鼓舞自己、监督自己,在家国担当中不断历练成长,了解自己,充实自我,在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实现自我认同,从而顺利化解“认同危机”。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② 刘建军:《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0—192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002版。

④ [美]约瑟夫·拉彼得:《文化和认同》,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法治研究

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

田 坤,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法治正义进行了多方面深刻阐述,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承“依法治国”之前, 启“全面依法治国”之后, 将法治正义的价值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在理论语境下, 它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观为指导, 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法治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西方法治正义理论的批判吸收; 在问题语境下, 它接续了中国法治正义演进的历史实践和法治正义的理论演绎; 在时代语境下, 它承载了新时代美好生活新需求, 接续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 观照了全球正义的总趋势。

关键词: 习近平; 法治正义; 理论语境; 问题语境; 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111-10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必定落实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和环节, 以正义观照法治, 以法治保障正义, 进而法治正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以正义为价值主线观照全面依法治国, 提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我们从理论语境、问题语境与时代语境三个维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 有助于把握正义之于法治的极端重要性和重大价值。

一、理论语境: 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的思想指导和“中、西”法治正义理论的批判吸收

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 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虽然秉持着不尽相同的观点, 但是对它探析的步伐却从未停歇, 公平正义价值在法治中的彰显亦是如此。从古至今、由内而外, 正是基于如此丰富的理论积累, 蕴含着公平正义基因的法治思想才得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才显得更加自信和充满力量。

(一) 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根本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正义论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提供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均有相关论述涉及对资产阶级法制虚伪性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所谓的“法治正义”仅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权, 这种“正义”对无产阶级而言意味着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平正义思想研究”(18BKS156)。

作者简介: 田坤, 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论; 廖小明, 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公平正义。

经济上的被剥削和政治上的被压迫,“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①。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只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他准确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言简意赅地指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②虽然资产阶级的法制在形式上徒有平等之表,但是在实质上却空无平等之心,“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他的内容”。^③

对于社会主义的新型法治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斯大林则从法治实践的角度做出了回答。概言之,他们对新型社会中法治正义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的法律应该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④。第二,社会主义的新型法治既要实现形式平等,又要实现实质平等。“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⑤第三,社会主义的法,注重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对无产阶级的保护。“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⑥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直接论证法治正义,但是认为法治是正义的最根本保障。毛泽东同志主导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他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⑦。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更加重视法治的重要性,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他看来,法治是确保公平正义的根本手段。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⑧邓小平认为,法制保障经济建设十分重要。他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⑨这也意味着,他开启了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法治体系还不健全完善,导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集聚突现。因此,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突出建设政治文明。在1996年2月8日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总结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⑩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着力解决发展中由于法治体系不够健全完善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法治在保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2—323页。

② 列宁:《论国家》,《列宁专题文集》之《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③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78页。

④ 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4页。

⑤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94页。

⑥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86页。

⑦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3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

⑩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强调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 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第1版。

作用。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 他强调指出: 要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包括全面依法治国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在法治建设方面, 更加突出正义的价值指向和检验标准, 认为法治正义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执法司法者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要信仰法治, 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 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 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执法者、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公民应自觉维护法律权威, 才能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为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进而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思想基础。^①为此, 他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依法治国新要求。

(二)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正义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理论源泉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正义精神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提供理论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在法治方面亦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传统法治文化底蕴, 是对以儒家为主的, 融合法家和道家等法治文化精华的正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其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②, 彰显正义的论述, 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法治文化“刑者德之辅”的德主刑辅、“以德化民, 以刑弼教”的思想。自古以来, 德治与法治不是排斥的关系, 而是互补的关系。德治是法治基础, 法治为德治提供保障。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 德治与法治的含义及目的不同于传统的德治与法治的含义及目的。后者主张用道德教化作为规范臣民的主要方式, 辅之以刑罚作为道德失范的次要手段, 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巩固统治。而当前法治建设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发挥法治的主要作用, 辅之以德治弥补法治之不足, 通过“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 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价值的现实需求。而且, 德治更加兼顾情理,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法理与情理的和解。正如习近平所言“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 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 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 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 ‘心结’没有解开, 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③。

其二,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凸显实质正义的论述, 吸收了道家的正义论, 是将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律、将纸上的法律转化为现实中的法律、将“死”的法律转化为“活”的法律的体现。“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 或者实施不力, 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的论述, 则是强调实施之于权威的重要性, 而实施之精要则在于公正二字。“法律需要人来执行, 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法, 那法律再好也没用!”^⑤“严格文明公正执法是一个整体, 要全面贯彻。文明执法、公正执法

① 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4月10日,第13版。

②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1版。

③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1月13日, <http://www.hppc.gov.cn/2019/0113/29112.html>, 2019年12月29日。

④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1月13日, <http://www.hppc.gov.cn/2019/0113/29112.html>, 2019年12月29日。

⑤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1月13日, <http://www.hppc.gov.cn/2019/0113/29112.html>, 2019年12月29日。

要强调,严格执法也要强调,不能畸轻畸重。”^① 以上论述与道家“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工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② 的法治文化中关于公正之目的在于法律治理的阐述相契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倘若没有得到执行,那么这种观念上的公正只是虚妄。正因如此,强调法律的执行才能真正将公正落到现实层面。

其三,“公生明,廉生威”,凸显正义效力的论述,吸收了法家正义主张,指出了法律的作用不止于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其公正价值更应得以彰显。法家曾将律法称为“大公正之制”,之所以凸出公正,既因为法律制定要公正,又由于执行法律要公正,“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天子,黥劓其傅”^③。以反腐倡廉为例,在反腐败斗争中,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腐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群众交出的一份写满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满意答卷。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④ 只有执法上的公正才会带来政治上的清明,而这种清明又是树立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源泉。

(三) 西方法治正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重要借鉴

西方法治正义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提供理论借鉴。习近平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⑤ 观现代法治正义之精要,言必曰西方法治正义之旨趣。长久以来,西方法治理论成果为我国法治建设所吸收,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方法治正义的理论源头包括朴素的古代正义论思想。首先,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先后探讨了有关法治正义的话题,并使正义问题系统化。苏格拉底曾坦言“守法就是正义”。^⑥ 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体现了他的正义思想,他在《理想国》中将正义划分为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安其位是为国家正义,而个人正义是理性、激情与欲望各尽其责。其次,在关于法治的定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其涵盖两层内容:其一,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其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这里,他将正义视为人们对法律普遍服从的体现。此外,正义还是作为判断一部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的依据和准则,即符合正义的法律是为良法,反之,则为恶法。由此,他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良法善治相结合便构成了法治的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主张,以契合事物合乎公平正义的本性,在他看来公正是整个德性,而不公正则是整个邪恶。最后,简明扼要的法律谚语凸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从来不缺乏在法律上的彰显,质言之,在法律领域公平正义这一抽象的原则变得格外形象具体。有着良好法治传统的西方市民社会,在市民阶层的广泛参与之下,形成了一条条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法律谚语。它们贴切市民生活、反映着真挚淳朴的法律公正情感,例如,“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法是关于人和神的学问,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迟到的正义为不正义”等。

西方法治正义的理论源头蕴含多元的近现代正义论思想。近现代以来,西方正义理论有关美德、

① 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2—723页。

② 余明光:《皇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③ 宋韬译注:《战国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④ 习近平:《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⑤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5页。

⑥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4页。

政治、综合、人权、社群主义等方面悄然兴起,而其中关涉法律内容的尤为明显,相当部分的正义论学者直接将正义与法律正义相混同,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足可见法治正义的重要性。自然法学派的产生,其根源直指法的正义性,该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论及到法‘ius’应含有正义的品德;斯宾诺莎区分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在前者状态下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故而无所谓公正与不公正之说,在后种状态之下,国家和法律是私有财产的强有力的保护神,每个人的行为受到约束进而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分。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旨在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康德是最为典型的“权利正义论”者,他认为法律上的正义就是正义的主要内容,并非常重视公正和正义价值的实现,“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①。边沁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从功利的角度阐述了他心目中的正义所指。此外,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葛德文、黑格尔、约翰·密尔等均对正义有不同的见解。现代正义理论以约翰·罗尔斯、诺齐克等人代表,其正义理论对法治正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立宪民主制下,通过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制定宪法、制定法律、规范的运用四种阶段顺序下正义的原则方得应用。在其正义原则的架构下,良心上平等自由、宽容。宪法正义与参政自由相融洽。与法治相关的个人自由相对于经济自由而言具有优先性。诺齐克的正义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有关法治方面差别之一就在于,诺氏的正义观主要属于程序正义范畴,罗尔斯的正义观主要属于结果正义范畴。

二、问题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出场境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并非离开现实问题,空谈正义,他向来反对离开现实条件谈正义的高谈阔论。从这些论述中他深刻认识到法治正义的实现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纷繁复杂,倘若处理得当,将会推动法治发展更上新台阶,反之,则是阻碍法治公正实现的拦路虎。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演进中的法治正义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正义的实现何以可能?一直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努力探索的问题。

毛泽东时期,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成立,各项法律制度百废待兴。他积极推动废除以“六法全书”为象征的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制。一方面落实人民民主与平等思想,另一方面废除旧法建立新法,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严格落实制定的法律。从《共同纲领》到我国第一部《宪法》,其中的法制进展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除此之外,由于各项制度建设均不完善,一边总结前期革命斗争时期法制实践的经验,一边借鉴苏联的法制发展情况,用以弥补我国法制刚刚起步不足的缺陷。因而,在这一时期,具有初步的法制思维意识、形成基本的法制原则、提供基础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实现法治正义急需解决的问题。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继续恢复并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实行党政分离、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现象的发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法律在市场领域内对不同主体利益的调整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遵循法制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法治国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由“法制”到“法治”转变的一个巨大飞跃。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法治的发展规律。全面依法治国更加突出法律治理的全面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这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内在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一个重点领域。一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而言,要培养法治思维,既要学法懂法,又要用法守法。始终“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

^①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5页。

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①,其具体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②。二是,要加强党内立法工作和健全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代表的制度建设,形成以党章为主的并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这也是依法治党的必然要求。三是,腐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同腐败斗争到底除了要加强党性修养教育、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之外,更要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腐败分子秉承“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零容忍态度,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③的坚定决心和敢为人先的魄力,使社会公平正义水平不断获得提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随后的宪法制定提供了条件。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完成,并于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此后,受“文革”等的影响法治建设出现倒退,法治公正更是无从谈起,七五宪法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带有极为浓重的“文革”色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又一新的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更加公正的新时期。继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之后,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又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目标,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契机,对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更加细化,助力我国法治建设走上快车道。

当前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在现行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框架之下,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问题。在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战硝烟四起,发展中国家经贸秩序在现行规则体系下难以为继;在政治上,霸权主义从未退场,主权国家因发展程度、综合实力等因素在无形之中被划分为大国和小国,其直接后果是“弱国无外交”,在国际事务上缺乏发声的话语权,甚至在国土安全上也难免被强国所欺负,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荡然无存。西方发达国家常常肆意乱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甚至绕开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达自身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这种滥用规则,无视规则存在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不满,只顾自己发展,破坏他人发展的行径更是自私自利的展现。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旧格局,国际社会希望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 法治建设推进中,正义的内在张力是解决正义问题的内在根据

一是司法不公让正义蒙受羞耻。司法的本性在于公正,其内涵的价值准则包括公平、正义、平等、正当等内容。过去一段时间,曾经由于法治体系尚不够健全完善,出现了一些司法不公的现象,例如司法裁判不公、司法执行不力等。主要表现为由代表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案件的追诉和裁判所引起的,侵害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基本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所酿成的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二是法律规则与人情关系难分难舍。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关系和请托人情，从而为遇事不找法、遇事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此类不良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诸如“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案件，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①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这样的行为显然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违背，与现代国家所极力提倡的规则意识相矛盾，更是与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相不容。

三是执法环节存在实体与程序的空场。现实中，执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拥有独立的执法权的保障机制还尚待健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执法理念仍需强化，公权侵犯私权的案件仍不断发生。一方面，任性的权力必须以“制度的笼子”监管；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法律的严格适用和执法程序的合法、公开、透明。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偏废，否则执法的公平正义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曾引发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讨论的“暴力拆迁”和“城管暴力执法”，就分别是上述两方面出现问题的典型体现，在法治缺失的场域下，作为个人的公民一方，其合法正当的权利诉求得到满足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由此将导致执法机关本已呈现弱化的公信力几近“透支”，法治权威性必受影响。

四是司法制度亟待改革和发展完善。在司法改革之前，在司法活动中缺乏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是冤假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以佘祥林案为代表，在刑事领域内的冤假错案往往与犯罪行为人的生命与人身自由相关，所以尤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总结诱发冤假错案的原因时，除了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未完全建立健全外，证据制度建设不完善对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也存在较大影响。以刑事领域内的冤假错案为例，相当部分的冤假错案成因与非法证据未完全排除不无关系，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形下，部分法院不是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形成，损害了公平正义。

五是法治队伍建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法治队伍的建设关乎中国未来的法治发展事业，法治队伍的建设职业操守和个人素养是基础。法律职业以其特殊的职业属性要求从业人员应当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否则将损害公众对于法治公正的信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曾言，“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很多，司法人员底线失守确实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②，这一情况难以想象却又在情理之中。仅是司法人员的底线失守就会造成如此之大的社会危害，可想而知，律师、公证员、仲裁员、法学家、执法者等出现底线失守的情况，将会对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损伤。

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是弄脏了整个水源。”立足于冤假错案的现实，只有正视冤假错案，及时纠正、防止发生，才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近年来，一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一批银铛入狱的“犯人”得以沉冤昭雪、一批使司法蒙羞的制造者得以追责。种种措施既彰显了我国对于人权的保障，又重塑了司法公正的权威。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③基于这样的殷切希望，在实现司法公正的道路上还需砥砺前行、不可懈怠。

① 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0—721页。

② 沈德咏：《司法人员底线失守是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廉政瞭望》2019年第3期，第15页。

③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三、时代语境：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进程的范式图谱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法治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中指明了当前乃至今后我国的法治发展方向。同时，这也契合了人民群众对于公正价值需求的美好向往。在推进法治建设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不能少，放眼全球，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法治正义的向往也空前高涨。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下的法治正义追求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根本追求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从落后、紧迫到超越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正在放缓，但是质量却在不断提升，然而从微观上看，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弊端显露无疑。从根本上而言，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法治正义追求集中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各种问题。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从整体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法治向往，这一向往不仅局限于经济民生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治理和生态领域。

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民生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正义。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医疗卫生、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国社会，缓解发展矛盾、缩小发展差距必须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①，由此，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更突显其重要性。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同样需要深入贯彻法治正义，以促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社保公平、医疗卫生公平，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巩固和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习近平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强调科学的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唯有民生公平正义得以保障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经济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提高公民的个税起征点，有利于再次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作出了很好示范。在政治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保障人民群众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实质性地参与政治生活需要落实相关法律规定。在科技文化方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话题的热度从未消减，打击侵权与盗版行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符合当前公众对科技文化发展的需求；在生态文明方面，加强生态环境立法、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律规范，坚决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力争打赢“蓝天、碧水、净土”的环境保卫战，还人民群众一个更加适宜人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处理好代际和代内问题是环境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

（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正义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逻辑展开

新时代，“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执政的经验时，充分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①。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总体统筹之中,掷地有声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②

回顾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相关提法经历了如下几次转变。主要包括两大关键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发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此后,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等具体举措,以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这些转变和措施是对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体现了在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深刻实践。

古语有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正义实践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诸多环节。一是在立法上,要始终坚持科学、民主的立法原则使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更加趋于公平。以《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继出台并施行,党的十八大以来90余部党内法规先后修订颁布,法律规范的完善不仅填补了部分法律上的漏洞,还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有力回应。二是在执法上,建立健全各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机制,通过严格规范执法、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赋予行政相对人实质的救济权利等举措,有效减少了暴力执法、钓鱼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不良社会现象,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在司法上,继续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平正义这条司法生命线永葆活力。司法工作应当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兜住底线,因为司法裁判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公正的司法裁判既能达成定纷止争的争讼目的,又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创建;而不公的司法裁判既为矛盾的升级转化提供机会,还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要以切实的行动,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在守法上,社会公平正义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全民守法为推动新时代法治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社会的主体,遵守法律法规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义务,而尊法、学法、用法是新时代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法治建设不但需要有适合的外部环境为条件,而且需要守法主体有相当的法治意识,以此培养对法律和公平正义的信仰。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深刻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五是在法律监督上,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是绝对权力的体现,法律活动也不能例外,完善以国家法律监督体系和社会法律监督体系为内容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构筑新时代社会公平正义大厦的基石,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以及对执行现行法律法规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综上所述,全面依法治国的正义实践,必须要重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这五个环节。

(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正义向往,是法治正义的人类观照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需要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上拥有与其发展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1世纪的时代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并在各项国际事务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在现行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框架之下,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问题。为此,建立符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页。

利益的,更加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秩序规则的呼声日益强烈。

依靠奉行法治创造公平正义的未来是最佳的路径选择。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①中国向来主张和平,提倡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面对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一方面,我们需要遵守相关原则和规则,并加以熟练运用,以维护好我国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谋求从外部做出改变。对内,“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②。由于世界法治文明具有互鉴性,使得加快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世界通行的原则和惯例接轨成为可能。对外,充分发挥大国外交“有原则、重情义、讲道德、谋公正”的积极作用,在“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③的现实下,推动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国际治理上,凸出国际公平正义观的价值导向鲜明。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深切关怀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当世界经济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处于下行期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注定不能袖手旁观,如何有效协调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这三对主要矛盾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在应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坚决反对贸易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思维,提出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④,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⑤,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⑥。还要“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⑦在气候变化治理、网络安全治理两个领域同样如此,始终将公平正义置于首位。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建立公道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体制、全球治理等国际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彰显了全世界人民对公平正义价值的永恒追求。现阶段,在中东问题、朝核问题、伊朗问题、全球性的贸易争端等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也要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准则,从而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得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问题在许多会议和重要场合做出过精辟的论述。归纳而言,公平正义价值贯穿始终。新时代,实现法治中的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一项重要需求,这一需求的满足将激励我们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1页。

②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5页。

③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81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81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82页。

⑦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82页。

(上接封二)

导”或“辽宁省政协调研考察组”，而不是“政协”这个组织机构。

在实践中，这样的标题常常见诸各种媒体。如“广东省政协来我省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9月10日《河北日报》），“省政协到铜陵调研提案工作”（2018年11月9日人民网安徽频道），“省政协到我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课题调研”（2018年6月13日泉州广播电视台），“大连市政协赴天津、济南考察调研”（2019年5月2日人民政协网）等等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来调研考察的都只能是某个人或群体，而不可能是“政协”。这里的“政协”应改写成“政协调研考察组”或人名，也可以是“×××一行”。

四、代表大会不是“委”召开的

民主党派新闻用语错误还常见于一些会议报道中。如“民进海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2012年4月16日《海南日报》）。这里的“委”字是多余的，有了“委”字概念就混淆了。“委”是“委员会”的简称，这个“委员会”将在代表大会期间才选举产生。所以正确的写法是“民进海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民主党派章程没有“省委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设计，只有“民进地方各级的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样的规定。

同样，“民革海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2012年3月28日南海网），应改为“民革海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致公党江苏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2007年5月30日中国矿业大学网站）应改为“致公党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洛阳市委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2017年2月22日洛阳市政协网站）应改为“民革洛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五、“委员会议”不同于“代表会议”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委员会议”写成“代表会议”，如“民革衡水市委召开五届三次代表大会”（2019年4月1日《衡水日报》）。这是把“委员会议”写成了“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民主党派党员（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召开一次。即每五年召开一次，不应有（五届三次代表会议），这里召开的是“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而不是“代表大会”。“民革衡水市委召开五届三次代表大会”，应该是“民革衡水市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全体委员会议’可简称为‘全会’）”。

六、“××省政协第×届委员”应为“政协××省第×届委员会”

“陕西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2019年1月26日新华网陕西频道），这样的表述是经不住推敲的，不规范，里面含有内容的重复。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简称为“政协”。“全国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简称，“××省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省委员会”的简称。也就是说，“陕西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中的“陕西省政协”这一部分中已经含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的意思，后面就不应再加上“委员会”。因此，要写简称就应该写成“陕西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要写全称就应该写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同理，“民建广东省委召开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会”（2018年6月25日《广州日报》），其中的“省委”就是“第六届委员会”，应改为“民建广东省委召开六届六次全会”。

政协、统战新闻是政治性新闻，必须讲政治，必须讲求严谨、准确、规范，每一位新闻工作者，特别是时政新闻工作者都应该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作者简介：张文明，云南政协报总编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民政协理论。

(责编：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 1999年创刊)
总第85期 第22卷 第1期

主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 650031
电子邮箱: ynsyxbbjb@163.com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811
国内统一刊号: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Sum.85 Vol.22 No.1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E-mail: ynsyxbbjb@163.com

国内邮发代号: 64-95
广告经营许可证: 5300004000090

ISSN 1671-2811



定价: 9.00元